

民主台灣

35



1984年5月1日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出版



黨外分

關心台灣民主運動的人，不管是站在同情支援或反對打擊的立場，都注意到近幾年來黨外陣營中正進行着分化。誰都知道，團結才有力量。黨外的分外，總是親痛仇快。尤其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台灣政治局勢下，很多黨外人士力求大局為重，避免分裂，以免國民黨得漁翁之利。這種簡單的道理，不僅一般支持黨外的群眾知道，即使是那些富於批判，被認為導至分化的「罪魁人土」又何嘗不曉得？何嘗不希望團結以求有力地與國民黨鬭爭？然而，儘管群眾與黨外人士有心努力避免，分化還是客觀地、持續地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之趨勢。我們以為，這已不是「少數人士」故意挑起或國民黨挑撥離間的結果，而必然有更深刻的原因。

黨外的興起，原是國民黨不民主統治的必然產物。國民黨憑藉戒嚴、禁止組黨、辦報、罷工、罷課等等。人民應有的民主權力，却留下一扇避免爆炸的出氣口——選舉。人民對政府的不滿便只有集中地利用選舉表達出來。台灣的民主運動因而具有比歐美民主運動更豐富的內涵。農民受低糧價剝削，工人勞資糾紛吃了大虧，學生受教官的氣等等各式各樣受壓迫的層面，在其他國家原有各種不同的渠道來解決；但在台灣，這些渠道多數被堵住。所有這些不滿與反抗，就集中於唯一「合法」渠道——民主選舉展露出來。於是人們看到，群眾對黨外人

士熱烈瘋狂式的支持。這種在其他民主國家罕見的現象，正是在台灣特殊戒嚴措施下才會發生的。這也是黨外長期以來，得以維持團結局面的一個基本因素。

然而，這種源自外頭壓力下的統一團結，是不可能永遠不變的。且不說國民黨必然會地，積心慮地分化黨外陣營，單就黨外支持者的利益要求之不同，民主運動領導者之立場與認識之參差不齊來說，已足以孕育着黨外分化的內因。

黨外作為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不民主統治的象徵，必然會受國民黨統治手法的變遷及台灣社會矛盾的發展所左右。戰後國民黨是以勝利者殖民式的面貌君臨台灣。台灣人民各階級，不論是中、下層的農工或上層的地主、小資產者，都或多或少地受了國民黨的壓迫（只有極少數「半山」例外）。原存在台灣社會內部的兩個較大矛盾——即農民與地主之間，與勞、資之間——也在五〇年代初期即已解體。地主的力量隨着國民黨來台後的土改而失去其經濟基礎；而戰前台灣資本家多屬日資，隨着日本的戰敗而撤出台灣。因此，五〇年代台灣人民的內部矛盾是微小的。廣大人民群眾與統治者國民黨之間共同利益也極有限。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乃存在於國民黨統治者與廣大人民之間。一個以反國民黨為共同旗幟的黨外路線，乃能得到反抗國民黨

化 的 意 義

壓迫者共同的擁護。這是當時黨外團結的基礎。

從五〇年代中期之後，國民黨逐漸認識到，「反攻大陸」的不可能，而開始作長居台灣的打算。七十年代初，國民黨外交局勢迅速逆轉，正要接位的蔣經國乃積極提拔「吹、台、青」，國民黨黨員乃至中上層幹部出現大量台籍人士。國民黨與台灣人民之間一反五〇年代初期那種互離狀態，而呈現犬牙交錯的情形。另一方面，從六〇年代末期之後，台灣開始急速工業化，一批台籍新興資產階級興起。他們之中，固有因過去受國民黨壓迫（如「二·二八」）或希望爭取政治權力以保障或擴大既得的經濟利益而支持黨外民主運動者，但亦有因恐懼動亂而逐漸支持國民黨者。另一方面，新興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之間必有的矛盾也逐漸滋長壯大。原先籠統團結的台灣人民，因新興資產階級的出現，而產生與工人階級對立，以及有部份向國民黨靠攏的分化局面。

黨外如果要繼續領導台灣的民主運動，一定要忠實地替台灣人民爭取他們的利益。在當今台灣社會歷經重大變遷，台灣人民因利益之不同而且日益明顯地分化成不同的階級或階層時，黨外的分化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不僅未必是壞事，而可能反而是好事。一味地追求一統團結局面，其結果如不是犧牲某些階級的利益而以另一階級的

利益來代表，就是只能在一些較抽象的層次上維持團結的局面。不幸這二者都存在於今日台灣民主運動中。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常被傳成台灣人民的共同要求；同時黨外對許多具體現實問題每多觀望行行不前，一些陳年抽象口號則不斷回鍋重炒。

這並不是表示黨外再也不可能團結、共同對付國民黨。不！恰好相反！體認到彼此之異，各自努力地為其所代表的階層爭取權利，如此有效地調動台灣人民各階層的力量。這些力量如能聯合，將比含混籠統的團結更有威力。這些力量的聯合是有其基礎的，因為他們之間雖有其異，但也有其共同點。事實上，在目前國民黨獨佔統治下，其共同基礎相當廣濶。

以上所述，主要就理論層次而言。在實際上，這並不表示目前所有黨外的分化全都具有真正的社會基礎。有些分化，乃是其於策略路線的不同，而非基於其所代表社會階層的不同；還有些分化，摻雜了權力鬭爭，個人恩怨、主觀願望或情緒的因素。所有因這些因素而導至的分化，我們也和多數對民主運動懷抱善意期許的人士一樣，盼望他們能以大局為重，消弭不必要的爭紛。然而，我們要指出，另有些分化是必須的。分化之後的聯合，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團結，才能把更多群眾的力量調動起來。

評論

- 1 黨外分化的意義／本社
台灣社會的分化，將會導致黨外的分化。

瞭解台灣

- 5 自省後的「夏潮論壇」／近聞與短評
在檢討聲中，「夏潮論壇」的革新號打開一個新方向。
- 7 依然是個拖的局面／近聞與短評
二中全会國民黨並未安排蔣經國接班人，依然是個拖的局面。
- 8 都來支持賀兆雄／山海經
重視台灣第一個自由工會，關心漁船工人的生活。附有若干原始文件。
- 12 E. D. B 返台行／沈道洲
介紹寧明杰先生為致癌農藥隨採購自美國糧食輸入台灣，而專程回台奔走情形。
- 15 「台灣結」與「中國結」的企業化／李哲夫
以社會學的眼光，分析這些「情結」產生的原因、影響。
- 19 台灣學生運動三十年（下）／速宇
分析台灣當局控制學生運動的手段，並比較台灣學運與世界學運。
- 21 「青年救國團」成立的歷史背景／陳漳生
同時介紹了蔣經國的重要生平。
- 25 「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自由中國」社論
「自由中國」觸怒蔣經國的歷史性文件。

探討中國

- 29 中共接納核廢料／李士英
中共擬接納西德核廢料所反映出的問題。

認識世界

- 31 美國左派與總統選舉／過客
一向缺乏群眾基礎的美國左派，檢討對總統選舉的態度。
- 33 法國實行社會主義嗎？／羅英譯
詳細分析法國密特朗政權的政策。
- 38 從國際關係看台灣問題／林德英
跳出「美國中心」的思想框架，看國際關係。

思想

- 43 一個發育不良的經濟學家／馬耕田
這個寓言故事却不是純屬虛構，值得想想。

歷史

- 55 日本是怎樣開始覬覦台灣？／卜今
誰能想到，這竟是美國人幕後促使的。
- 47 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四）／戴國輝作／林真理改譯
介紹洋務運動的主體工作，並詳論洋務運動的長期影響。

隨筆

14:61:63

編輯報告

上期我們在「選舉後的平靜」短評中，指出外表平靜的台灣政局，正在醞釀重大變化。時過二月，這個變化終於開始顯現出來。這就是黨外的分化逐漸成型。在國民黨統治下，很多人都不願看到黨外分化、削減力量。對此，我們出了一篇社論，對分化的來源作了一些探討。

分化最大的事件，乃為「夏潮論壇」革新號的出現，去年底，黨外選舉的「失敗」，很多人都認識到，民主運動要更上層樓，必須與中下階級的人相結合，推動工人農民的民主運動。一貫以關懷中下層人民的社會派「夏潮」集團，經過一段自省後，終於以更明朗而堅決的面目再出發，這將推動民主運動的發展。請看自省後的「夏潮論壇」一文。

工人自己的民主運動也有了令人振奮的消息。奮戰了四年，賀兆雄等人籌組的船員工會終於有了初步的成績。我們選轉載了幾份難得的原始文件，要特別感謝「佚名先生」的提供。我們期望讀者諸君，如有機會收集到這類眾所關心的文件，也能惠寄給我們，好讓更多關心台灣的朋友們有機會看到。

與黨外及工人的發展相比，國民黨外表的「平靜」還沒有突破的發展。請看「依然是個拖的局面」一文。

這段時間，海外關心的朋友們，也有所行動。主要有：一、澳乙烯農藥問題；二、關心黃賢被捕；三、擔心中共接受西德核能廢料問題。第一項直接涉及台灣人民的健康及台灣農業政策問題。第二、三項關懷或抗議對象雖然是中共，但他們與台灣也有些牽連。在33期我們曾報導過，黃賢對台灣的人權問題及一般民主運動都曾出過力、關心台灣民主運動的朋友更沒有理由坐視之。而核能廢料方面，台灣本身的問題也極為嚴重。據悉，台灣核廢料儲在蘭嶼上，這不但危險，而且明顯地歧視蘭嶼的山胞。另外據一月廿四日中國時報，台電要花四十五億（即一億多美金）來「改善」核能二廠。要花這麼大筆錢，顯然核能二廠出了大問題。

我們對農藥與核廢都有專文報導。這幾件事在海外都引起相當廣泛的注目，這也顯示更多人開始有所行動。這是最為難能可貴的。知識份子不能永遠只停留在關心的程度而已。「台灣學生運動卅年」在結論中也簡介了世界各國的學生運動。學生運動，正是知識份子關心社會，從坐而言到起而行的

最集中的表現。學生運動的正面意義，即使是美國號資本家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OW 3RD）也給予極肯定的評價：「我相信，社會上富有於理想、關懷世事的年輕人，遠比態度漠然、唯長者之命是從的青年人為強」（轉引自南卜朔「學生運動起因的不同解釋」）。我們計劃未來介紹世界學生運動。

就世局而言，美國的大選預選以及美國在尼加拉瓜港口佈雷等事是這兩個月來的重大新聞。關於大選，我們談一個較為人忽略的方面：「美國左派與總統選舉」。佈雷之事再一次顯示美國帝國主義的蠻橫嘴臉。一個弱小國家要走較獨立的道路，竟然引起世界頭號強國的干涉，這太值得人們好好想一想了。

要好好想一想的事還有很多，本期刊了一個寓言故事：「一個發育不良的經濟學家」便是其一。故事主角的背景和你我都很相似。希望諸位給我們一個讀後感。

戴國輝先生的鉅著本期連載完了。這篇文章填補了一些歷史的空白。「洋務運動」的出現，實為第三世界國家在受到國際資本主義強權侵犯下的一個極可能的反應。文章結論說，台灣的洋務運動為日本殖民台灣發揮了「移花接木」的「台木」作用，是則洋務運動固有其提高生產力的作用，也可能成為帝國主義的一個工具。這不涉及整個第三世界發展問題。本期「寓言故事」談的也正是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太重要而複雜的問題，我們打算以後繼續在這些方面多作介紹。

且不說第三世界，即使像法國這種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她要走自己的道路也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阻難。「法國實行社會主義國家嗎？」有深刻的分析。

※ ※ ※

我們上期作了一個抽樣意見調查，得到初步的反應整理於「民主大家來」。我們將持續作這類調查，希望收到調查表的朋友務必給我們反應。當然，沒有收到調查表的人也歡迎來信。還是一句老話，這個刊物是大家的，不是少數人單方面灌輸主張，而是所有關心朋友們溝通意見的園地。另外，我們的財物依然十分困難，希望大家的捐助與介紹訂閱。

自省後的

夏潮論壇

休刊兩期的「夏潮論壇」，經過兩、三個月的自省之後，在三月五日以革新版的面目重新出刊。革新後的「夏潮論壇」在內容與版面上都面目一新，引起各方的注意，各種褒貶意見紛至沓來。由於復刊號有幾篇討論「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文章，更引起幾份一貫主張「台灣意識」者的黨外刊物底批評。在台灣黨外刊物百家爭鳴時期，一份新刊物的問世很少能引起這麼多的波動。「夏潮論壇」再出發底轟動，反映了什麼？

首先，它反映了黨外在悶局中尋求出路的刻苦努力。台灣的民主運動自去年年底選舉席位的失敗之後，進入一種徬徨的悶局中。雖然有些黨外人士不承認失敗，依然自信十足，幹勁十足地按照選舉前的活動方式與同等的積極水準奮戰下去，但更多的黨外人士則進入較深刻的檢討中、思考整個黨外的路線，民主運動的前進。

同時，選舉後的台灣政局也更顯示黨外的無力感。台灣這期間正經歷總統的改選。這個關係台灣權力轉移的重大事件，人們原期望將有一些開創新局面的事件發生，更期待民主運動以其三十年以上的歷史基礎與百分之三十以上選票的社會基礎，能夠產生應有的影響。結果，國民黨權力接班問題仍未明朗，老百姓仍處在悶局中；而黨外人士在這重大時刻中，竟是毫無發言置喙的餘地。「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台灣人民對黨外人士三十多年來的支持，到了台灣前途處在重大決定的時期，却看不到黨外人士期望中的作用。凡此種種，都增加了黨外的無力感。

在這悶局中，百花齊放的黨外雜誌並未為讀者帶來「撥雲霧，見天日」的明朗感。反而，由於刊物多而內容大同小異，不可避免地逐步陷入爭取讀者市場戰的資本主義商品社會模式中。受了商品社會的制約，黨外雜誌的內容便日漸新聞性，時效性，甚至內幕性。在這個黨外以及刊物都處在的悶局當中，革新號的「夏潮論壇」以其深刻的理論探討嚴肅批判風格，以及其一貫的社會意識，與反帝立場而廣受注意。它所提出來的問題與倡導的方向，將會在台灣引起一連串的爭辯。透過這些爭辯，黨外運動將朝更深刻，更具社會性，更嚴肅的方向發展。這是「夏潮論壇」再出發所反映的第一個意義。

在探討「夏潮論壇」再出發所反映的其他意義之前，有必要先檢視三十年來台灣民主運動在時間上與空間上的一個特殊性。時間上，台灣的民主運動有過歷史性的斷層。她並未銜接日據時代台灣人民反抗運動的主流精神。日據時代的台灣人民反抗運動有着濃厚的社會意識，反帝精神與認同中國的傾向。這三者在五〇年代以來的台灣民主運動基本上都未繼承下來。空間上，台灣民主運動也和世界任何受壓迫人民的民主運動斷層。中南美洲國家的民主運動，非洲國家的民主運動，乃至於台灣的緊鄰南韓與菲律賓的民主運動，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只有在台灣的民主運動反而是十分親美的。

台灣民主運動之所以會發生時間與空間上的斷層現象，當然是國民黨君臨台灣以後所一手促成的。（按：雖然國民黨在台灣灌輸「中華民族」精神

教育，但國民黨的腐敗，高壓與歧視性統治，「二·二八」血淚，以及國民黨長期反共恐共教育，禁止人民接觸中國大陸。因此，國民黨的實際作為是切斷台灣人民對中國的認同。國民黨在事實上是「台灣意識」的催生者。雖然台灣的民主運動被斷層孤立是出諸於被動的因素而無可奈何，却總不無令人遺憾之感。

這個遺憾，在台灣民主運動進行了將近三十年後，終於為一群有心人士默默地努力，而開始彌補起來。這個為斷層架橋的，便是「夏潮論壇」的前身——「夏潮」。

一九七六年創刊的「夏潮」是在沒有其他黨外刊物中孤寂地誕生。當時處在「台灣政論」被停刊之後，「中壢事件」黨外聲勢再度高揚之前。是時台灣社會、經濟、民心正經歷深刻的變遷，但國民黨對異己的高壓政策基本上還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的舊方法。「夏潮」在沒有掌聲的時代，埋首為社會中下階層講話；鼓勵鄉土文學的創作；一個接一個地把被遺忘的日據時代台籍作家介紹給讀者。它並且系統地介紹日據時代台灣民間的各種反抗運動；持續地批判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對弱小國家的欺凌。

「夏潮」這種反帝，批判資本主義體系，關心中、下層民衆的路線不僅為國民黨所憎恨，也得不到部份黨外人士的諒解。特別「夏潮」對中國的態度，由於她不肯從於國民黨反共、反華，親美的宣傳，而從為當時世界上覺醒的知識份子所共有的受壓迫人民的立場來看待，這對部份長期受國民黨宣傳下的「中智階級」黨外人士是一個難以接受的态度。尤其是台灣的黨外運動，承續着「二·二八」的血淚及三十多年來國民黨不民主統治下的痛苦，帶有若干成份的「反山」情緒。這種「反山」情緒遇上台灣前途未定且日形從國際間孤立起來的國際局面，再加上海外台獨的影響，而逐漸在部份黨外人士心中轉化成台獨的主張。基於反對帝國主義的出發點，「夏潮」曾批判「台獨」思想中受帝國主義影響或利用的部份。這個批判更增加了部份黨外人士對「夏潮」的不滿。

「中壢事件」之後，「夏潮」逐漸介入民主運動，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初被國民黨停刊了。「夏潮」雖然停刊了，但它的成員以及在它影響下成長的一批新生代仍然在台灣的文學界、思想界，社會運動

及選舉活動中活躍。

「夏潮」的貢獻雖然逐漸為人所知，但它成員的處境並未改善多少。正在這時期，中共的理想主義因毛死後而退潮，「文革」時期的「傷痕」被大量揭露出來，但新政權在官僚特權與法制人權方面也是百病叢生。這些事件對於全世界覺醒的一代都是一種打擊，一股新的保守浪潮乃在世界範圍中迷漫開來。「夏潮」成員是在六〇年代世界性知識份子覺醒運動的背景中成長，它所具有的理想主義色彩以及對中共「文革」實驗的期待，與各國覺醒一代並無二致。因此，後來中共的變化，對「夏潮」成員也是一個深刻的震撼。

震撼後的自省往往是一個深沉、痛苦而漫長的過程。反省後的結論也往往是方向與程度參差不齊。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世界上許多原先蓬勃的進步運動萎縮了，瓦解了。「夏潮」集團自然也逃不過這個規律。在過去三、五年內，「夏潮」成員在對待中共的態度上有了顯著的變化，尤其中共逮捕魏京生、王希哲等民運人士，引起夏潮成員不同方式的抗議與譴責。在具體的作法上，「夏潮」系的份子也是看法不一，着力點亦不齊。有較重社會問題，有獨鍾環境保護，有加強參與一般黨外活動，等等。剛出刊的「夏潮論壇」，內容上也較重政論性與新聞性，與一般其他黨外雜誌相比，已顯現不出特別突出的風格。

儘管「夏潮」集團經過這麼多的挑戰，他們多數成員的基本看法與信念並未動搖。相對於其他各國進步集團，「夏潮」集團的「流失率」可說是最小者。這或許是台灣特殊的環境所造成的，在這個思想高度被控制的地方，一個人要接受進步思想就愈不易，他不僅要跟過去的舊觀念告別，也要跟既存的社會價值觀念相左。這些不僅需要巨大的熱情與勇氣，還要有更深刻的思想與認識。他們的基本信念因而也就比較不易喪失。

「夏潮論壇」終於再出發了。我們相信，歷經這番曲折之後，它將以更成熟，更具深度的內容貢獻給台灣民主運動。在當今黨外運動面臨挫折而尋找出路之際，「夏潮論壇」以其一貫的思想深度，以及對歷史與國際視野的認識與重視，將有助於推動台灣民主運動到一個新的境界，也將能繼續彌補因斷層而造成的種種偏差，把台灣民主運動帶到歷史與國際架構上應有的位置。



依然是個拖的局面

延了兩年多的國民黨二中全会終於召開了。這次二中全会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主要因為會中將提名下屆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從這裡可以窺探未來國民黨高層領導人的權力變化，以及國民黨最高領導人對台灣政局前途的可能安排。這兩者在二中全会之前均不明朗，因而成為矚目的焦點。

事前多數政論家均看好行政院長孫運璿，以為他將是蔣經國去世之後，國民黨「集體領導」的帶頭人。結果孫並未更上層樓，而且在提名他人（李登輝）後不久突發重病，緊急住院開刀。孫的重病突發使人們忽然發覺到，他已是七十一歲高齡多病的老人，其身體狀況未必好過蔣經國本人。於是孫立刻被政論家們從最熱門的接班人候選人中剔出名單。

蔣彥士原是第二熱門人物。如今孫運璿落榜，蔣彥士遂成為大家一致看好的人選。尤其蔣彥士的可能政敵，同為搞黨務出身的李煥，並未如許多人估計那樣地東山再起，再加上被提拔為副總統的李登輝和蔣彥士淵源極深，兩人同屬農復會系統出身。這更增加了蔣彥士更上層樓的可能性。然而，蔣彥士在國民黨內的資歷其實很淺，他之能有今日之顯赫地位，主要依賴蔣經國個人之提拔。他在黨內的羽翼並不豐滿；而他對軍隊、特務這些對統治台灣極具實權的控制系統亦少瓜葛；甚至在政界或財

經系統，他也經驗不多。這種主要依賴蔣經國鍾愛的權力，一旦蔣經國去世之後能否繼續下去，不無疑問。

李登輝的不次擢升也引起接班的猜測。另外，有人將之視為國民黨進一步台灣化的象徵。然而，我們看不出李登輝有比嚴家淦、謝東閔更具實力之處。即使蔣經國在未來六年之內去世，而國民黨內部尚出不了位大權在握的人物，我們也看不出李登輝能脫穎而出。

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二中全会並未如許多人事先的期望那樣，決定了未來蔣經國的接班人，更未對未來台灣政局作出安排。也就是說，台灣的政局，依然是個拖的局面。

由於台灣問題複雜，許多因素也非國民黨所能「操之在我」的，任何突破性的決定，均有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變化，導至台灣社會的不安。因此，拖延也許是蔣經國目前所能採用最好的，或是唯一的策略。蔣經國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然而，台灣的局勢是風雨前的寧靜，誰都知道目前是在「拖」的局面，也都知道「拖」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既然國民黨無能解決這個前途的重大問題，台灣人民若要避免自己的前途聽天由命、任人宰割的局面，只有自己站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也是台灣民主運動未來的基本任務。

都來支持 賀兆雄

山海經

賀兆雄是誰？為什麼要來支持他？

賀兆雄是個極其平常的人，平常到你在台灣任何地方都可能遇上這樣的人。他不是什麼達官貴人、青年才俊。他也不是什麼黨外人士、新生代。他沒有受到多高等的教育，沒什麼偉大的思想或理論。他是四川人，今年六十五歲，「歷經抗戰，剿匪諸役……來台後，轉到海軍擔任聯勤工作」〔註一〕退役後，便到漁船上當報務員，一幹就是二十年，沒什麼昇遷騰達。典型的李師科式人物。不過，他比李師科幸運，他娶了一個老婆，一個高山族的老婆。

然而，一個極平常的人却有不平常的作為。一、二十年的漁船船員生涯，使他深刻體會到船員的辛酸。為了爭取船員應有的權利，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及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他出來籌組船員工會。在台灣籌組工會，接下去我們就不用多說了，他所遭遇的各種打擊我們都不會感到意外。唯一的意外是，他居然還堅持下來。沒有被抓進去，更沒有心灰意懶地放棄這個既吃力不討好又危險的傻事。他大概不是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當然有，國民黨中央黨部社工會主任蕭天讚就是其中的一個。蕭天讚，這個漁民出身的台灣人，從他的家庭背景來說，倒應當是他來籌組船員工會才對。而賀兆雄，這個出生與「海」沾不上邊的大陸內腹的「阿山」，一個跟從國民黨來台灣的「阿山」，倒應當來當國民黨高幹才對。然而，這世界真是山海顛倒了。賀兆雄三、四年來傻傻地為船員的權利而忍受各式各樣的打擊的來源竟然是該來組工會的蕭天讚——國民黨主管民間社團的社會工作會主任蕭天讚。

由工人籌組的第一個自由工會

工會，在民主國家中是到處都有的，即使在被形容為「極權國家」的東歐波蘭，工人自己組織的

團結工會也存在了許久。可是就是號稱「堅守民主陣營」的「中華民國」，在其統治下的台灣竟然沒有一個由工人自己組織的工會。台灣當然也有工會，但那是由國民黨徹底控制，在勞資糾紛中常常站在資方講話的團體。由工人自己組織，由工人自己選出來的人領導，真正為工人利益講話的工會迄未誕生。

是台灣的工人們不需要工會來保障他們應有的權利嗎？當然不是！只要看看台灣近幾年來勞資糾紛的事件層出不窮，工人的抗議由怠工、集體抗議、暗中破壞廠礦設備的事實來看，便知不然。

然而，由於國民黨的反共政策與恐共心態，他把任何工運或籌組工會行動均看作是共產黨陰謀策動的，國民黨的棧民或安全人員偏佈在工廠各個角落。任何人敢予「蠢動」者，必遭無情的鎮壓。

然而，這種壓迫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台灣的勞工佔就業人口的一半以上，勞工問題已在各個角落暴露出來。七十年代以來，由於受到海外保釣及國際性學生運動及知識份子覺醒運動的影響，台灣的大學生開始喊出「向社會進軍」的口號，一些鄉土文學作家也把他們的觸角伸到工人角落，寫出了許多以工人生活的對象的文學作品，把勞工問題普遍地傳遞給社會大眾。社會大眾開始有為勞工說話的聲音。

民主運動的成長也有影響。勞工佔就業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又屬於受壓迫、剝削的地位，先天較易支持黨外。黨外為了爭取票源，也有必要重視工人問題。在思想原則上，雖然許多黨外由於其中產階級身份，對於勞工問題猶存顧忌，但也有一些較具社會意識的黨外人士極力為勞工講話。甚至一般知識份子，站在「民主」的原則上，也不能不為勞工說話。

「地獄船」的常客們

賀兆雄的工會運動，是多年來台灣最受注意的一次工人民主運動。農曆年關前後，台灣南部各報紛紛以頭條、專欄等醒目篇幅大量報導。台灣工人終於繼黨外選舉運動之後，開始展開自己的民主運動，這是多麼令人鼓舞啊！

二月間，賀兆雄在高雄舉辦了台灣工人首次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宣佈三月一日即將正式成立「高雄市漁船船員工會」。招待會上闡述工會的宗旨、目的及組織活動，並散發各項有關文件：「元月卅日第一屆籌備會議記錄」，「工會籌備會致高雄市政府的成立申請書」，「高雄市漁船船員職業工會章程草案」以及「記者招待會新聞稿」。我們要特別感謝「佚名先生」為我們搜集這些珍貴資料，携來海外寄給我們。限於篇幅，我們只能轉載部份文件。讀者如欲讀未刊出文件，請寄工本費一元來本會（OS DMT P.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除了上述文件外，台灣黨外刊物亦有多篇報導此一事件。本會目前收藏的，計有：

關懷雜誌，1983年5月5日

- 1 討海艱苦誰人知／陳良玉
- 2 一個工會的故事／裘慧兒

亞洲人 1983年3月

- 1 台灣第一個自由工會／羅思遠
- 2 船員、船東與黨部的三角糾葛／姚勁毅
- 3 船員工會的催生者／吳昱輝

前進廣場／時代

- 1 漁民生命何價／李立（第7

復決，建議廿權利，有遵守本會章程服從決議案，繳納會費義務。

七、我們船員工會的組織：設有人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理事會下設福利組訓、公共關係服務共五組，理監事人員由大會選任各組辦事人員由理事會聘僱。理監事任期為三年，預定理事五人監事一人。

八、我們船員工會的經費：其來源有入會費、經常費、臨時募集金、特別基金廿四種，不維持會務費用，依法政府不予津貼，在未開成立大會之前暫由籌備會訂定入會費為卅元，經常費每月為卅元預繳一年。俟之會成立大會之會員大會討論決議者為準。

九、我們船員工會目前和未來一定在法理情三方面兼顧及和諧之下展開會務工作，可是環境特殊，我們依法進行籌備工作，到了阻礙我們將這些阻礙情形，頭提出敬請諸位指導，如何才能解決這些阻礙，使我們船員工會能如期召開成立大會。

這是1984年2月底漁船船員工會成立之前的記者招待會新聞稿。注意文末說：「我們依法籌組遭到障礙，我們將這些阻礙情形用口頭提出。」

期，83年9月24日)

- 2 未完成的戰歌／知山（第1期，84年1月14日）

夏潮論壇

- 1 海員的遭遇說明了什麼？／王嘉生（1983年5月）
- 2 賀兆雄組漁船工會血淚斑斑／甄民選（1983年8月

)

- 3 誰來為漁民補破網？／編輯部（1983年10月）

- 4 全面支持賀兆雄工運／洪天壁（1984年3月）

海潮 1983年9月

- 1 賀兆雄對蔣彥士的抗議／賀兆雄

諸位記者先生暨各位來賓：

我們高雄市漁船船員工會籌備會謹以愉快的心情和感激來歡迎諸位光臨賜教。船員工會得有定於三月一日召開成立大會，這是諸位四年主持正義而賜予的。我們船員永銘不忘也。感謝中央及地方各首長督帶忙，為使社會大眾對漁船船員工會有所認識和了解，說明如左：

一、我們組織船員工會的目的：是為改善勞資關係和糾紛，直接或間接營救被外國扣留的船員早日返國與家人團聚，促請業主及船上注意安全設備，滅火海難發生及船員死亡與船主損失。船員家屬有一確實生活保障而免後顧之憂，安心在船工作，改善船員伙食增加體力，才能勝任勞動工作。

二、我們船員工會的宗旨：是以團結漁船船員互助，保障船員權益，增進船員技能知識，促進勞資協調合作，共謀漁業增產，改善船員生活為宗旨。

三、我們船員工會地址：以高雄市前鎮漁港為適宜，借用或租用房屋辦公。

四、我們船員工會的任務：除法定任務外，為船員及其家屬服務，也為船主或其團體服務。

五、我們船員工會會員資格：是年滿十六歲以上，實際從事於高雄市籍漁船工作之船員（船長依法不得為會員），領有船員証或船員手冊，不論在船服務或在岸待雇，均得加入本會為會員。

六、我們船員工會會員的權利及義務：享有工會保障權、選舉、罷免。

以上各文，讀者如有索閱者，亦請來信，每文附工本費50分。

我們提供這些資料服務，係基於台灣第一次工會運動重大意義的認識。在台灣，黨外新生代已有一個普遍的「共識」，即：民主運動要更上層樓，一定要和佔人口一半以上的工人結合。我們希望海外支持台灣民主運動朋友們，也共同來關心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

另外，台灣的漁船工人，是

台灣社會最墊底的人。他們工作最辛苦，待遇又極低，普通工人多不願上船。結果台灣當局有計劃地將山地同胞趕下海（見「都來支持賀兆雄」一文），這種社會制度！這種種族壓迫！這是多麼令人憤怒的事啊！

目前台灣山胞男的多淪為船員或其他墊底的工作，女的則多被迫下海為妓。這個下「海」，不是一般的形容詞，而是真正的下「海」，下到船上當妓女。名

作家黃春明最近開拍一部電影：「我的名字叫蓮花」，便是描寫山地女人下海為妓而欲泅泳登陸，脫離苦海，當一個普通人的真人真事。賀兆雄的太太也是山地同胞，原屬阿美族。她在中船當臨時工，刮鐵鏽。賀兆雄四年來奔走工運事宜，往往沒時間工作，全靠他這個阿美族老婆支持。二月間據聞他曾一次工作中跌倒受傷，全家人窮得啃吐司飯包過日子。

台灣四面環海，漁業是台灣的一項重要天然資源。共有漁民六十多萬人（根據「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漁業年報」1973年，共有漁民628,865人）。台灣漁業分養殖漁業、沿海漁業、近海漁業及遠洋漁業。其中，遠洋漁業成長最快，其漁量從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的二萬五千公噸猛增為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三十五萬噸左右。

遠洋漁業的組織方式為資本主義的，即成立漁業公司。漁業公司的老板出資，真正工作的漁民實為被僱傭之工人。他們領取薪酬，或按漁獲量分紅，而非傳統自釣自賣之漁民。

遠洋漁業的漁民不僅是勞工，而且是最辛苦的勞工，讓我們引述一段政大碩士論文「台灣鮪釣漁業之現況與其發展」（賴本隊作，1968年。第五十六頁）：

「鮪漁船有『地獄船』之名，係指船員身處其中有如地獄，因鮪釣漁業每航次出海時間多達二個月以上，而且，鮪船愈大，出海日數愈是加長，唯其如此，在茫茫大洋之中，週旋於彈丸之舟，日與鹹風艷陽為伍，顛波勞碌，難免心理上及生理上有極大影響，況且每日勞動時間在十八小時以上，睡眠及休息僅得六小時，實際睡眠最多不過四、五小時而已，試想數以月計的睡眠不足，出海又久，補給供應亦難盡如心意，且資方為確保經營利潤，採用分紅辦法，一方面加強船員勞動，一方面延長勞動時間」

漫長單調的生活，每天用只睡四、五小時，而他們的待遇呢？關懷雜誌1983年5月5日有這樣的描述：

「原來，漁船船員受僱上船前，按例都必須先與船公司簽訂由資方逕行擬訂的書面契約，其中載明公司應按月支給船員家屬「安家費」若干。這筆安家費其實就是保障待遇，目的在維持船員出海後，家裏起碼的生活。

根據台灣省「漁業局」的規定，安家費必須依照物價漲幅機動調整，但目前各個船公司，顯然都將這項支出故意壓低，遠洋船員僅九千元，近海只有四千元，比陸上一個童工都不如，完全失去安家的原意。

更有甚者，訂約的用意，本來在使雙方當事人「先小人後君子」，各自將條件先拆明談妥，而後切實遵行。可是船公司為了招攬船員，又不願付出相對的代價，往往都有「先君子後小人」的習慣。

許多遠洋船員後來陸續發現，當他們在風裏浪裏為公司冒險賣命時，「安家費」竟無端被停發，岸上家人好幾個月領不到一毛錢，瀕臨斷炊。」

在這種勞動重待遇低的情況下，船員招收不易。一般人多不願上船為船員。只有那些受教育低，貧窮的家庭孩子才上船，根據台北市銀行徵收室編印的「台灣區遠洋鮪釣漁業調查報告」1972年，船員中三分之二左右只讀到國小，還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是不識字的。

這批國小生或不識字的從何而來呢？上書第111頁，洩露一個天機：

「至於船員的招訓，因近年遠洋鮪釣漁船迅速增加，不但幹部船員缺乏，即一般船員更感奇缺。最初，多由漁村青年子弟立任一般船員，惟船員增加迅速時，漁村青年子弟已無法充數。現時，一般船員的來源，多數係以山地青年充任。山地青年就業不易，適逢船員缺乏，充任船員，實為就業的良好機會。且山地青年體健力強，刻苦耐勞，適宜擔任遠洋漁船的工作。今後，招訓山地青年充任一般船員，實較適當。」

原來是有計劃地招募山地同胞來當船員！山地青年不是為娼，便是當最粗重難幹的職業。

都來支持賀兆雄

台灣的海員工人，是台灣工人的一個縮影。不論站在人道立場，站在民主運動的立場，我們都應關心他們，支持他們。

而今，一個平凡的海員出來為自己的權利組織工會。讓我們都來支持他！

註一：吳昱輝「船員工會的催生者——賀兆雄其人其事」，亞洲人四卷四期1983年3月。

EDB 返台行

海外促進台灣環境 運動的一個实例

沈道洲

EDB 這種劇毒的致癌農藥，已於今年二月三日被美國聯邦環境保護局以緊急命令禁掉了，然而它早已隨着台灣每年大量進口的小麥，雜糧柑桔等農作產品，毒害了我們同胞廿多年。台灣國府這次也以破記錄的快速於二月十日禁止該農藥的進口與使用，又於二月廿一日宣佈將對所有進口的糧食嚴加檢驗。台灣一般居民也極迅速普遍地認識到了進口糧食中可能含有EDB的有關事實，並展開了適當的因應自保對策。

然而我們瞭解這次使得EDB的震撼由美國迅速有效地傳播到台灣的過程中，一位華裔生生態學者寧明杰先生以及他所代表的「發展與環境研究會」(Association for Better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少吃進口糧食及香桔士

該會鑑於以往的觀察，每當先進國家開始加強保護本國環境，保護本國消費者、職業工人之時，商人就常常將不合本國規定從市場剔除的產品輸往第三世界去傾銷。種種考慮使得該會會員認為，二溴乙炔穀物柑桔汙染問題不但早已存在於台港、星洲地區，今後可能會更加嚴重。該會在這次EDB事件剛剛發生之初，去年十二月廿三日即以越洋電話對台灣有關單位及新聞機構，作出緊急呼籲：

一、少吃麵粉及進口雜糧，改食稻米及其他本地出產糧食。

二、不要吃美國進口柑桔，不喝「香桔士」桔汁。因為二溴乙炔也為柑桔及其處理設備的燻蒸劑。改吃島內季節鮮果，既安全又營養。

三、衛生單位及環境保護局應即刻開始對市面麵粉、玉米粉以及有關產品作抽樣及來源調查，並據二溴乙炔含量高低結果作適當處理(公佈結果、停售等等)。

四、官方應設立進口小麥及雜糧的二溴乙炔或其他有害農藥殘餘量規格標準，並應即刻下令停止使用二溴乙炔。尤其是港口穀倉、麵粉廠、飼料廠

的倉儲及設備，嚴格執行檢驗。

五、加強推廣本國稻米糧食的食用，發展「有機農業」(不含農藥、化肥)，減少進口糧食。

返台作面對面的遊說

為了達成更積極，更具動力的效果，寧先生於二月七日帶了豐富的資料及電視錄影記錄自費飛返台灣，展開了為期兩週一連串的「面對面」的遊說與演講工作。他參加了經濟部農業局為處理EDB事件而召集的特別會議。會中他除了提供資料與觀點外，並特別強調進口穀物及水果中所帶的EDB的管制，因此而導致兩週後在衛生署召開的第二次特別會議的熱烈爭論。

他又應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邀請，舉辦了一次大型的記者會。次日(二月十五日)，在國民黨的二中全會推選正、副總統的熱線新聞競爭的情況下，各小報紙(除了中央、中華、新生等黨報隻字未提外)爭相以頭條大篇幅的報導EDB的毒性，勸告國民多吃本地農產少吃進口糧食，以及要求政府訂出比美國更嚴厲的標準等主張，以保護本國的消費者。這次的新聞發表普及使得「EDB的震撼」真正地渡過了太平洋，達到絕大

多數國人的家庭中，草根性力量也因之得以發揮可以左右政策的地步。

此後他又應邀在「生活素質研究所」及許多甚至不同的場合作了多次演講；接受了前進、夏潮、台灣年代（生根）及一些非黨外的報章雜誌的訪問。最後又接受台灣電視公司的「熱線追蹤」節目的訪問，並且協助該節目製作了一個專題報導。中國廣播公司並在一個長達20分鐘的評論中介紹EDB事件，並播出「研究會」對台灣當局及民間的緊急呼籲。

然而隨着這些正面力量的發揮，涉及了有關的工商界及部份既得利益者，也為寧先生及他在台的親友們帶來一些負面的困擾。他們都突然地接到了多次來路不明的恐嚇或辱罵的電話；謠言多起，指控寧先生是「台獨份子」，「專程回國來破壞中美貿易關係……」等等。

返台遊說的目的與意義

「發展與環境研究會」的成員們在寧君返台的前後都曾有過一次計劃與檢討會議。雖然在會中都有過些不同意見的爭論，但也都對寧君這次返台說明EDB事件的意義，達成了以下數點共識：

1. 使EDB污染穀物果蔬菜事件能更迅速，真實的傳播到國內有關當局及民間團體與個人。強調此一重大污染事件，不僅發生在美國，同時順着進口穀物柑桔等，也早已存在於國內，並且今後將因為穀商果商的傾銷在美國已被剔除的不合格產物而可能更趨嚴重。
2. 遊說有關當局急速開始加強管制進口食品。
3. 提供消費者妥善自保之道。
4. 可使國人重新認識消費本國稻米、果蔬不但對個人安全健康有益，更可有助解除稻米過剩危機，解除農業危機，可以促進整個社會的安全。
5. 可以再次藉機提倡「有機農業」的發展。
6. 可以藉此一事件強調環境保護，食品藥物管理的重要。
7. 藉此事題遊說「非政府組織」（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民間消費者保護及環境保護等等社區團體的重要；政府應

鼓勵民間自由組織發展，以輔助政府功能之不足或不當。

8. 使該「研究會」本身多一次實踐及認識台灣社會的機會。並將促使「研究會」與官方及民間社團的溝通。

總之這一次行動有着多方面之重大意義及功能。

由紙上談兵到「以事題團結的草根運動」

最近我們有機會見到剛從台灣歸來的寧明杰先生，在問起他這次返台最大收穫是什麼時；他很感慨地說，「過去五年來曾與「研究會」作過不算少大大小小的不同主題的研究報告，諸如有關中國的農業，環境，能源，糧食，國防，社會福利，交通，乃至民主人權等之方面的發展與改革等等」，但是他也像絕大多數關心海峽兩岸問題的「有心人」們一樣，（不論是左或右或獨，黨內或黨外），都可說是在「紙上談兵」。論調或高或低，或新或舊，大多是屬於「坐而談」的，或所謂「客廳內革命」之類。近年來他雖然已自覺到這點，並一再地在文章或演講中批評及自我批評，提倡楊遠老先生提過的「草根運動」，提倡在國內，（尤其是台灣）政治條件所容許的情況下推行社區組織運動，諸如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及社區小報紙等等。「以免海內外許多有志社會改革的青年再誤投入浪漫而不切實際的「革命」行列，浪費青春，浪費精力智慧，浪費情感。並且製造分裂，依然就溺於國內一盤散沙不團結的劣性傳統」。他甚至於已着手研習許多有關社區組織運動的基本技術問題，提倡「以事題（issues）來團結個人或團體」原則。然而他說：「這次返台說明EDB事件，才真正地，首次從「紙上談兵」的客廳或課室走出來。返台先後的兩個月間簡直像位「初上戰場的小兵」——緊張，刺激，收穫良多！」

癌症細胞不分黨內外

EDB這個issue 真正地令他覺得是可以「團結」了不少個人及團體。左，右，獨，黨內

外都在政府與民間，都在圍繞着 EDB 討論，謀求解決之道，他引用一黨外朋友的話：「癌症細胞是不分黨內外的！」並且令他感動的是這位黨外朋友竟忠告他說：「這個 issue 不應先讓黨外去炒，那樣一定會壞事；應先找中央日報及官方的人事去辦，我們黨外再跟進。先讓官方及國民黨拿點 Credit（功勞）就好辦了！」

另外，寧先生還提到：「消費者基金會」的柴松林教授，李申一秘書長以及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是這次的「成功」的一個極重要的樞紐，沒有他們的支持是不可能如此重大的傳播成就的。他們可說是台灣目前民間最強大的一個草根性的「壓力集團」（Pressure groups）。他們的工作，不論是對外或對內，效率之高令人欽佩！然而從成立到現在才過剛剛三年而已。」

另一件令寧先生感到驚奇與感慨的是，一般

政府機構及大眾都很具有積極的改革意願，而改革最大障礙却是來自既得利益的工商企業方面。「這些人也是沒有黨內外，本省外省之分的。所以如求社會改革，工作的對象應多強調在這些人上面。」

這一切都深深地令他感到：「服務大眾的草根性社區組織，在台灣已到了可以開始向下紮根的時間了。在沒有「革命」條件，也沒有「革命」必要的台灣現狀，草根性的社區運動，可能是「體制改革」的最具效果的，最根本的，最容易的，也最可行的途徑吧。」

從與寧明杰先生的談話中，筆者不僅更深一層的認識了先進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傾銷 EDB 之類禁售商品的嚴重性，也看到了一種留居海外為自己鄉土出力的可行方法。這或許是寧先生自掏腰包萬里行的另一收穫吧！

陸大集

— 意 — 見 — 的 — 回 — 響 —

· 發行部 ·

親愛的讀者們好：

謝謝您們對於「民主台灣」的支持與愛護。我們於今年三月初發出的抽樣意見調查問卷已有初步的回音。實在很感謝朋友們在百忙之中提供的許多的寶貴建議及經濟上的支助。我們仍將繼續發出問卷，希望讀者們接到後也像已回信的這些朋友們一樣給予我們寶貴的批評與建議，群策群力地使這份屬於大家的「民主台灣」成長茁壯。

如今我們做了初步的整理，使讀者們分享我們看到這些可貴意見與具體建議的親切與欣慰之感。

一般說來反應都是很正面的，對於讀者的稱讚，我們除了衷心感謝之外，也覺得應該更加鞭策自己，精益求精，不負讀者的厚望。最主要的是把具體的建議列舉出來，在「民主台灣」裡面彼此交流，激盪出更多的回響。

對於出刊的頻率，大致覺得雙月刊的現狀很好，也有人認為應改為月刊，另有一位讀者說「量經濟情況而定」。

致於社論方面的批評如下：「也許題目內容焦

點集中具體點比較好」「應該使讀者看到社論時有切身之感，而能產生共鳴與得到指引的方向」。

針對「民主台灣」文章內容的各項調查，都是「好」或者是「很好」。有人認為可以「維持原狀」，絕大多數都認為有改進的必要。具體建議列舉如下：1. 增加「讀者來函」一欄。2. 「貴刊有不少珍貴文章，望每期也能出現一篇珍貴的報導」。3. 「政論文章火候不夠；對國內民主運動了解仍待加強」。4. 「希望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國家發展出來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之介紹」。5. 「增加兩岸科技發展近況」的報導。6. 增加「比較仔細的 Review」文章。7. 對於探討中國方面：「屬於意識形態方面的文章，不易討論出甚麼結果來。也許該多談一些經濟、社會層面的中國問題，比較具體。例如「四化以來中國經濟政策的檢討」，「文革是否一無是處？」，「中國的人口與墮胎問題」。8. 針對瞭解台灣這一項：「應該增加份量」，「可做為台灣與大陸兩邊政治之評論，政治人物之比較，歷史淵源之介

紹等」。9.「認識世界方面」大多數都認為應增加份量，也有人希望減少。10.「歷史」方面，大多數也認為應該增加份量。11.「文藝」方面的批評：增加與減少其份量的意見都有，有位讀者寫了「編排版面較呆板，缺乏設計」。您們對於以上這些珍貴的意見有什麼感呢？歡迎您們來信批評指教。

此篇文章的報導原則是採取盡所有可能用讀者的原來用句，因而都用引號括起來，來表達問卷調

查的結果。我們處理這些可貴問件，也是保持編輯「民主台灣」的原則，忠實嚴謹，希望我們的努力能引起更多的共鳴與回響。有些讀者在回信之中還夾着一張小簽「……我預訂以後每月寄10元給“民主台灣”略表心意，希望更多的人各盡些力量。」讀者們的鼓舞與支持是編者們最大的快樂，讀者們的建議與批評更是我們前進與改進的最佳動力與催化劑。

台灣結與 中國結的 企業化

—李哲夫—

近年來在台灣爭論不休的「台灣結」與「中國結」原有其感性的，或「意識的」的基礎。人民的這種感性被統治者壓抑，不能提升為理性認識，鬱積而成「情結」。政治運動領導人或統治者利用這種「情結」，以達其政治目的，是為「情結」的「企業化」。

李哲夫先生以其社會學底，冷靜的眼光，為我們整理這個盤根錯結的「情結」問題。他特別指出，因辛亥革命及抗日而形成的「中華民族意識」，到了台灣被國府改成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其終極目的是要建立一種新的「台灣中國意識」，不僅促成了「台灣結」，也產生了「中國結」。究其本源，實出於國府自身的「台灣中國結」。

文中又從國際政治關係角度，分析「台灣中國結」者，及「台灣結」者致力於爭取美國政府的原因，指出在美國的「台灣結」及「台灣中國結」二者均具有「美國結」。這種「美國結」會不會也逐漸輸入台灣內？

——編者識

「結」的涵義

「認同意識」的問題，最近在台灣掀起了不少的爭論。比之從前，這類問題的討論，針對「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認同，在現時的台灣島內變得更公開，更能為國府當局接受似地。另一方面，在這些問題的討論，出現了「台灣結」與「中國結」等的新辭匯。用上「結」這個字眼，影射了一

種「病症」。無非引用者，意味着當代對「中國民族」及「台灣鄉土」存有着一定程度錯綜複雜的情結。也就是說，中國意識或台灣意識，雖有它各定的感情基礎，但並未完全發達成為理性的認知。又因為認知上仍形混淆曖昧，行動上或有不知所措之苦，因此產生一種「鬱悶」的心理狀態。

心理學上，個人錯亂難解的「情結」的產生，常常歸因於受壓抑的「感性」問題，不能提昇為清

晰的自我認知，更不能付諸理性的行動來解決存在的問題。那麼，為什麼在今日台灣「中國意識」會演變成「結」呢？對這一問題作正面分析的文章並不多。大部份的討論是直接引用「台灣結」與「中國結」，即已設定這兩個情結是並存在台灣居民的心裡的。然而，為什麼論者與讀者都能不言而喻，接受這兩個「結」存在的設定呢？顯而易見地，台灣當局政府的對內政策，「明」的一面，還是不肯放棄自居「法統」地位，所以仍亟力壓抑民間對「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問題的表面化，因而造成「結」的民衆心理。可是「暗」的一面，或者僅限於高階層的決策圈子裡，並包括一些海外的「高級」知識份子，目前正熱烈討論如何將台灣「國際化」。為發展台灣的貿易經濟而探討國際「實質關係」的多元化，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國府政治策略上調整的方向，正趨於所謂「台灣中國意識」的製造，企圖運用現存的「台灣結」與「中國結」的企業工作，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過去對於這兩個「結」之間的矛盾討論較多，而對於存在的這兩個結的相互運作，以及政治策略上可能產生的作用等，仍少有人剖析。在此短文裡，我將就當代一般「社會運動」，包括以種族或民族意識為基礎的政治運動在內的一些觀點，提出「台灣結」與「中國結」企業化的一些觀察，供讀者參考。

種族、民族運動的「企業化」

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地種族、民族意識普遍抬頭。基於膚色、血緣、語言、文化或特定的地方利益界綫的政治鬭爭，蔚成風氣。過去受殖民的地方，以「民族自決」的名義，成立了新而獨立的國家。然而，繼獨立之後，新的國家政權也往往面對着自己國家內部，以宗族部落、語言文化劃分不同「民族」利益的挑戰。有些觀察家一時認為這只是「國家主義」未臻充分發揮的新國家特有的現象，國家社會尚未能「統一」地方利益為中心的部落社會。因此預料，現代化包括工業化，都市化以及大規模國家政治機器發達之後，以「民族」為基礎的政治鬭爭，就會為其他經濟的，社會階級的利益界綫，取而代之。

但是，經過了一些比較研究，綜觀歐美工業化國家在六〇及七〇年代的經驗，他們發現在這些國

家社會相當發達的國度裡，種族、民族之爭，有如少數民族運動在美國的民權運動者，反而有增無減。雖然「民族政治」的運動方式，和平的政黨組織及選票爭取乃至暴力的應用，各國各地互相差異，但是走「民族路綫」的社會運動及政治鬭爭，在世界各國仍是個存在的事實。因此，下列幾點總結當代對「民族政治」的一些觀察比較所得：

(一)「民族意識」並不完全基於所謂客觀的界綫。膚色、血緣、語言文化等的差異，作為認同的基礎是有「自願」的成分的。這些差異成為政治競爭的基礎，與職業的、經濟的或階級利益的差異之為政治基礎，是有相似之處。因此「民族意識」可經由民族運動而喚起，而民族運動必需有「民族組織」甚至「民族運動企業」來運作可供利用的資源，才能有效地達成改變現況的運動目標。

(二)「民族運動」之為政治路綫與否，與政治的「權力市場」有關。與其他經濟的、或階級的界綫相較，如果走「民族意識」路綫是有利的，政治運動的團體以及有關的「企業者」會選擇運用「民族路綫」為他們的政治資本。大致說來，工業化，都市化及大規模的團體組織化的現代化國家裡，因為政治競賽的多元化，種族血緣，語言風俗等「民族認同」的因素，也會受到重視成為可資運用的政治資源之一。

(三)「民族運動」與其他社會，政治運動一樣，最終的目標，是要把「民族、民權」矛盾提到當局的權力中心的議程之上。能直接接觸當局的權力中心，固然最為有效，但是要受到權力中心的注意，必需也運用「草根」群眾的資源——認同的道義，金錢與時間的支持。當草根基礎雄厚而易於推動時，運動的領導團體會集中在草根階層做工作，以期把握其「代表性」。當草根基礎薄弱而不易起作用時，運動團體的企業較着重「當權派」的權力中心的反應。在此一情況下，「民族運動」的團體組織，對草根階層必需「販賣」民族意識。應用現代化大眾傳播的技術，如大量的郵寄，經由電視製造形像等，以量取勝。當然採取這種策略，需要大量的財資及專業性技術。既使得來的「會員」草根性不深，他們的支持也是較為片面的，冷冷地，隨着「市場空氣」而轉移。

(四)二次戰後，國際組織興起，又有美、蘇兩超級強國稱霸國際，各爭其中心利益。持有「國家」

地位是有助於接觸，運用國際上的中心資源的。這直接間接地鼓勵了各國內部「民族鬭爭」的國際化。反對當局的一派會朝向國際組織，或國際中心國，推廣他們的「民族運用」。而一國政權的當局者，則必需也向國際中心去作「反運動」的工作。許多國家的正，反兩派相互促進國際化，使得國際中心國，像美國的當政、不管願意不願意，都得三頭六臂地延伸他們的「內政」到中東，中南美等等第三國的內政問題。還是有目睹的當代國際政治現實。

基於上述幾點來觀察台灣目下的「台灣結」與「中國結」，就不難了解當今的一些「民族政治」運動的趨向了。以下僅舉出幾個較突出的運動趨向的例證。

「中國結」對「台灣結」

中國民族意識，在辛亥革命時期以及抗日戰爭期間，的確在群眾草根階層大大高漲。到了國共對抗及國府遷台之後，「民族意識」就漸漸轉成為政治上層的宣傳工具。上節第一點提到，民族的界綫雖有它客觀的基礎，但對那一特殊的界綫標準，血緣，語文，風俗文化等來認同，則是相當有彈性的。

大體說來，國府在台灣自五〇到七〇年代，在運用「民族意識」的政治企業上，是相當有成就的。首先，對內台灣居民，包括大陸籍的移民灌輸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反共鬭爭不僅是國府要贏回對大陸的政權，並且是維護「五千年偉大的中華文化正統」，甚至「民族存亡」的戰爭，對於大陸移居台灣的人，這樣的抽象民族意識可以隔絕他們對大陸鄉土與人民的認同。但是過份強調「舊」中國大陸時代的文化，並且壓抑台灣的「地方主義」文化，對原籍台灣的人民起了反作用。簡單的例子，就是國府在台灣推行「國語」時，受歧視的只有台灣人用的「閩南話」，其他大陸南腔北調的鄉音土話，都籠統地包含在「國語」之流，即使不是正宗的。其他種種不勝指數的壓抑「台灣意識」促使「台灣結」形成，而有政治行動志氣的人早期就轉入地下，或流亡海外。這替七〇年代以後，在海外「中國結」及「台灣結」的正面對抗播下了種子。關於這一點在下文中再回頭討論。

國府在台灣不僅把早期「衛土、衛民」的中國民族意識調整為「中華傳統」的抽象意識，許多大陸人士在台灣親歷「大陸關係」與「台灣關係」的實際利害差異，也很有彈性地把省籍認同代替了「民族認同」。另一方面，國府的「民族運動」企業，自五〇年代起就沒放鬆過對國際資源中心的開發。在美國有力的「中國遊說團」拉攏反共的美國人繼續支持在台灣的「自由中國」。在中共大陸對外封閉的期間，台北就像在台灣的「故宮博物館」一般，是一個中國的櫺窗。這期間，國府也有效地把握了海外華僑的民族認同，因為他們的居住主國只承認在台灣的「中國」。

上述簡略描述的國府在台灣及海外的「民族運動」政治策略大致持續到七〇年代初期。從台灣退席聯合國，尼克森叩開了中國大陸之門以來，雖然調整其策略是漸進的，但其為今天「國際化」及「台灣中國意識」的路綫方向，就已經成為定局了。這個新的民族政治調整，首當其衝的就是多年來潛伏的「台灣結」。七〇年代以來，國府對「台獨」運動，驟然高提上綱。在此之前，台灣島內國府對於「台灣意識」的政治運動是暗抓不明辦，對於群眾的「台灣結」顧忌到它受刺激而擴大。七〇年代之後，反其一貫作風，正面並誇大地渲染「台灣意識」的恐怖性，是「數典忘祖」，「引狼入室」使「共匪」佔據台灣，全台灣居民流亡海上的「台毒」。這很明顯地，國府的「民族」政策，從「代表全中國」民族存亡的法統政府，轉為爭取台灣居民為自己生命財產的向心力。這個原是高入雲霄的「中央政府」直轉急下，向「台灣鄉土意識」直接爭取市場，無怪乎在台灣的黨外，要想運用草根性的「台灣結」時，只要風吹草動，就會收到強烈的「合法」暴力的反擊。

在台灣島內，國府幾乎全面壟斷的市場下，反對國民黨的黨外政治運動者，要應用「台灣意識」去動員，可能比動員其他資源，如職業的，經濟的其他利益界綫，要來得不利。如前節第二點所說，「民族」路綫的選擇是有它一定的市場條件的。至於在海外呢？「台灣意識」的政治運動者，是有它一定程度的市場條件的。以美國的情況來說，第一，從台灣來的移民自六〇年代末期加速增額。移民當中一旦離開台灣社會，大多個別納入美國各行業階層，自己之間無所謂其他現實條件的共同資源可

待政治運動者開發。相對之下，自台灣帶來的「台灣結」的共識是可供利用的政治資源。第二，近年來，美國不僅有所謂「人權外交」的政治空氣，美國國內的「少數民族」運動也大大開了「民族政治」的風氣。介於對美人權外交，與對少數民族如「亞、太裔」美國人的民權保護之間的一種模糊意識，「台灣問題」越發能提到美國國會的議程上。如前節第三點所說，以「台灣意識」為基礎的政治行情，近幾年在美國較之看好。

因此，當國府轉換其形相，要以「台灣的中國」新面目出現時，在美國的競爭對象自然就成為過去多年來以台灣意識做基礎的政治運動者。正如前節第四點所提，當國府在台灣見機行事，採取「台灣化」路線時，對國際中心國——美國，就益發感到海外「台灣意識」運動的存在及其威脅性。因此，也就重視在海外與之對抗的「反運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在草根階層工作方面，由支援校園裡的「中國同學會」擴大到辦理「台灣同鄉福利會」以對抗「台灣同鄉會」；國府的海外工作，由從前地下工作式地特務監視「分政份子」轉為加強較正面地派出「可靠」的較年輕的「開明派」人士，到海外來與「台灣同鄉會」人士「溝通」，但是，畢竟在海外居留的華人，華僑脫離了台灣社會的具體環境，他們的「台灣結」與「中國結」相對地抽象化了，這些問題在他們海外的實際生活裡不佔直接的利害關係地位。如前節第三點所述，在草根性的支持力薄弱，這個支援的可能性不易開發，缺乏濃厚的「奉獻」性時，「台灣意識」或「中國意識」的運動與反運動，會傾向「權力中心」去作努力，而對草根群眾的工作採取較「宣傳」方式的，以量取勝，而不能深入建立草根性的基盤。近幾年在海外，中文報刊雜誌不惜血本地相繼創辦就是一個例證。並且，為了爭取海外讀者自身利益的認同，各種報紙，包括由國府首肯從台灣輸出的海外報社，都正在擴大它們的「華僑社會」的版面。

海外的權力中心當然是非美國政府的執政當局與國會莫屬。因此海外的「台灣結」與「台灣中國結」運動及反運動者，就集中他們的人力，財力投資在爭取這個權力中心的注意力。不論是對海外華人，華僑的草根啟發工作，或是對美國政府爭取青睞而來擴大運動，這些運動企業都需要一些起頭資本。一度還未面對市場上的競爭者，以「台灣意識」

為基礎的運動企業，雖然是小本經營，仍能生存，一旦，國府在美國以「非官方」身份的「北美事務協調會」以及從前由台灣駐美大使館的功能單位轉化成「民營」公司來相對同一個市場，去推銷「台灣利益」時，「台灣意識」的運動與「台灣中國意識」的反運動團體相比，就成小巫見大巫。後者不僅僅能夠在華盛頓拉攏已具同情的美國國會議員，並且能夠運用台灣的貿易順差積累的外匯，深入美國本土的草根，到各州各地方作「政治採購」。從企業經營的觀點看，在市場上競銷的商品大同小異，小本公司難有生存的機會。往往小公司受到大公司的合併，而原先小公司的經營者，不是轉入受顧於大公司，就是放棄本來的行業。在海外的「台灣結」與「中國結」的對抗運動中，若已經有蛛絲馬跡，運動與反運動者漸趨認識共同利益而妥協者，將來這樣的情勢將更呈明顯。

最後，我要提出上述運動過程對運動企業者可能有的反饋作用，來結束本文。

「美國結」——兩結的併發症

前面大致已經說了，「台灣結」的美國化是對抗國府在台灣壓抑的產物，而「台灣中國結」的美國化，是美中建交震撼之下而出生。既然有兩個運動企業都以美國為中心市場。雖然運動目標是要能影響美國政策的發展方向，但是美國的既定政策是他們的領導思想。因為任何運動企業難各有它們的團體目標，運動經營者的個人往往要兼顧自己的利益。今天台北國府取用的外交謀略策士，大部份是受美國教育，回台服務的「美國專家」或定居美國的「中國專家」。近幾年，這些專家們的獻策很明顯地緊跟着美中關係的變化而調整。只要在美國市場「台灣問題」能夠維持行情，以企業者的眼光看來，他們可以繼續受顧於台灣國府，美國，甚至中共政權，有他們一定的咨詢地位。他們的出發點，大多與台灣政治環境經驗過的人差不多，心理上不無「台灣結」或「中國結」。可是，他們積極的直接參與運動工作，或間接地取「台灣、中國問題」為研究主題。結果，在感性上或比一般人對中國或台灣的「民族意識」認同更為提昇。可是，鑑於客觀局勢的限制，他們的現實利益則與美國認同。此諺謂之「美國結」也。

台灣學生運動卅年

下

速宇

國民黨如何控制校園

一. 國民黨的控制系統

由於當年失去大陸的慘痛經驗，國民黨來台以後便加強對台灣人民的控制。它在台灣的控制系統，基本上可分為黨、政、軍、特務、新聞五大支。這五支互相牽連，形成嚴密的控制網。

屬於黨的控制有中央黨部，組織工作會，社會工作會，文化工作會，青年工作會和救國團。屬於政治的有國家安全局、調查局、人事行政局、司法單位和警政署。屬於軍方的則有警備總部、政工系統、憲兵和情報局。特務系統其實分散在上述黨、政、軍各部門，一般稱為情治單位八大系統，他們之間互不相屬，工作獨立，只有權力核心才能統一指揮，八大分別是安全局、中央黨部、情報局、警備總部、調查局、警政署、憲兵司令部和總政治作戰部。新聞方面，三大電視台分別直屬中央黨部、省黨部和國防部。報禁和唯二的二大民報的老闆又是國民黨的中常委。台灣人民的思想與行為不知不覺被官方牢牢地控制。

這其中與校園關係較密切的分別是：

1. 救國團。一九五二年，蔣經國在蔣中正的生日創辦了「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自任為團長。主要作用是控制青年學生，同時亦將蔣經國捧成「青年導師」。幾年來，救國團除了插手大、中學的校園活動外，並在各地廣設救國團支部，利用寒暑假舉辦各種戶外活動，吸引大批青年將時間與精力局限在遊山玩水、唱歌跳舞，無暇顧及其他事務。若見稍具領導能力的學生，則設法網羅他們參與「省訓團」、「歲寒三友」等訓練班，幾天「領導與統御」的講習後，這些學員全部成了救國團活動的輔導員，沈迷在免費的流覽風景區的陷阱中。

2. 青年工作會。全台灣各地的青年黨部和各大學的校園黨部都歸青工會統轄。它在校園內成立秘密社團，吸收和訓練校園內的「保守菁英」。

3. 文化工作會。文工會原是控制台灣的文化活動，包括文藝、音樂、電視、電影、新聞、雜誌等。偶而亦插手大專院校的校園活動。

4. 調查局。調查局除了在全台各縣市設調查站

以外，在各大專院校亦安排人手，密度幾乎高達每系、每班都有調查局的「細胞」，長期留視學生的言行並進行臥底工作。

5. 警備總部。警總原屬軍方，在黨、政、軍、國家不分的台灣，警總是最有效率的控制單位，它負責全台監聽、郵政檢查和特定人物監視。並不時查扣或停刊黨外雜誌。幾次校園事件的約談，逮捕行動，都是由警總出擊的。

二. 國民黨的控制手法

3. 軍訓教官進駐校園

國民黨遷台以來，首先公開地讓軍人以軍訓教官的身份駐進校園，成立黨部，吸收黨員。這個措施早年受傅斯年強烈反對，所以教官們在台大校園內還不至於太招搖。但繼任的錢思亮缺乏自由主義學者的傲骨，教官們逐漸攬權，而且每下愈況。其它校園更是嚴重了。救國團成立以後，以較「柔和」的方式，將學生的思想行為引入他們預定的模式，沈迷在遊山玩水、唱歌跳舞中。

2. 調查局的暗查與分化

暗地裏，調查局的細胞和警總的暗樁遍佈各班系，除了平日收集師生的言論情報外，有時偽裝成思想前進、言論激烈的學生，混入學生領袖的圈子裏，進行挑撥、分化的工作。據說，在保釣運動時期王杏慶有一回被邀至另一位學生領袖處商討大計，幾人談論時事，不免慷慨激昂一番。幾日後，調查局將王杏慶請去，播放當日他們幾人談話的錄音帶，並企圖以此為威脅利誘的工具。

3. 施以小利，罔顧大義

三十年來，不論台灣的學生運動是如何地風起雲湧，卻始終吹不入清華大學校園的國牆。清華的「安定」，應該歸功於前訓導長洪同先生，據傳洪同是特務頭子戴笠的得意門生，抗戰時有名的學生領袖，所以非常了解學生心理。在教育部嚴禁學生跳舞，男同學蓄長髮時，清華大學的髮型常是雌雄不分。校方還每年支持舉辦全校舞會，由訓導處或課外活動組長率先開舞，而眾教官們亦下池大扭雞舞

、馬舞。清華學生們的自由，羨煞了其他學校的學生。可是當保釣運動展開時，李怡嚴教授本擬帶領學生們前往美日大使館示威，卻受訓導單位勸阻。學生刊物中若有涉及思想、政治問題的文章，一定通不過他的審稿。於是除了玩樂外，清華的學生只專注於科技專業，以求將來出洋深造，國家大事一概不理。卅同訓導長的高明統御，替美國的科技界培養了不少生力軍。

4. 解聘教授

大學生們因思想開放而參與學生運動通常與校園內幾位有良心、有思想的教授的啓發大有關聯的。早期國民黨的做法是暗殺前進教授，如聞一多事件，遷台後，雖然手段不再血淋淋，卻是下獄、解聘，逼人生活無著交替運用。

一九五三年，台大法學院的教授鄭學稼，因批判當局的經濟政策，首開被解聘的紀錄。一九六四年藉口教育部「借聘」，錢思亮停聘了當時青年學生的思想導師殷海光。由於公廁鼓吹學生運動，一九七三年陳鼓應同台大哲學系十幾位教授被解職。隨後的幾年，陳鼓應被禁公開演講、作品亦不能發表。因為鼓勵學生根植鄉土，並揭發雙重國籍的壬津平，在一九七九年藉口他的學生一楊祖璠的不當言論而被停聘。事發時，張建邦校長遊歷國外，返台後他雖欲續聘壬津平，卻因安全單位的高壓而作罷。八三年，因為東吳大學的學生捲入黨外活動，加以蔣蕪公子（章孝慈）的壓力，東吳大學政治系的教授黃家城慘遭解聘。

國民黨的作法對於一個未與廣大群眾結合的運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控制手段，但對於一個因歷史的潮流，因民眾的需要而產生的運動，高壓手段永遠撲不滅希望的種子。早年的「新文化運動」和「自覺運動」因為只停留於象牙塔內，很快的便消聲匿跡，保釣後的學生運動則因與鄉土結合中獲得源源無窮的生命力。陳鼓應離開台大十年後，學生們自發地要求學生權。壬津平離開淡江後，台灣出現了「大地生活」雜誌，以及楊祖璠的「台灣綠黨」。黃爾璇雖不在東吳任教，黃嘉光卻加入「在野」、「前進」，成為新新生代的黨外黨工。因青年學生的大量參加，台灣的黨外運動得以不息。

世界學生運動與台灣

六〇年代是全世界學生運動高潮的時代，這股浪潮席捲全球，不僅包括美國、西歐、等所謂民主先進國家，還包括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甚而包括捷克、波蘭等東歐鐵幕國家。學生們因為沒有玩賞包袱，不和利益階級掛鉤，正義理想色彩較濃，所以能在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為追求更公正、更合理的理想社會而奮身投入，點燃明辨是非的火炬。

這期間有無數青年被侮辱、被逮捕、被槍殺、

但他們的前仆後繼終於迫使當政者讓步，為他們所熱愛的社會，做了歷史性的大貢獻。

在亞、非、拉等地被新殖民主義所籠罩的國家中，青年學生運動使他們從盲目的「現代化發展」中清醒過來，轉向適合自己民族需要且又合乎人道要求的發展道路。

捷克、波蘭的學生運動，努力使東歐國家在意識型態上擺脫蘇聯社會主義的籠罩，將自由、民主的種子播入社會主義的工廠之中。

西德的青年們無懼屠殺、有效地遏止了法西斯黨徒餘孽的復辟運動，將德意志的民主往前推進。

法國的青年學生的救國運動，粉碎了戴高樂建立教父式王朝的美夢，拯救了法國西第五共和。

約兩百萬的美國大學生，在「學生民主社會同盟」的旗幟下，結合黑人民權運動，爭人權、反貧窮、反戰、反侵略。他們的強大壓力，迫使美國國會通過人權法案，承認黑人參政權；詹森總統因而去職，尼克森自越南撤軍，將美國從戰爭的深淵及時拉回了一步。

隨著七〇年代的來臨，狂烈的學生運動，表面上逐漸冷卻，卻轉成另一形式繼續影響社會。

七〇年五月四日，美國俄亥俄州的肯特州大，四名學生被官兵所殺，另九人重傷，每年的「五四」肯特仍舊凝聚了數千名來自全美各校園的學生，「美伊事件」時，他們抗議卡特政府的徵兵政策，誓死不為TEXACO等油公司的利益而輕生。

德國愛和平的青年人以「綠黨」形態出城，參與選舉，企圖經由正式的政治管道改革社會，首度選舉便獲得數個席次。

阿奎諾被刺後，數萬名菲律賓學生和工人持續示威遊行，迫使馬可仕成立調查團，調查暗殺事件。

當六〇年代學運正處高潮時，台灣當局曾自誇——「只有台灣沒受波及，校園最安定」。

但七〇年代初，華人留學生的保釣運動，無疑也是受美國學生運動的鼓舞。海外的保釣運動帶動了台灣島內的保釣熱潮，這一個運動促使許多大學開始走出學校的象牙塔，認同鄉土，關懷社會，參與政黨和社會的改革運動，與先民抗日和三十年代學生救國運動一脈相承。這是歷史的必然性，也是不可阻擋的洪流。蓄意逆轉或逃避這潮流的人，終將自絕於這一個時代。（註）

註：有關台灣學生運動的文章亦可參考

1. 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龍田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2. 夏潮論壇九期——十一期，李綠著「台大學生的運動三十年回顧」。
3. 南方朔：學生運動的理論變遷，大地生活第一卷第三期。

蔣經國

成立反共救國團的 歷史背景



陳清生

「蔣經國是靠著『救國團』起家的。」——在臺灣，普通人都會這麼說。

「『救國團』是個不三不四的東西。」——在臺灣，一般人都存著這種印象。

凡是高中以上的知識青年，一律強迫加入為團員。但在校園裏，學生們普遍地厭惡它；凡是熱衷參加黨團活動的人，很少不受卑視的。但長久以來，人們都敏感地知道：偶而可以批評一下「黨」，絕不能批評「團」。

「自由中國」雜誌是個例外，但批評者却付出了很高的代價。

「青年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成立於一九五〇年十月底；在蔣介石誕辰之日，宣稱它的產生是為了「響應 總統的號召」。團長由蔣介石掛名，團主任由他的兒子蔣經國擔任。

事實上，早在「救國團」成立之前，蔣經國在臺灣政壇上已逐步掌握黨政實權。一九四九年七月間，蔣介石秘密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①，將中統和軍統加以整頓，從這以後，特務大權便由蔣經國接管。在五十年代初「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當局藉「肅清匪諜」為名在島內展開地氈式的捕殺活動中，幕後總指揮蔣經國已儼然成為「台灣的貝利亞」。一九五〇年八月間，蔣介石成立「國民黨改選委員會」，CC派遭排斥，首領陳立夫被放逐美國養雞，蔣經國提昇為改造委員之列，由是側身組織內層，使「C.C.黨」轉變為「父子黨」。蔣氏在軍中設立特種黨部，「太子先生更是大權獨

攬」^②，而政工監視系統的成立^③，則更加嚴密地控制著軍隊。

不過這時期的蔣經國，在人們心中仍是個躲在暗處的神秘人物，一直到「救國團」成立許久之後，他才慢慢地以「青年導師」的身份站到亮處。但在臺灣的青年人，只是模糊地聽說他留學過俄國，做過贛南的專員，對他以往的歷史，是諱莫如深的。而他的那段歷史，却密切地聯繫到他來台後的發展及其政治性格的形成，所以有簡要介紹的必要^④。

一、留蘇時期：譴責蔣介石的兩項聲明

蔣經國在十五歲的時候，「奉蔣公命，前往蘇俄深造」^⑤。先進「孫逸仙大學」（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再轉入「紅軍軍政學校」（一九二八—一九三〇），其後便派往基層工作。

蔣經國在「孫大」時便申請加入共產黨。他在蘇聯共黨內的職務，最高的只擔任過黨支部書記^⑥。那時期，他可算是個「真實的信仰者」，在二七年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後，他曾基於理想信仰的立場而兩度發表公開的聲明。

第一次是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之後，蔣經國在「孫大」同學的申討聲中，發表聲明譴責他的父親說：

「蔣介石的背叛，並非意外，當他口頭頌揚著革命的時候，已漸漸地開始出賣革命，一

心想和張作霖、孫傳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業，已經結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從此他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敵人。過去他是我的父親革命好朋友，去了敵人的陣營，現在他是我的敵人。」⑦

這份聲明，透過塔斯社傳達到世界各地。這時，蔣經國的外號是「工人」——「尼古拉」同志。他並非受到旁人的煽動，而是「自告奮勇地，斬親情，割尾巴（封建）」⑧。

一九三五年一月廿二日，蔣經國再度發表「給母親的信」，對蔣介石批評之入骨，超過了他任何的政敵。在這封長信上，對蔣介石的種種暴行提出無比憤怒的控訴：

「……

聽許多人說，蔣介石在宣傳孔子的孝悌和禮義廉恥的學說，這是他迷惑人的慣用手段，以此欺騙和愚弄人民的意識。母親，您還記得吧？是誰毆打您，抓住您的頭髮，將您從二樓拖到樓下？那不是他——蔣介石嗎？您向誰跪下，請求不要把您趕離家門？那不是他——蔣介石嗎？是誰打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蔣介石嗎？這就是他的真面目，這就是他對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禮義。

「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我成了一個共產黨員。有人也許會覺得奇怪，但是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一點都不動搖。……

「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千百萬人餓死的事吧？那些餓死的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把窮人以自己光榮的勞力得到的一碗飯搶去吃了。還有，也許您不會沒有見過外國人在中國各都市農村中毆打、殺戮中國人吧？這種事情的發生是因為蔣介石及其同黨獎勵外國人在中國建立特權。

也許您不會沒有聽過蔣介石把數千、數萬為革命事業奮鬥的優秀戰士用石油燒死的事？不會沒有見過蔣介石把共產黨員砍殺？蔣介石的手已經被全國工農的血——我親愛人民的血染紅了。

「……您以前的丈夫以極端野蠻的手段屠殺了數萬、數十萬的兄弟同胞，前後連續三次

叛變，前後連續三次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他是您的兒子的仇敵。我有這樣的父親在中國人民之前是不能不感到恥辱的。對這樣的父親不但沒有任何敬愛之念；對這樣的人物我恨不得殺戮他、消滅他。」⑨

這篇「大義滅親」的文件，其批判力及生動性的程度，不僅在中國政壇上是史無前例的，在世界人類史上亦屬罕見。

蔣經國在蘇聯的十三年間（1925—1937），一切行跡，均隱諱不明，我們唯一知道的是：他娶了個俄國太太和發表過兩篇公開譴責蔣介石的聲明。

二、贛南時期：「特務處」和「青幹班」

蔣經國在一九三七年三月間回國，他父親要他寫一份留蘇報告，「以備考驗」⑩。他用俄文寫了一篇「留蘇十三年」手稿，曾譯成中文，但迄未公佈。

這年秋天，蔣經國被派往江西擔任保安處副處長。一年多後，升為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在專員公署內，他建立了一個「特務處」（這是全國其他專員所沒有的）。「特務處」下面設有情報組和行動組⑪。蔣經國後來在南京成立「戡建總隊」，實質上就是「特務處」性質的擴大組織⑫。

蔣經國在專員公署任內，還制定了一項「聯合滙報辦法」——這項創舉便是他從蘇俄「格別烏」學來的，而它確成為日後國民黨的一種重要的「制度」⑬，在台灣有效地運用著。

一九三九年秋，蔣經國在贛州成立「江西青幹班」，這是他躋身「三青團」（「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的開始。他利用這一機構用心培養自己的幹部。在「青幹班」時，蔣經國提出了這樣的口號：「我們要做團長的忠實耳目」、「團長是我們的太陽」。在這種政治空氣下訓練出來的「耳目」，來台後多成為蔣經國的基木幹部。「青幹班」的骨幹中，最有名的是與王昇等結拜的「十兄弟」。「十兄弟」的老大便是大名鼎鼎的章亞若——她就是「蔣主任的『那個』」⑭。「章亞若和蔣主任私通遺下一對孿生子」，就是近年來在台北政壇發紅起來的章孝嚴、章孝慈兄弟。章亞若在懷孕後，被秘

密送往桂林分娩，生下雙胞胎之後，忽然遭注射致暴斃^⑮。

在專員公署和青幹班的據點上，蔣經國一面佈署「耳目工」，發揮蘇共「格別烏」的情報組織，又一面深入民間作「親民」活動，他到「某鄉向老大娘問好，或行經某街和老太爺握手」。這和他於七十年代在台灣初登舞台時頻頻下鄉抱娃娃「作秀」的鏡頭，如出一轍。

一九四三年冬，蔣經國以「青幹班」作為他的墊腳石，獲乃父之助，調往陪都重慶擔任「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蔣介石自兼校長，「中央幹校」由是成為「父子家校」。

一九四四年冬，蔣介石號召組「青年軍」，並指示成立「青年軍政工作人員訓練班」（簡稱「政工班」），委派蔣經國為該班中將主任。自後，政工班便成為蔣經國的「獨立王國」^⑯。

一九四七年春，蔣介石以「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名義，委派蔣經國做「政大」教育長。消息傳出，立即遭到C.C.派的杯葛，全校實行罷課抗議，學生們強烈反對，高喊：「反對兒子教育長！」「反對父子家校！」的口號，校門口還掛起巨幅標語——「政大學生一致堅決反對任命蔣經國為本校教育長。」^⑰蔣氏事敗，但由此對C.C.派種下深仇大恨，蔣氏政權甫遷台，便將陳立夫逐出黨中央，實根源於此。

一九四八年初，蔣經國成立「戡建總隊」，在南京指揮這「全國性的武裝特務隊伍」。這年秋冬，在上海「打虎」慘敗，回南京建立秘密內層組織：「鐵血青年社」。一九四九年初，復以「戡建總隊」為基礎，宣佈成立「青救團」——「國防部青年救國團」^⑱。然而未及擴張，局勢已土崩瓦解，遂匆匆逃奔台灣。

三、台灣時期：子繼父業

從蔣經國在大陸以前的一段歷史，我們可以知道他有三項職務來台後在控制系統方面發揮了空前的作用：一是「特務處」，二是「政工班」，三是「青救團」。由這些方面，我們可以知道：①蔣經國一開始就搞特務事業；②早先就搞過政工工作；③大陸逃亡前夕就想搞「青年救國團」。

從蔣經國在大陸以前的一段歷史，可以看出青

少年時期的蘇共教育和「父親意像」，對他有深刻的影響。蔣經國在蘇聯的確度過一段非常艱苦的日子，但他返國之初，並沒有「反共抗俄」的跡象。他還將「留蘇十三年」手稿當教材發給「青幹班」的同學閱讀，據讀過手稿的蔡省三說：「那是記述蔣氏如何到農村基層去做共產黨的組織訓練宣傳工作，如何密切和群眾打成一片，乃至離開時，群眾對他如何依依不捨，熱烈歡送。」^⑲那時，在「青幹班」的同事和學生，「大家都有一個明顯的觀念，就是跟著蔣先生『學蘇聯的那種精神』」。一九三九年九月廿六日下午，在江西支團部舉行的一個「青年座談會」上，蔣經國發言時，還一再強調：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是反侵略的堡壘」、「蘇聯是第一個真誠幫助中國抗戰的」^⑳！然而，置身於一個權力鬥爭的漩渦裏，周圍的環境也逼使他變得越來越現實，越來越消失早年的理想，因而也越來越變得冷酷。

「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我成了……」，在赤裸裸的現實世界裏，蔣經國體認到唯有父親才是權力唯一的泉源。因而他開始要做孝子，他向親身幹部表示他對「委員長」的忠誠：「他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㉑而他父親在眾叛親離的情勢下，也更需要他這兒子做為「手杖」。來台後，一向「以私忘公」的蔣介石，更加蔭庇其子：數年之間，便把未放一槍、未出一仗的兒子提昇為「上將」。在「子繼父位」的方針下，未曾宣佈「脫黨」的蘇共黨員，終於登上了國民黨主席的寶座，並父子繼地完成「民國」時代的「總統世襲制」。

四、雷震「自由中國」社的反對聲浪：「撤銷非法的黑機構」

在子繼父業的過程中，「救國團」的成立是蔣經國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一環。但它在成立之初，却受到「自由中國」雜誌同仁及作者的強烈反對。從這些反對的言論中，我們可以明瞭該團成立的背景和作用。茲簡介如下：

一九五二年十月中，在「救國團」成立的前夕，「東海大學」徐復觀教授在「自由中國」發表一篇「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健全發展的商榷」（七卷八期），文中提出這幾點批評：一、該團成立的理由，

只有爲了「實現總統的意旨」，而缺乏法律的基礎。二、它缺乏與國民黨的明朗關係。與國民黨的組織也大同小異，如此雙重領導，又將演成人陸時期黨團派系爭擾。徐文最後建議：「總團的主任，不妨由教育部長兼任，以領導學校青年爲主。」蔣經國看了這篇文章，十分惱怒（徐復觀建議總團部主任由教育部長兼任，就等於趕走他渴待中的位子，這尤使蔣記恨徐）。蔣經國在他留俄老友王新衡面前發脾氣，大罵徐復觀和他作對。徐先生原是侍從室要人，蔣介石曾邀他草擬國民黨改造方案，來台後受蔣經國排擠，遂遭冷落。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徐先生便被當局列爲異己份子而長期受監視，七十年代間終遭解聘，晚年流落香港。

一九五八年一月初，「自由中國」發表社論，檢討「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十八卷一期）。這篇社論批評救國團「不過是國民黨內新興的所謂某一派，利用國民黨的招牌，所公開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資本的工作而已！」並抨擊「極少數的政治捐客，做著青年販子的勾當。……盜用若干美麗的名詞和動聽的口號，欺騙青年。」因而呼籲將這一個未經法律程序的龐大的黑機構，予以撤銷。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自由中國」再度發表社論（十八卷十一期），題爲「再論青年反共救國團

撤銷問題」。這篇社論重申「救國團」的成立，除了總統文告以外，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根據。它並抨擊這一個「於法無據的黑機構」，在學校實施軍訓，是與兵役法規定不符的！文中還指責這一組織的存在，目的在控制學校教育，控制青年思想活動，「憑藉了政府的權力，使純潔的青年學生，成爲一黨一派爭權奪利的工具。」

一九六〇年九月初，「自由中國」三度發表社論，題爲「三論青年反共救國團撤銷問題」（二十三卷五期），再度呼籲撤銷這一個「濫用國家巨額公款」的「黑機構」。文中引用救國團某副主任在離職前的某次週會上，曾以「臨別贈言」的口氣向該團人員很直率的指出：外界批評救國團的十六個字：「橫行霸道、買空賣空，不學無術，自欺欺人。」是正確的。某副主任同時並進一步指出：「國民黨腐化，救國團幼稚，黨團幹部庸俗。」的確，這些評語，反映了人們普遍對該團的觀感。

「自由中國」還刊出過一篇「讀者投書」：「青年救國團害國害青年」（十八卷十二期），從題目上，也可以看出一般知識青年對「救國團」的厭惡之情。

這裏，特轉載「自由中國」對該團批評的第一篇社論，俾供讀者參看。

①見孫家麒：「蔣經國竊國內幕」香港自力出版社，1961，第20頁。

②孫家麒說：「軍隊黨部恰是國民黨組織中的一個『獨立王國』，一切業務，獨斷專行，不但中央黨部中的二、三、四、五、六組，和各委員無法過問，連主管組織的第一組，和它的上下級關係，也只是象徵式的。人事方面，太子先生更是大權獨攬，……太子先生之所以能把軍中將領控制得那樣服服貼貼，至少有一半是借了軍隊黨部的力量。」見所著第37頁。

③軍中政工部門的成立，主要任務爲：「調查官兵思想行爲」、「監察官兵思想，檢舉動搖份子」。詳見江南著「蔣經國傳」，第十六章「蔣主任」。

④有關蔣經國的論述，下列各書爲必讀物：蔡省三著「蔣經國與蘇聯」（1976年香港「草原出版社」）；曹雲霞著「贛南憶舊錄」（1977年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蔡省三、曹雲霞

合著「蔣經國史話」（1979年「七十年代雜誌社」）；江南著「蔣經國論」（1984年4月加州「論壇報」出版）；孫家麒著：「蔣經國竊國內幕」（1961年香港「自力出版社」）。孫家麒曾任職「政治行動委員會秘書、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秘書等職，據他自己說「參加國民黨特務工作二十多年」，以他參與機要的親身見聞，寫成此書，行文雖欠嚴緊，然對抵台後蔣氏父子的掌權實況，提供不少內幕性的報導。江南近著「蔣經國傳」，廣採各家之說，評述蔣經國自幼迄今數十年來的政壇活動。爲目前學界中最完備的一部蔣傳。蔡省三係蔣經國在大陸時期的骨幹人物，「蔣經國系史話」等著，資料充實。本文引述蔣經國贛南時代的主要活動，以蔡著第一手資料爲根據。

⑤見1975年4月29日「中央日報」刊載蔣經國簡歷。

- ⑥蔡省三：「蔣經國與蘇聯」，第11頁。
- ⑦蔣經國聲討文發表在「真理報」，江南「蔣經國傳」引譯自盛岳：「孫逸仙大學與中國革命」（英文本）。
- ⑧江南：「蔣經國傳」。
- ⑨陳丹譯，譯文根據日本波多野堯一著「中國共產黨史」所錄存。
- ⑩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第84頁。
- ⑪蔡省三：「蔣經國系史話」，第64、65頁。據蔡省三說，王昇在那時就做秘密情報工作。
- ⑫蔡省三說：「『戡建總隊』是『太子系』指揮的全國性的武裝特務隊伍，是『太子系』所屬的第一個大型特務組織。」見「蔣經國系史話」，第196頁。
- ⑬「『太子系』的特務諺稱，蔣太子在贛南首創的聯合滙報，開了國民黨特種滙報的先河。」（蔡省三「蔣經國系史話」第66頁）的確，抵台後國民黨最高階層的各项特種滙報，如：蔣介石每星期五親自主持的「情報會談」，蔣經國以安全局副秘書長身份主持的「保安會議」、「肅奸會報」、「黨政軍聯會報」等，都採用贛南時期「聯合滙報」的方式。六十年代後期，蔣經國代他父親主持「情報會談」，每週一次，由各個情報單位特務頭子向他做滙報。一九七九年之後，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以安全局執行秘書的名義（公開的身份是「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召集各特務機構首長（如警備總部首長、調查局局長、情報局局長等），每週一次向作安全滙報。故四、五年前，蔣孝武便接掌特務大權，王昇被解職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特務大權和蔣孝武發生衝突的結果。
- ⑭曹雲霞：「贛南憶舊錄」，第11頁。下引同。
- ⑮有關章亞若致死的事件，鮮為外界所知。「參加國民黨特務工作二十多年」的孫家麒，在一九六

一年間首次以文字揭開這一內幕說：「當時有一女生，名喚張雅若（按當是章亞若），曾為太子生了兩個『太孫』，因為怕醜事外揚，又不敢隨便遺棄，乃以醫病為名，送到桂林謀殺滅跡。」

（見「蔣經國竊國內幕」第65頁）曾是「江西青幹班」嫡系的曹雲霞有這樣的記述：「章亞若和蔣經國主任私通，王昇又從中效勞，王昇便成了隱秘的『國舅』，這委實是王昇升官的關鍵的關鍵。隨後章亞若藏匿桂林分娩，平安生下一對學生男孩，不久忽報暴斃。」（「贛南憶舊錄」第37頁）按：「十兄弟」之一的某先生，曾面告筆者：「章亞若生產後，我曾從江西去桂林探望她，見章宅儼然如小蔣公館，前往拜會的要員不少。我覺得這樣過於招搖，將招忌，回家後就寫了一封信給她，勸她立刻出國，避避風頭。但沒多久，亞若就被注射，全身發黑暴斃。」某先生所說，和曹雲霞所述相同。

⑯「蔣經國系史話」第129頁。又據蔡省三說，「中國時報」發行人余紀忠，本來和太子系沒有關係，趁著青年軍「從軍」的機會，而參加了政工班。其後余紀忠被派任東北行營政治部主任（而李煥就是當年隨同余氏到東北的）。由此可知：①余紀忠原是搞政工出身的。②余紀忠和蔣經國拉上師生關係。③余、李關係淵源自東北行營處。

⑰詳見「蔣經國系史話」，第161—169頁。

⑱以上各項組織見「蔣經國系史話」第196頁、223頁、232頁。

⑲蔡省三：「蔣經國與蘇聯」，第22頁。下引同。

⑳「蔣經國與蘇聯」，第30頁。

㉑「蔣經國與蘇聯」，第15頁。

㉒蔣經國為這篇文章而記恨徐復觀的事，是王新衡親口告訴筆者的。

轉錄自「自由中國」1958年1月1日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有許多事態顯得那麼反常，像是一列無軌列車，橫衝直撞，造成了今日的種種問題。對這一系列的問題，我們已本著「是什麼，就說什麼」的基本準則，逐次分別的坦白檢討過

。現在我們要繼而檢討另一個為全國各方面所共同重視的問題，那便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以下簡稱青年救國團）問題。

青年救國團成立迄今，已五載於茲，但這一單

位究竟是何種性質，社會上還普遍的感到莫名其妙。據青年救國團本身的解釋：「救國團是一個具有教育性、群眾性，和戰鬥性的青年組織。」（引自該團刊印的「新團員入團訓練」教材）然另據青年救國團副主任胡軌說：「救國團的組織是教育性的組織，救國團的工作是教育性的工作。」（引自教育與文化社編印民國四十五年度「中國教育與文化」）顯又置群眾性和戰鬥性而不提。難怪社會上普遍的說，這是性質不明的組織。其實，青年救國團之幾乎無事不可過問，以至無處不可插足者，也就是由於這一點。換言之，青年救國團正是利用這種方便，許多事情一把抓。不過，若僅從其組織之真正精神而言，這實在是一個政治性的組織。關於這一點，青年救國團本身也不得不坦白承認：「救國團的名稱是『反共』『救國』，顯名思義，是一個政治性的組織。」（見前引「教材」，下同）老實說，這個組織的性質，表面上，雖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但骨子裏，是以所謂教育性、群眾性，以及戰鬥性為手段，而以政治性為目的。很顯然，這是第二個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國民黨的預備隊，此可從其團章及有關規定中，所謂信仰三民主義，所謂宣傳三民主義，所謂以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以至於所謂背叛三民主義是違犯團紀，而獲得具體證明。甚至國民黨內有人說，這不過是國民黨內新興的所謂某一派，利用國民黨的招牌，所公開做的培植私人政治資本的工作而已！這話似乎更有道理。但無論如何，這是個政治性的組織，理該是毫無疑問的了。

這樣一個政治性的組織，據青年救國團自吹自擂說：「本團是愛國青年自己的團體。」假使對於這所謂「自己的團體」，青年們享有選擇的自由，那倒也罷了。所可怪的，雖然團章上有所謂「申請加入」的說法，事實上，却規定高中以上學生一律參加，對於這種顯然的矛盾，儘管青年救國團有一個自以為巧妙的解釋：「救國團的訓練是每一個青年學生應該接受的訓練，救國團的工作是每一個愛國學生應該從事的工作，所以規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一律參加救國團，並且為求學校管理上的便利和學生生活行動的一致，也以全體參加救國團為宜。」但其為強迫入團，則甚顯然。不管怎樣曲辯

，又怎能掩飾事實？

這種強迫參加的方式，一如過去三民主義青年團之強迫學生參加。但當年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學生在強迫之下，雖然名義上是參加了，但青年人的心並非那麼容易被控制；此所以到了抗戰勝利之後，多少個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都紛紛投入了反對的行列。同時，在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的內部，由於黨團幹部的彼此弄權，以至由明爭暗鬥，造成了黨團火併的局面，到後來，好容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三民主義青年團撤銷，勉強使黨團統一。這一慘痛的教訓，對國民黨的朋友而言，應該是記憶猶新。凡此種種，都可謂殷鑒不遠。何以時至今日，在退守孤島的局面下，國民黨經過「改造」之後，還要把歷史重演，而成立這樣一個政治的組織呢？

對於這一問題，根據青年救國團本身的解釋是：「當前反共抗俄的戰爭，是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戰爭，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國青年，必須英勇地起來與俄寇共匪作生死的決鬥，才能扭轉國家的命運，搶救民族的危機。但是經驗告訴我們，沒有堅強的組織和正確的領導，就不能發揮青年有效的力量，所以要成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加強青年的團結，並且以三民主義的基本思想來教育和領導全國青年，共同完成反共抗俄復國建國的使命。」很明顯，青年救國團之所以成立，便是為了要青年人起來與俄寇共匪作「生死的決鬥」，負起「時代的使命」。儘管如此，假使每一局面的扭轉，必需靠青年人都參加政治，而犧牲他們很多求學的時間，那總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今天這樣慘局，青年人是沒有什麼責任的，這責任理該由老一輩的人負擔，尤其是該由老一輩政治上始終身居要津的人負擔。近代中國政治上最可痛心的一點，便是極少數的政治掮客，做著青年販子的勾當。因為這少數掮客，相信「誰有青年，誰有前途」的說法，一如商人之相信誰有資本，誰可賺錢的道理，於是對於青年人的純真和熱情，加以充分的利用。結果是盜用若干美麗的名詞和動聽的口號，欺騙青年、愚弄青年、麻醉青年，進而犧牲青年，使自己的權位，建築在青年人的鮮血頭顱上。天下事之可悲與可鄙，寧有過於此者？此所以為了保存國家元氣，尤其是防止政

論社
（一）

青年反共救國團問題

自由中國 第十八卷 第一期

治捐客的殘酷利用，青年救國團實在沒有存在的必要。假使青年救國團真是愛護中國青年，根本便該自動撤銷才對。

這種組織之無成立必要，既無疑問，本可不再討論。但現在不妨退一步談，姑且假定有成立必要。然如此龐大組織，當時究又根據什麼而成立呢？據青年救國團解釋說：「第九屆青年節總統發表了『告全國青年書』，號召全國青年繼承北伐抗戰的光榮傳統，為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作第三次大結合，並提出組織『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具體指示，全國青年即時風起雲湧，熱烈響應，紛紛要求參加，政府乃遵照總統的昭示，接受青年的要求，於本年（編者按：係指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統六六華誕，成立了『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很顯然，這不是一個民衆團體，用青年救國團自己的解釋說：「救國團隸屬國防部是政府機構。」既是政府機構，試問除掉總統的文告以外，又有什麼法律上的依據？像這樣一個職權組織都極其龐大的機構，其基本依據如團章，也只是在民國四十一年九月經行政院台四一教字五二六五號訓令核准而已！顯未另經立法手續，這豈非太草率了一點？難道像這種龐大的機構，還不該經立法院加以鄭重的立法嗎？不經立法院通過，而由行政機關擅自成立機構，這豈是國家的常法？現代民主政治，貴在法治，假使僅憑總統的一紙文告，便可以成立一個龐大的機構，但尚有何法治之可言？此所以僅從成立的依據言，法外的這種「黑」機構便該根本撤銷。

這種法外機構之應予撤銷，既無疑問，原不必再浪費筆墨。但現在不妨再退一步談，姑且假定在我們這個開無軌列車的國家，根本無法侈談法治，現僅就其從四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成立以來，整整五年的具體工作中，加以更進一步的檢討，以求明瞭其應否撤銷。

五年的時間，不能算短，但青年救國團的工作結果又如何？就其最主要的中心工作而言，顯然是推行學校軍訓，然軍訓實施的情形如何？說句老實話，全無成績可言。因為學校軍訓的目標，根據青年救國團的解釋是：「救國團所實施的軍訓，在高級中等學校是預備士官教育的準備訓練，在大專學校是預備軍官教育的準備訓練，換句話說，學校軍

訓是為國家預備軍官和預備士官教育打基礎。」但由於青年救國團總團部負責策劃人員，既沒有受過良好的普通教育，又沒有受過正軌的軍事訓練，例如該團業務上的主要負責人主任秘書，只不過是警察學校出身，其餘便可想而知了！以這等角色，而策劃全國高中以上學校軍訓，那有不敗事之理？於是一切顯得全無計劃，自高中以至大學，雖有七年之久的軍訓時間，但既沒有分別規定一定的訓練進程，又沒有規定學科和術科的全部內容。其結果，高中是這一套，大學還是這一套，事事雜亂無章，處處手忙腳亂，一大堆的軍事和政治課程，便由少數軍訓教官臨時應付。老實說，就大學而言要講師以上才有資格開課，而且每開一門課程，總是經過了多年的研究，此所以很少有人開上三門或四門課以上。但軍訓教育教官則不然，每能短期速成，以至於無所不教，不要說軍訓教官的素質本就很差，縱然是個萬能，也無法勝任，結果當然只有笑話百出，弄得學生們哭笑不得。何況一般軍訓教官的素質，又都極其低劣，其中尤其是女教官更低得驚人。教官在大學裏，雖然大多數都是拿講師以上待遇，在中學裏的待遇，雖然又都比照中學教員，但大多數教官之差，差到高中的的教官，可以既非軍校畢業，又連高中也沒有進過；大學的教官，可以既非軍校畢業，又連大學門也沒有進過；這些所謂教官其人，只不過在某某崗的什麼幹部學校，混了個資格而已！但這個所謂學校，目的原只在造就黨化軍隊的「革命幹部」；實際上，學生所具有的普通知識既有限，軍事訓練又不足，由此等人來推行軍訓，又何能有成績可言？有之，只是破壞學校行政而已。其中尤以在中學，有很多軍訓教官之專橫跋扈，幾乎令人不敢想像。此所以弄到中學學生，視教官如鬼神，隨時敬而遠之；大學裏的學生，視教官為贅物，根本不屑一顧。至於青年救國團某些所謂考察之類，雖然自吹自擂的認為有成績，但終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試問在計劃和進度都沒有的情形下，所謂成績，又如何評定？

其實，五年來，青年救國團非但無成績可言，而且還發生了重大弊害。這弊害，就其最主要者而論，至少有三點，那便是破壞法制與浪費公幣。先就破壞法制而言：在急需建立制度講求法治的今日

，任何政府機構，都應在法制範圍內活動，已是天經地義的道理；但青年救國團却憑藉其特殊的背景與地位，而置國家法制於不顧。例如在今年（四十六年）六月間，青年救國團發動荒唐的鬼湖探險時，據六月十六日台北各報所載幼獅社訊說：「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於昨日下午四時，在該團會議室邀集教育部、國防部、經濟部、陸軍供應司令部、交通處、警務處及農復會等有關單位舉行會議，商討有關青年鬼湖探險問題，會議由該團曾憲銘組長主持……有關單位決盡力支援他們完成探險任務。」這樣一個所謂隸屬於國防部的下級機構，居然可以同時邀集幾個部處開會，不知這是從那裏來的特權？其破壞法制之事實，由此便可想見。次就浪費公帑而言：在國家財政萬分困難的關頭，任何大小單位，都該盡力節省開銷，早成為公認的真理；但青年救國團却運用特殊的方式與關係，在各方面要津貼找財源，而置國家財政於不顧。例如去年（四十五年）一年的開銷，據傳便高達台幣三億元左右，這當然是青年救國團的高度機密，非局外人所能證實。但由其三天一活動，五天一訓練的情形觀之，便不難想見其開支的浩繁了：即以出版書刊一項來說，據青年救國團副主任胡軌公開指出：「各支大隊的刊物，四十四年度統計，共有期刊二百一十一種之多，百分之九十為月刊，少數為半月刊或雙月刊。單行書總團部共出版一百三十六種，計一百萬八千六百冊。（引自教育與文化社編印民國四十四年度「中國教育學術與文化」），這還是四十四年度的統計，至於四十五年的情形，雖未見繼續發表統計數字，但就其一日千里之勢推測，必又超過了不知多少倍。在學術界出版書刊難如登天的今日，誰又能想到，青年救國團出版全無價值的書刊，竟能如此的方便呢？即此一點，其浪費公帑的事實，便不難想像了！

綜上所述，足證青年救國團這樣一個政治性的組織，成立的理由既不充分，成立的根據又不合法，成立後的工作結果，非但無成績可言，而且還發生了破壞法制與浪費公帑的重大弊害，則其根本無存在的必要，又何庸贅述？

對於這一撤銷的主張，說不定會有人以學校需要實施軍訓做擋箭牌。其實，坦白說一句，學校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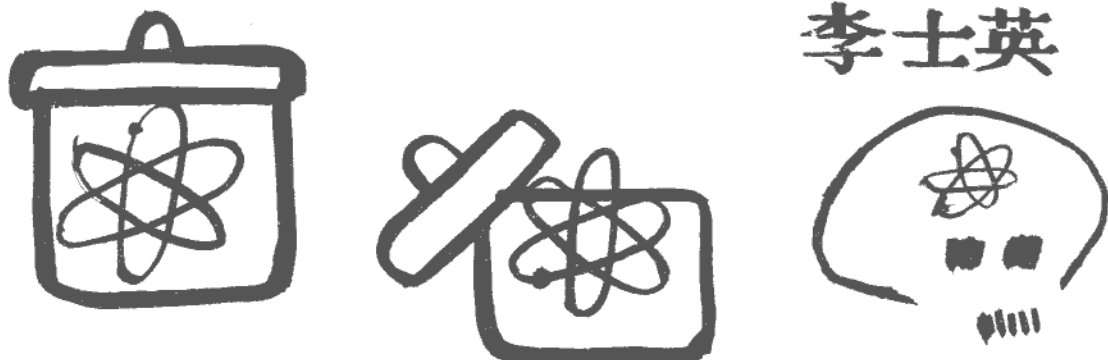
訓，根本可以停辦。因據上引青年救國團的解釋，學校軍訓的原意，原不過「為國家預備軍官和預備士官教育打基礎」而已！事實上，又何嘗需要這樣一段時間來打基礎？即以第一期青年軍為例，預備軍官教育的時間，只化了短短的三個月；就接受軍訓的全部時間而言，也不到兩年。但現在一個預備軍官的養成，却需要在三年高中與四年大學或兩年專科的所謂基礎教育以外，又化上兩年的時間，接受預備軍官訓練，前後共需七年甚至九年的時間。老實說，這時間實在不能算短，試問一個人在青年時期，又有幾個七年或九年？這樣的一訓再訓，對青年人的時間，豈非重大的浪費？為什麼要青年學生把生命消耗在立正稍息之上？又為什麼要如此剝奪青年學生圖書館實驗室的時間？何況今天根本沒有完整的軍訓計劃！何況現在所推行的軍訓又毫無成績可言！說良心話，政府如真愛護青年，便該取消學校軍訓。否則，便該免除畢業後的預備軍官訓練。

再退一步說，姑且假定學校軍訓也有必要，但仍不能以此為理由，便認為青年救國團應該存在。誰都知道，今天教育行政的責任，國家早有立法，是由教育行政機構負擔。我國目前的教育行政機構，中央有教育部，省有教育廳，縣市有教育局或教育科，舉凡教育政策及法令的執行，以至各級學校行政的監督與指揮，都分由各級教育行政機構負責。假使說為了要實施軍訓，便該另設青年救國團，來專負策劃指揮與監督之責，則其他諸如童軍、體育、公民等課程又何嘗不可另設機構而專司其事？但若事實果真如此，則國家教育行政，還成何體統？老實說，軍訓根本便該劃歸教育行政機構辦理，有何特殊之可言？充其量，在教育部之內，設立一個委員會負專責便已足夠了！此所以唯有青年救國團撤銷，才可以使教育行政系統不至混亂，而免使學校行政受雙重指揮，這實在是最簡單的道理。

歸根到底的說，解決青年救國團問題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撤銷青年救國團。我們在提出了最後的總評以後，還進一步希望代表我們人民說話的立法委員諸公，對於這樣一個成問題的機構，也能徹底的做一次調查與檢討，以便使這一問題能夠早日解決。

接納核廢料引發的問題

李士英



海外關心核廢事件

二月上旬據西德報章及「紐約時報」報導，中國在一月十五日已同西德核電廠管理部簽署了一項意向書，決定在西北戈壁沙漠提供場地，儲存西德核能發電的廢料。根據這項意向書，在公元二〇〇〇年之前，中國將代為儲存大約四千噸核廢料，按每公斤一千五百美元計算，中國將可獲得五十多億美元的酬金。消息傳出後，西方科學界人士對中國為了急於賺取外匯而同意替西方承擔環境風險，都表示驚訝。海外華人知識界中，對中國竟主動接納在西方猶有嚴重爭議與技術困難的放射性廢料，這一災難性的轉嫁，始則難以置信，待得證實，繼則憤怒莫名，焦慮萬分。

在短短不到一個月中，海外中文傳播媒介及華人無一不對此一危機一再表示深切的關注，齊聲要求中國政府就此一關係十億百姓，最少兩百代子孫安危的行事，避免倉率。他們並利用海外較比開放的氣氛，展開了專業性、科技乃至於經濟效益，「社會成本」等方面的討論。這可說是海外華人對中共當局提出輿論監督的具體表現；在中國大陸社會輿論監督不足，政府權力集中，長官意志泛濫，一

般缺乏現代知識，和新聞界報喜不報憂的情況下，這種檢討之長期持續，遂有重大意義。

核廢問題的來源

最初西方開始發展核子發電工業之時，就沒有一個處理危險核子廢料的長期計劃。當時以為發電沒有問題，利字當頭，就匆匆上馬。廢料暫時擱置於核電廠內，以為以後會有充分的時間去設計一種妥善的處理，結果是到了當前，已經二十多年過去了，「時間」到了燃眉的極限，世界所有國家不但都沒有設計出妥善的方法，並且專家們越來越發現了更多的困擾問題。單單美國現在已堆積了一萬多噸用過的鈾燃料（核子廢料）；一九九五年以前可能會有四萬七千噸，全世界的核子廢料，噸位又要數倍於這個數字。

目前，美國的核廢庫存，主要包括三萬件用過的燃料棒組件，大部份是暫時貯放在核電廠裏的大水池內；水池內有特別為吸收中子輻射的硼酸。儘管所有核電廠都儘量地擴充貯放容量，緊縮核廢，但經年累月的堆積，多數水池都已「池滿為患」了。

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鑑於這個嚴重情況，被迫

宣稱，除非能提供更大、更高的廢料貯放場所，一九八七年要強制關閉十三個核電廠。由於(一)在可見且長遠的將來，核廢料處理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二)在一定技術條件上，受社會、經濟、政治等條件制約，而在執行過程中，可產生的人為偏差；(三)核廢處理安全程度與處理成本間的邊際關係等客觀條件的限制。處身這樣的困境中，抱著核廢這個「蕃」的西方核能界，遂欲將他們的問題國際化；也正是在這個節骨眼上，世界人民一步步認識到這是一個屬於全人類存亡所繫的關鍵問題。

迷信科技萬能的心態

妥善處理核廢的技術並不存在的情況下，西方二十幾年來搶先運用核能發電固然是商人的資本圖利動機的產物，這種事之所以可能，更重要的是由人們對科技的盲目樂觀，心態所造成的。

這種盲目樂觀，今天在歐美先進國家已逐漸消失了，西德四、五年前全面投票反對在國土之內處理核廢，美國接近全面性的核電廠禁建；西歐反核運動的勃興……等事實，在在證明了歐美人民的覺醒。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資本家們在遇到本國人民的壓力下並不會放棄他們的利益，利用——他們在世界範圍內目前掌握的政治優勢，將這個最感困擾，從來沒得到妥善解決的災害，從自己的後院搬到別人的家裏。

資本主義國家輸出公害，出來已久。這是他們追求利潤的制度使然。不足為奇。奇怪的是，在一世界進步人民反帝、反殖鬥爭基本上取得「勝利」的三十幾年全球性鬥爭後，除了巴勒維稱帝，而美國控制時代的「離外」；社會主義的中國竟也有接受核廢的倡議呢？

紐約環境維護基金的資深科學家邁可·奧本海認為，任何一國要另外一個有嚴重經濟問題的國家承擔自己不能容忍的環境負擔，是一種敲詐的行為。他的看法雖然不錯，卻嫌簡單了些。首先，根據這個看法，接受敲詐的一方似乎是處身在經濟的水深火熱之中，即令知道是飲鴆止渴，也身不由己。事實上，西方敲詐伎倆之能為用，其利用被敲詐國之弱點的，絕不只是經濟的一個方面；最起碼，他們要利用，能利用的，還有他們一般知識上的落後，及普遍政治上的落後。識知上的落後最集中的表現在對現存科技的拜物教式信徒，急功近利，盲目樂觀和因無知而生的大膽之上；當西方世界自科技的迷導中驚醒時，落後地區的頂尖人士還兀自蒙在鼓裏：大發科技萬能的寒熱。這種不知如何對科技作出正確認識和評估，才是真正的落後，是人類命運的大敵。

十九世紀末，大英帝國挾世界最富強、科技最前進的聲勢，造成了當時人類科技結晶的巨輪——「鐵達尼」號。由於他們盲目樂觀，以為世界航海界牛首，復有多年造船經驗，這艘最先進的「鐵達尼

」號不但最豪華，而且技術最前端，一定不可能發生什麼意外。結果不幸「鐵達尼」號首航便沉入北冰洋，數千乘客葬身海底。這血淋淋災難為後世提供了活生生的教材，戳穿盲從狂妄，也打破了人們在識知及評估科技的盲目樂觀——以及由之而生的大膽。

在核廢處理問題上，難道中國的頂尖人士有意以國土與人民及萬年子孫的存亡為世界核子防護的「鐵達尼」；在巨難的血痕後，才能打破識知上這種真正的落後嗎？

核廢料的社會成本與政治成本

放射性廢料的處理問題一直是西方工業化國家的難題之一；其所以於今猶烈，技術上的問題依然嚴重，人們的覺醒卻有增不已，是以其處置不但牽涉到安全程度要求高的經濟負擔增加，更加關連到了以社會全體長遠利益為指向的「社會成本」這個更根本的問題上。由於意外一旦產生其災害性的難以想向，社會全體的負擔遂成了存亡繼絕的問題，而不是什麼斤斤兩兩的問題了。是故，這個問題在任何一個社會或政治體中的政治問題性也就超過了一般問題的政治性。具備了極特殊的、絕對性的性質。一般西方民主行事中，如特殊利益對峙，討價還價，協商交易等等成規的學習倒在這問題上基本地都不再適用；必須從這個角度，對西德的全民投票，美國的全面禁建；才能正確的認識其政治涵意。也恰在這個關鍵上，核廢第三世界化的策略才成為可以理解。

當西方科學界對中國同意代貯核廢感到詫異之時，一名西方駐北京外交人員竟說：「對中國而言，這不是生態或道德問題，而是經濟的問題。他們發覺，只要同意提供垃圾堆，就可賺得大筆錢財」（合眾國際社二月十日），姑不論他們露骨的評論是否有根據且將成為事實，此司馬昭之心的不打自招，恰恰說明了帝國主義者一向對第三世界的矮化及盤剝不止在經濟、知識等方面，更在於政治方面。第三世界經濟、政治、知識上的落後，是為他們敲詐的本錢；他們在經濟、知識、政治上的缺陷，正是帝國主義嫁禍於人的資產，從這個角度看來，第三世界人民要使反帝不成一句空話，不但在經濟上要擺脫對發展神話的盲從依賴，在基本的識知上培養尖銳的批判性獨立思考；更必須在政治上建立最廣泛、最實質的民主，將一切外來壓力與陰謀，最公開的納入人民民主生活的過程之中，以全民的力量嚇阻、擊退任何嫁禍的企圖，並集結、凝聚自力更生的力量，根據這個理解，西方核廢中國化的事件，恰為中共當局表現踐行民主的最佳機會，此事當最廣泛的進行全民性的研討，並由人大制定法律長期監督；粉碎西方核廢嫁禍之圖，必先集合全民之力，改造他們「政治盤剝」所據的本身政治生活上的落後與缺陷——惟民主得以反帝，此其義也。

美國左派 與 總統選舉 過客

在美國這個高度壟斷資本主義的國度裡，談起總統選舉，左派智識份子總會嗤之以鼻，認為不是導向社會變遷的正途。他們所持的態度不外有二：一是不管民主黨或共和黨人士當選，都是美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表，沒什麼兩樣；二是堅持不受壟斷努力的愚弄、控制，不參與選舉。即使積極一點去參選的，也並不是期望某一個人被選上，而是要讓另一個人被擊敗，所謂「兩惡中求一較善者」(Lesser of the evils)，如此而已。

然而自雷根總統於1980年上台之後，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呈現着激烈右傾的現象：社會福利預算的減縮、國防預算的急增、對工會的壓制、對個人隱私權的破壞、失業和飢餓人口的大增、偏袒大公司、環境問題日益嚴重、中東政策的蠻橫、公然入侵格林那達島、CIA企圖顛覆尼加拉瓜社會主義政體、經援薩爾瓦多極右暗殺集團、核武競賽的毫無限制，其整個政治精英體制、法院、官僚、傳播媒介、軍事組織、公司、銀行、基金會、大學、智識份子、學生、種族歧視份子和反動份子，也都跟着執政者的步調。正在加速的國內外危機都

衝擊着左派人士一貫所堅持的鬭爭理念。不可避免地，為了反對雷根，就有些人想超越前述消極的態度，呼籲對1984年另外看待。

無力的左派

當然，左派之所以厭惡選舉，主要原因是控制不了選舉。二月號的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如此承認道：

「美國的左派沒有群眾基礎，也無顯著影響大眾意見的力量，甚至脆弱到連某些政客和大眾傳播媒介都可以輕易歪曲、反擊其言論，或變成替罪羔羊。因之，在美國談『左派政治』是毫無意義的。此便意味着左派當今的要務是扭轉此一情勢，爭取表達大眾意見一席之地，努力強化、擴張，使之成為政治運作上一有意義的基地。」(註一)

怎麼「扭轉」呢？左派在此面臨着一項既定的痛苦抉擇：反對雷根就是投民主黨的票。因為，從歷史上看來：

「任何高度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統治階級，都

有兩大集團，一是中間路線集團，一是右翼集團。在資產階級民主的架構內，正常時期下，資本累積的程度頗為順利，則這兩派的相互合作就有其共同的利益。然而在經濟危機時期下，右翼集團努力往往會伸張，使得民主架構受到壓力。如果由於歷史因素，此種架構較為脆弱，經濟危機則會使之解體，而代以一相當極權的政體（此即法西斯勢力）。像英國和美國這種資產階級民主有深刻歷史根源的國家，右翼勢力的抬頭便造成法西斯傾向。雖然如此，它的法西斯勢力還是和其他國家不同，因為基本上，憲制的連續性並未中斷，是故，回歸到資產階級的正常運作還是可能的。」（註二）

資產階級民主的建立對左派勢力的伸張是絕對必要的。雷根極右勢力的執政，已經造成了階級矛盾的尖銳化，表現出資本主義真正的壓迫性質，也創造了一批極端反對他的群眾。因之，辯證地看來，1984年就是把雷根的法西斯集團擊敗，把執政者拉回到正常資產階級民主運作的最好時機。

然而，對左派而言，重要的不只是等到十一月投個票擊敗雷根就算了事，最重要的還是整個選舉運動「過程」的利用。

因為，不管選舉是如何受控制，它還是可算作資本主義多元社會的一個「軟點」（soft point），統治精英還是要付出競爭，並且給予一點民主的表示，甚至讓步。在現存體制內，左派所能掌握的政治權力和資源已經很少了。因之，必須完善利用，在他們的地盤上以他們的遊戲規則來作鬥爭。（註三）

街頭政治

就投票而言，左派必須與民主黨成立「統一戰綫」，但在策略上却有不同的意義。

因為歷史可以證明，推動美國社會進步的，不是票箱，而是行動。

就是年輕人在舊金山反對「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UAC），才使麥卡錫主義的囂張收斂一些；就是馬丁路德金和「全國統一行動委員會」（SNCC）所率領的黑人和年輕人的示威。才贏得了1960年代的人權法案；唯有婦女的街頭抗議，才有她們今天的地位；反核電、反核武也是一樣

。有權者只會對群眾的騷擾，而不是票箱，作出反應。靜坐、示威、罷工、罷課、市民反抗、群眾遊行、抵制服兵役、甚至暴動，才是制服統治階級貪得無厭的利益追求最有效的方法。（註四）

在美國社會裡，早已存在有許多運動團體，以及一大批期欲變革的工人和中產階級，根據 Pat Ceddell 的民意測驗顯示，民主黨的權力精英，由於智識和道德的墮落，一直沒有走入這批群眾內。也就是這批群眾的低投票率，才造成1980年的雷根上台。喚起群眾的任務唯有透過進步人士才能達成。（註五）

因之，左派就是要利用選舉過程，抓住機會，提出問題。讓人們去思考，建設性地批判凡俗／改革正義者的幻想，使大家瞭解，除非拋棄資本主義體制，真正的正義與公平還是無法實現。由此在政治舞台上建立左派的形象。（就這點上，支持 Jesse Jackson 的競選就有很重要的意義在。雖然 Jackson 不是左派，但他的政見理念和作為，相當符合左派的觀點，但左派却一直不能做到）。另一方面，要繼續群眾行動，如能造成全國左的氣氛，則雷根的下台更有可能。

很明顯地，這種支持民主黨的競選，而又要堅持左派理念純潔性的作法，本身即充滿着矛盾。或許，重要的是認清楚運動的方向，掌握住情況發展的規律，不可對資產階級的運動存過多的幻想。因之，像衛報（Guardian）和村聲（Village Voice）對加利·哈特（Gary Hart）的投機和角色矛盾的批判，似乎才標誌着運動的開始吧！（註六）

（註一）：“Monthly Review”，Feb. 1984，P. 3。

（註二）：同註一，P. 2。

（註三）：Michael Parenti，的“Guardian” Feb. 1, 1984, P. 19。

（註四）：Sidney Lens，的“Guardian” Feb. 1, 1984, P. 19。

（註五）：“Mother Jones”，April 1984，P. 10。

（註六）：見“Guardian” March. 7, 1984 與“Village Voice” March. 13, 1984。

法國實行 社會主義 制度嗎？

羅英譯

密特朗上台已近三中，他在八一年五月就職總統之時，可說是集衆望所歸；但到現在他反成了千夫所指的人物。他當初的獲選，被譽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再出發；但現在密特朗政府的作為，則被評為「社會主義神話」再一次的破產。

在此篇文章中，我首先想破除人們認為法國實施社會主義已經失敗的幻覺；其次我再討論二個問題：為什麼一位社會主義領導會成為李根在歐洲最佳的搭配？為什麼一個向來最具先進精神的國家，在近年來全歐反核運動中，竟沒多少表現？

社會民主的輓歌

社會主義時常背黑鍋。過去人們一向把蘇共與社會主義二者畫上個等號；如今，社會主義，對一般人而言，與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同義。

在法國及朝向社會主義道路邁進的一些南歐的政府，由於它們目前仍無法解決國內經濟的衰退，因而被定論為資本主義不能由社會主義中尋找出路。而有些報章雜誌也報導說，在巴黎、羅馬、馬德里、里斯本、雅典等地的那些社會主義政府的夢想，根本經不起真正的政治考驗。

由一般對社會主義的批判文章中，我們可發現它們有一共同的錯誤觀念：因為事實上，上述五個

南歐政府，沒有一個是真正在實行社會主義。它們所實施的「社會主義」，全是仍在資本主義體制中打轉的「社會主義」。那些為社會主義唱輓歌的人仕，只不過是為社會民主唱安魂曲罷。

我們只要大致查看這些社會主義政府的「失敗」之處，即可明瞭上述之點。義大利的總理葛拉齊雖是個社會主義者，但他在政府中任用的人員，仍是以右傾的基督民主黨派人士為主。而在葡萄牙，社會主義份子索瑞斯之所以會當選，並非因他宣稱要排除資本主義，而是因他號稱要重整資本主義體制。至於西班牙佛薩列斯社會主義政府的主張及措施，使得西德保守的施密特總理的作法顯得激進。

當然，葡萄牙、西班牙、希臘這些國家，都是在這幾年內剛由獨裁統治的重壓下，解放出來。這些新上台左翼政府的目標，先是恢復、強化資產階級式民主中的基本人身自由。至於是否需先來個經濟體制的大改革，才能達到人身自由的目標，則是另外的問題。

也因此，如果我們真要檢討社會主義實驗的成敗，焦點放在巴黎，畢竟，法國政府由左翼黨派成員組成，其中也包括了共黨份子；而且不久之前，當地的社會主義份子對所謂的「社會民主」根本不屑一顧。

對密特朗總統，我們可持平來講，他從未要求

在法國來實施社會主義，他也從未對他的支持者提出革命的呼聲。可以說，一個廣泛的聯合陣線（POPULAR FRONT ALLIANCE）代替了革命。在六八年五月，法國的學生運動，與其史前無例的靜坐示威所造成的社會動亂，使得左翼黨派都大吃一驚。當時法共與社會主義人仕都決定要致力於如何來引導這種自發性群眾運動的力量，使之進入議會路線；它們也都致力於來說服其支持者，使他們相信革命並非捷徑，改革必須逐步地在體制內進行。於是在七二年，兩派人仕擬定了「共同綱領」，譜繪改良道路。

但這個共同綱領，也引出一些副作用。溫和的綱要，有利於聯合陣線的溫和派。於是權力的重心也因此逐漸轉到社會主義份子身上。由於法共不願屈居下席，而導致聯合陣線的分裂，更使左派在七八年國會議員競選中失敗。這些分裂後的左派人仕，他們在選舉中從未好好的討論經濟危機及解決之道。因此，密特朗大可誇口說，八一年選舉獲勝全是他個人努力的成果。至於共產黨因它早已與社會主義人仕分裂，所以即使也因密特朗上台，而趁且法國比以往更依靠外資，因此只要利用法國這種對外依賴性，使法國通貨膨脹高漲，貿易赤字飛升

，就足以使這個「社會主義」政權倒臺了。果然八三年三月，法郎第三次貶值之後，法國政府被迫以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維持國際收支的平衡。所有的改革，也做了更進一步調整而緊箍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中了。

有些社會主義者仍相信他們可在資本主義體制中，滲上些進步的社會政策。但這種幻覺很快就破滅了。財政部長狄洛斯已表示社會福利預算得削減。因為工作機會愈來愈少，於是失業者再訓練及員工提早退休等諸計劃，執行起來就愈來愈貴，愈來愈困難。而且如果想重整工業結構，更大的裁員又是避免不了。整個社會氣氛的改變，在八三年可看得十分清楚；證券交易所對社會主義政府大力贊揚，而勞工組織反而向政府不斷示威抗議。在巴黎股票上漲十分的快。而工人的不滿，也在當年九月選舉社會福利委員會委員中表現出來；二個支持政府的大工會（勞工聯盟、天主教法國民主勞動聯盟）的候選人遭到慘敗。而且自此之後，勞工界領導人物開始與密特朗疏遠。

一個左翼政府，不顧自己支持者的福祉，必定會導致內部的批評。目前法國社會主義政府，遭到內部二方面的批評：

稿約 — 這-是-您-的-刊-物 —

民主大家來，台灣是大家的台灣。「民主台灣」是您的刊物，是所有關心台灣、贊成民主者共同的刊物，而不是作者、編者少數人的。我們最大的目標，不單是在林林總總的海外刊物中增加一份可讀性高，富有知識與資料的刊物而已。我們更希望這份刊物能成爲一個橋樑，溝通不同的意見，增加對台灣的關懷與認識。讓我們知道，有共同理想的人到處都有，而且愈來愈多。讓有心人士不覺孤立無力，在海外或回國能爲我們的故鄉，爲社會正義而努力。

因此我們特別需要您的來稿，或來信討論、批評、或捐款、介紹朋友。我們題材很廣、只要跟台灣有些關係。方式不拘，專文，隨感，漫畫，文藝等等都行。我們力求包容性大，只要不流於謾罵或不實，各種意見立場都歡迎。當然，我們會有開放

而慎重的審稿，以向讀者負責。代表我們意見的，將以本刊，本會與編者按語表達。長度亦不限，但最好在一萬字以下（這是篇幅所限），過長者請先與編者聯絡。

請橫寫。我們有稿紙備索。我們很窮，暫時發不出稿酬，但可以贈送五本給您的朋友（來稿請同時開列名單）。

關心台灣，提倡民主本是光明正大的事。但一些嚴峻的事實，特別陳文成事件的先例，使大家都很小心。我們對來稿來信，都將絕對保密。歡迎筆名聯絡，但請附上通信住址與電話。

來稿與信寄到：「民主台灣」編輯部

O S D M T
P. 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1 「第二左派」——此派以天主教勞動聯盟的馬艾爲首。自從社會主義政府當政後，馬艾一直維持善意的批評：他爭辯政府如達成目標所採取的手段並不適當；他也強調工作時數降低，與適量的降低工資。

第二左派的問題在於它一直著重社會民主的綱領，一面却採用新左派的批評論調，這二者根本是相互衝突的，天主教勞動聯盟主張工人自主、自營工廠；但就工人言，自主、自營如果限於在個別工廠內實施，而與整個社會改革方向連接不上，這種此獲得一些行政席位；但對整個政府的決策發生不了什麼影響力。總言之，左派的那次勝利，主要是因人們對原來右派政府普遍不滿，以及很怪異的在工人示威運動衰退聲中，脫穎而出。

無論如何，在經過二十三年保守政府當政下，法國左派的獲選，意義非同尋常。法國左派保證要與過去劃清界線。在上任的頭一年半中，密特朗實施了一連串的重大改革，它們可大致分爲三類：

1 擴大公營企業範圍——鋼鐵業、電子業、軍火業、石化業及銀行業、保險業的國有化。

2 頒佈一連串社會法令，加強社會福利（而當時一般潮流是減少）；比如：工人工作四週後，第五週可休假領薪；縮減每週工時至卅九小時，提高最低工資數……等。

3 立法來增加工廠中的工人權利。

所有的種種改革，很明顯的，不但全屬於資本主義體制內的改革，甚至不去質疑整個體制的基本假設。國有化的作用是想來改革那些處在危機中的工業；比如鋼鐵、電子工業等。資本家做不好的地方，國家來接辦；但只是想把它做得更好，而不是改用其他方法。它不會指出生產可以爲不同的社會目標，也沒想到要重組生產制度。所有爲減低經濟上不平等的措施，從未表達爲追求一個平等社會的手段。同樣地新設的工人商店並未被當作消滅私有制的序曲，相反的，它不久便大力贊揚私人企業。

雖然這些改革動不了既有體制的一根毫毛，但却足夠招致一些人的敵對。最令人驚訝的，莫過於這些社會主義新生代的作爲，彷彿法國及歐洲仍處在二次大戰後不久的小康階段。他們認爲仍然採用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即可使法國脫離經濟衰退局面。蘇黎世及其他金融中心的精靈們，他們當然地從根本上就不會信任任何社會主義政府。但他們也

不用設計什麼陰謀來推翻法國的改革。要知道法國是共同市場的一部份，在其中它沒有關稅保護，而自主、自營方式，實質上等於進行「自我剝削」。

2 另一個內部批評派系，可稱爲「生產份子」。他們批評政府，放棄了原有的經濟擴張計劃；他們認爲，快速的成長率乃目前經濟困境唯一解決之道。這個團體中的成員，多爲社會主義人仕及一些共黨成員。但他們的說法，並不很有說服力。

整個問題的中心在於，在法國這種總統個人獨掌大權的制度中，政府成員不敢公開質問密特朗政策背後的想法，主要爲有關在國內採用資本主義式的解決方案，與他對外貿自由放任的策略。這種種內部的批評，只能及於政策實施後的結果，而不能探到它的根源；也正因此，這些批評顯得不連貫。法共更明顯地被逼到尷尬地步：任職於政府機關的法共成員，他們得執行的計劃，正是他們自己黨與工會領導人所強烈反對的。

任何真誠的社會主義運動，一定會遇到一種兩難之境：如何在體制外，尋求因爲現存體制造出的種種問題的解藥，而且它同時得在體制內奮鬥。如果只把眼光朝向未來，則它會發現自己跑在支持者前面若干年。但如果考慮現時利益，它只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扮演經理的角色。在還沒掌權時，法國左派並沒顯示出它可跳出這種規律；而一旦密特朗上台後，這種二難之境反也沒成什麼大問題。這倒不是因爲密特朗及他的同志有什麼特別妙計，而是他們採用社會民主派的做法——一旦遇到經濟危機，發現自己維持不了當初的保證，於是背叛了原來的支持者。至於像是否社會主義政府能比前幾任政府更能把資本主義「重整」的更好，這種問題對他們自己無關緊要。密特朗政府的政策已與右派十分相似。它的成功，已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勝利；它的失敗，也無損於社會主義。

目前，在密特朗當政任期的中間點，法國社會主義的實驗在政治上看來，好像失敗了。下次國會的選舉將在二年後，而下屆總統選舉也在約四年後。對密特朗最佳的算盤是他在國會選舉中，分化右派人仕，拉攏其中的溫和份子，將之與自由保守主義份子及社會主義份子聯合起來，而他本人成爲這種「中間同盟」的領導；至於共黨人仕，他們仍可與社會主義人仕維持聯盟，但不會再在政府內閣中做事。但這種可能性機會不大。左派人仕獲勝的機

會愈來愈少。左派目前作法事實上在為右派當政鋪路。一旦右派上台，將會對勞工群眾發動大反擊。而真正為這右派反攻奠基的，正是左派「自己的」政府。

還有其他的路可行嗎？目前左派人仕已浪費了它大部份的政治資本。在八一年，他們曾累積起大量的政治本錢，當時社會主義份子請求大家多做點犧牲，而就工人言，只要他們知道一定的目的與一定的期限，他們是願意勒緊腰帶的。如果密特朗能為大家劃出一套社會主義的遠景，及設定一套具體的實施計劃，他很可以把中產階級一分為二，拉攏，比如說老師、技術員、研究員等人仕的支持。但這一切不能靠著虛假的共識來達成。政府應該用坦誠的態度，承認歧異的存在，而尋求真正的聯盟，因此而能為達成社會轉型的目標來長期共事。另一方面，政府自己對一些事物的認識也應改變；它不應一廂情願的認為自己高於人民之上，而應鼓勵大家在各層次上有公開的討論與辯爭，不論在工廠或辦公室中，不論在地方或中央議會中。

有些人仍然認為，即使法國有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即使人民也響應政府的呼籲而願為做一定程度的犧牲，法國整個社會主義試驗也不會成功；這因為國外的壓力仍是個大因素。這個論點多少提醒我們，在目前經濟相互依賴的時代，僅想在一個國度內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尤其像法國這種疆土不大的國家中，簡直是幻想。但這個反對意見其實並不相干。因為問題不在於社會主義能否在一個國家內建立起來，而在於——在一個中型民族國家內，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不是可能開始進行？這是一個關鍵性問題，但要回答它，我們得先查看密特朗政權的對外政策。

李根的奇異搭檔

法國在整個西歐反核運動中，像個孤島，沒什麼大動靜。這原因之一是密特朗一方面武斷的把中程、戰略性武器分成二類，而且有意對潘興飛彈的危險性避之不論，另一方面他巧妙地訂了一套宣傳計劃，顯示出他多少對全國人民做了些洗腦工作。

「洗腦」的確是名符其實。像「核戰次日」(THE DAY AFTER)這部影片，在波蘭可放映，但屬於法國政府的電視台，卻沒播放，理由是「觀

衆不適看」。雖然這部片子可在電影院上演，但在公共廣播電台中，中小學生問及核戰大毀滅的可能性時，全由一位專家葛羅來回答。葛羅是位退役的將軍，目前從事軍火業，他與官方的立場完全一致。

在一月四日，法國電視台籌劃了八十分鐘核子問題的討論會，一些反對官方政策的評論家一如法共發言人胡昆——出現在鏡頭的時間極短，多數時間是由為官方護航的評論員A. GLUCKSMANN 所獨佔。

但僅靠「洗腦」這種手段並未能完全說明法國反核運動的弱勢。另外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像法國既然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一員，處在這種地位，法國政府即使鼓呼美國在歐洲佈署飛彈，也比較不易造成政治問題。反正這些基地全不在法國境內。還有些法國人天真地以為，即使發生核子戰爭，飛彈也不會炸到法國來。另外我們必須了解法國共產與社會主義份子，他們在很久以前曾反對核子武器，但這些人早已轉向支持建設國家嚇阻武力，也因此要他們再反過來反核，也不太可能。

另一個因素是非共產的反核組織，像歐洲反核委員會等，並未能引起大多人的注意；於是一般大眾認為是共產黨在領導和平運動。這種聯想有三個反效果：

1. 法共既已經宣稱支持克里姆林宮對波蘭與阿富汗的政策，大家也因此不認為它在處理國際事物上能真正的公正。

2. 共產黨指示和平運動中的法共領導們，必須同時反對蘇聯的SS-20飛彈與美國的潘興及巡弋飛彈；但成效並不好。

3. 法共參與政府，而這個政府却是全心全意支持美國發展飛彈的計劃。

由於這些，法國社會主義者及他們的領導得承擔起法國左派不負責的舉止。

當然，公平的說，密特朗並沒欺騙他的選民。民衆只是預料到他會為美國辯護的那種熱情吧。他一直想來說服各鄰國來接受法國所拒絕的事物——在各國土地上設立美國飛彈基地。也因此八三年競選中，密特朗到波昂訪問，就飛彈的問題，他是與德國基督民主黨站在一起，而共同反對他德國友黨社會民主黨的主張。最令人奇怪的，倒不是密特朗願意成為李根在歐洲最主要的護航人，而是他願

意人們這麼來看他，這就引起不同的猜測。

由官方立場來看，密特朗與李根站在同一邊，是因為在蘇俄發展出SS-20號飛彈後，它已開始佔了上風。但真正客觀的看，核彈的事不會這麼簡單，因為二超級強國如能在歐洲佈署飛彈，這正可給美國反敗為勝的機會。假使情況與現在完全相反，譬如說，蘇俄在古巴設置飛彈，它們能在美國反擊之前更快的來摧毀攻擊目標，那麼法國政府又該怎麼說呢？

關於法國核子策略，有另外二種說法。其中一是法國支持美國在歐洲設核彈基地，因此美軍仍可駐守歐洲，而可繼續保持德國分裂。法國外交政策最主要目的之一是防止德國的統一。這種說法的毛病是當時戴高樂在擔心德國問題時，他跑到克里姆林宮，而非白宮，去尋求支援。另一種說法更缺乏想像力，它說密特朗一直想證明即使他政府中有共產黨員，他仍能有自己獨立的外交政策。也因此，他必須對莫斯科站得遠一些。

所有以上的分析，明顯的導出了一些更根本的問題，明白的指出密特朗的見識與作為，仍只限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中而超脫不了。法國社會主義者的作風，正好證明了他們只能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下，尋求法國經濟問題的解藥；同樣的，他們也不會由「中立主義」，「不結盟主義」，社會主義「第三勢力」，等這些源起於西歐的觀點，來思考整個法國未來的發展。和戴高樂因「錯誤時代的現實主義」而獲得的成就相比，密特朗的失敗就更加清楚了。

戴高樂想將法國拉上與美、蘇同等的地位。但法國疆土既然如此之小，戴高樂在懊惱之下出了個主意，他想把所有在「萊茵河畔，阿爾匹斯山，庇里牛斯山」一帶的國家組織起來。做為這個新組織的領導人，戴高樂自認為因此可有足夠的力量來向這二個「霸權」挑戰。這位將軍的現實主義精神在於他相信，「國家這種體制」，雖然是歷史發展下來必然造成的罪惡事物，但它仍可成爲一工具，在國際權力爭鬥中，發揮其多種力量。也因此，戴高樂使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用法郎向美元挑戰，反對美國的越戰，減緩整個歐洲的政經整合。但他失敗了。對外資——特別是美元——的入侵歐洲，戴高樂沒有能力反擊。他也沒爲歐洲提出另一條可行的出路，自然別的國家也

不頂理會他的領導。當時左派對他批評多少基於這樣的假設：將來，如果法國有一個社會主義政府才有可能實現戴高樂的理想。因爲它能創出一個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社會，而且有不同的外交政策。密特朗的作法否定了這個假設。

在八一年，社會主義政府剛上台時，它的外交方面看起來還有些新觀念；比如，它主張法國應多與第三世界加強關係，藉此多少脫出國內經濟的困境。那時，在巴黎，大家也流行著這樣的看法：當今世界主要問題不是「東——西」衝突，而是「南——北」關係對超級大國間的競爭，它也認爲法國應有自己獨立判斷的標準，像它責難莫斯科對波蘭團結工會的處置，同時也反對華盛頓欺凌SANDINISTAS(尼加拉瓜革命團體)。它強調法國應爲西方世界做個榜樣，來減低軍火輸出，及增進與不結盟國家的關係。這種種講法，現在看來簡直像在吹牛。實際上，法國派駐軍在貝魯特，另外法軍在查德也弄得進退兩難，它也銷武器給沙烏地阿拉伯。法國政府對李根的中美洲政策默不做聲；它連想給世界各國做個榜樣的姿態也沒有。在法國做爲「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主席的幾個月中，密特朗到各國訪問，想尋求「共同體」的共同經濟策略。他想達成一獨立西歐集團，這種成功的機會遠比當時戴高樂可能成功的機會更少。

我們現在可以再回到原來的關鍵問題：民族國家能不能作爲建立社會主義的基本架構？可以的：民族國家可爲社會主義的實現提供初步的架構。但另一方面言，我們也很難想像出社會的徹底改造只僅僅發生在某一限定地區，比如在整個台灣，只有高雄市走社會主義道路。但以一國爲單元，仍可用來作實現社會主義的起點，一個真誠的社會主義政府，其內部成員相互磋商，它一切的決定都是以勞動人民爲依歸。誰也不敢說這種做法一定行得通，畢竟這還沒有那個政府真正的試過。密特朗的失敗，國內國外的因素皆有。而社會主義在歐洲，仍然是個「新的觀念」，它的「新」，在於沒有一個政府真正試過，在於它還沒在西歐真正實現過。

(譯自：DANIEL SINGER：「MITTERRAND：MIDDLE OF THE JOURNEY」，刊於THE NATION，238-9，MARCH 10, 1984)

從國際關係 看台灣問題

—林德英—

曾聽到一位參與過黨外的新生代若有所思地說：「有時想到數十年之後，回頭看看我們今日在黨外運動的努力會不會只是虛功一場？」這種深思是不無道理的，因為有許多歷史性的，國際性的力量都很龐大，可能會吞沒目前黨外人士的所有努力果實。

這位新生代或許過於悲觀、虛無。但不可否認地，對這種歷史性的和國際性的鉅大力量，應是每位關心台灣問題者所不應忽視的。

然而，在台灣，這方面的分析，討論文章却不多見，僅有的少數^又站在美國本位的立場討論（這自然是國民黨宣傳與控制下的現象）。擴大視野，跳出框架，實是目前台灣黨外運動迫切課題之一。

本文便是從這種「擴大視野，跳上框架」的角度來分析國際大局對台灣問題的影響。文中有些關點，例如「國與國之爭佔絕對主導地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是次要的」等還值得深究，因此我們有所保留，有些主張或結論，我們也覺得還可加以討論。但這篇文章的角度是值得關心台灣問題者的了解與思索的。我們期盼這種新角度能帶來對世界局勢較全盤的認識，帶來更多的討論。

——編者識

前言

台灣問題，幾十年來，一直都是中國的，也是國際上的一個突出的問題。它涉及的範圍很廣，內涵很複雜。本文所要討論的，是它的政治前途的問題，也就是台灣將會與中國大陸走向中國的統一，還是走向進一步的分離，還是在可見的將來仍然保持目前的局面而拖下去的問題。

影響這個問題的因素很多，但去其枝葉，存其根本因素也可以說是很少，少到只有一個：即中美的戰略關係，這是本文的立論所在。

台灣問題有幾個特點。台灣問題是個敏感的問題，是個複雜的問題，也是個精彩的問題。台灣問題，首先涉及台灣人民的前途，他們的願望，感情，以及過去與台灣政權當局的種種恩恩怨怨；對於

整個中國來說，台灣自從甲午戰爭離開祖國後，除開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短暫的四、五年以外，可說與中國大陸有八十多年的分離了，這段歷史，正是中國最近這幾年悲慘命運的寫照，因此中國人民的務必要收復台灣，也是一個十分敏感而有「歷史使命感」的嚴肅問題。

台灣問題是個複雜的問題，因為很多因素在產生作用，諸如：台灣的經濟情況，當局與人民的關係，蔣經國的繼承問題（這是個十分突出要緊的影響未來台灣局面穩定，因此影響台灣前途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及當局對台灣問題的政策與方法的運用問題，中美雙邊關係以及中、美、蘇的三角關係等等。這就是前面提到的台灣問題因素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乃是中美戰略關係。戰略二字在本文有較廣義的使用，當然包括政略的意義。

怎麼說台灣問題是精彩的問題呢？在政治歷史

上很難找到像台灣問題這樣具有下面幾個根本問題糾結在一起的局面：美國的不肯放手台灣，很明顯地顯示出台灣問題是個傳統的國與國之間勢力範圍之爭。台灣問題開始於甲午戰爭，不正也是傳統的強權的霸佔勢力範圍嗎？另一個根本問題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勢力之爭，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就是這兩大陣營鬭爭的焦點之一，於今餘波蕩漾，其意義猶在。台灣與大陸幾十年相隔，經濟體制的不同，帶來了生活習慣與意識形態的疏離感，這也就成了個如何融合的問題。另外一個問題是地理上的台灣與大陸一水相隔，當中國國力強大的時代，一衣帶水，是人民來往娛樂旅遊，十分詩意的環境；但當中國國力不夠強大的時候，則成了外國強權入侵分隔的方便之路了。由於這四大因素，所以台灣問題在政治史上，應該是個難得的精彩局面，凡對將來解決台灣問題有貢獻的人，都將是作了精彩的貢獻。

在這四大因素上，它的根本因素又是傳統的國

台灣問題是個傳統的國與國間的勢力範圍之爭，又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勢力之爭。

與國之爭：強勝弱敗，如此而已。因此本文願就此台灣問題的本質，略加檢討，以敘己見。在此特別要說明的，是本文探討的態度。它將是盡量不帶任何情緒，沒有任何偏見的說明與分析；屬於過去的，都是「是什麼」，而不是「應該是什麼」，屬於未來的，是預測「會發生什麼」而不是「希望發生什麼」。

台灣問題的兩大結構

兩大根本權力結構決定台灣問題，一是傳統的國與國爭，也就是中美的較量；另一個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勢力之爭。前者是佔絕對的主導地位的；後者是次要的，是從屬於前者而變化運用的；而且隨着時間的進展，前者將愈形重要，後者將愈變化多端，為前者服務，有一個重要因子影響於台灣問題的，就是蘇聯與中美的關係其重要性也就從這兩大結構中表現出來。蘇聯在國與國爭的結構中

，它與美國形成兩個超級強國，在全球處處針鋒相對。兩霸相爭，形勢早成，在可見的未來也不會改變。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爭的結構中，蘇聯幾十年來自認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其軍事政治力量也是強大的；美國是資本主義陣營的領袖，反共為其基本國策，全力阻擋蘇聯的勢力擴張，現在已頗有招架不及的態勢。因此在全球的戰略上，不論在那個結構上，美國與蘇聯的鬭爭都是主要，根

在可見的未來，蘇、美鬭爭無法本質地緩和的全球形勢下，逐漸強大的中國就成為美國拉攏的對象，以共同抗蘇。是十多年來，中美關係改進的基本原因。

本而無法和緩的。而蘇聯的力量逐漸擴張，美國基本上全力圍堵，以減緩自己勢力的衰退。因此在可見的未來，主要是美蘇鬭爭得死去活來無法本質地緩解的全球形勢下，逐漸強大的中國就成為美國拉攏的對象以共同抗蘇。這就是十多年來中美關係改進的基本原因。其他經濟、貿易、科技，教育等等關係才能隨之而來。然而在中美需要改進關係的基本戰略需要下，台灣多年來却是美國的勢力範圍，美國豈肯輕易放棄，這就是台灣問題的本質了。這個本質，就進一步決定了台灣問題的兩大特點：第一，由於中美關係改進是合於雙方的根本利益與需要，沒有任何其他因素比它更重要而能取代它，因此成為中美關係改進絆腳石的台灣問題終必解決。第二，因為台灣幾十年來是美國的勢力範圍，而台灣當局的統治又頗為穩固，經濟也頗有發展，美國也因此絕不會輕易撒手台灣，讓它與中國統一。這兩大特點就充分地、全部地、徹底地說明了過去這十二年來中美關係的既有進展，又因為台灣問題而道路坎坷，高低潮起伏的情況。

我們再深一層看這兩大特點相加在一起的意義是什麼？中美戰略關係的繼續進步的相互需要，會表現在經濟關係的加強上，其中條件的變化，談判的出入，終會超過美國繼續把持台灣為其勢力的範圍的利益，那時美國必拱手讓出，而台灣問題就解決了。另外，台灣內部的安定也會影響台灣問題解決的具體情況，會產生或是悲劇或是喜劇性的戲劇化

作用，這可由上面第二個特點加以深思而了解。不過台灣內部問題不在本文討論之內，在後文只略論其政局的可能變化。

美國戰略上的如意算盤

美國在可見將來全球性戰略的目標是與蘇聯爭霸，既是國與國爭，又是制度與制度爭，真可說難以化解的「到死方休」的長期鬭爭。因此美國的戰略是聯華以制俄。但是由於中國是個有無限潛力的東方社會主義大國，在骨子裡又不放心徹底的「聯華」，時時表現出「抹不開」的樣子，因此它的理想戰略就必然是「以華制俄，以日制華」？本文不詳細論到美國「以日制華」的問題，只要深入觀察就能發現其道理所在了。近幾年美國極力鼓動日本整軍，煽動日本「愛國主義」精神，就是明顯的例子，他表面上說是爲了抗蘇（當然也有抗蘇的意思在內）然而實際意義我認爲却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制華。想想下面這點就能明白了：以今天蘇聯核子及海軍武力的強大，擴張之兇悍，日本是個全靠貿易生存的小島國，美國勸它加強海軍，巡邏東亞，它敢動蘇聯一根汗毛不？然而中國海軍尚弱，又有台灣脫離於東海之外，日本整軍的意思就不簡單了。

再說「以華制俄，以日制華」的美國戰略與台灣問題有什麼關係？上面提到的鼓動日本整軍，巡邏東亞就與台灣的孤處東海發生了聯繫。並且美國不放棄台灣的勢力範圍，就是一個與中國發展關係的籌碼，也有「以台制華」的意思在內。因爲台灣力量太小，又是中國固有領土的一部份，美國運用起來不容易，但是它的構想却可能與「以日制華」是一樣的。

中美蘇三角關係

中國是美國能爭取以壯大它戰略力量的唯一主要來源，其中也蘊藏着巨大的中美經濟合作的利益，這是促進美國撤手台灣的力量。但是它又不放心中國的「大國」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兩個原因，因此又打着「以日制華」、「以台爲籌碼」的如意算盤，這是阻止美國撤手台灣的力量。美蘇兩霸相爭，有兩者都息到吃不消，想尋求緩和，這也是阻

止美國撤手台灣的力量，但這是暫時的，不是根本的；它的相爭才是長遠而根本的。因此影響於美國的對台灣關係的主要戰略力量有三個：美國由於美蘇相爭的需要中國，美蘇緩和和怕刺激蘇聯與不放心中國的三個方面。這三個力量的大小與消長變化，就決定台灣未來的歸宿。

一個國家，就像一個人一樣，總是要向最理想最如意的方向發展，直到無法發展爲止，方才另謀他途。美國的「以華制俄，以日制華，以台爲籌碼」的理想戰略，只有在一個情況之下會放棄，那就是，它要「以華制俄」就不能「以台爲籌碼」，要「以台爲籌碼」就不能「以華制俄」（本文暫不

影響美國對台關係的主要戰略力量有三個：美國由於美、蘇相爭而需要中國，美蘇緩和和美國怕刺激蘇聯，以及美國不放心中國的強大與社會主義制度。

討論日本問題），即是魚與熊掌不能得兼的情形。因爲，台灣問題的解決，對中國來說，就是一個戰略運用問題，直接間接使得美國在取捨方面，必須逐漸作出抉擇。只要當它感到繼續據有台灣爲其勢力範圍，則必失去中國爲其抗俄伙伴時，則它必毅然謀求台灣問題的解決而退出台灣，這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當然道理。蘇聯爲了阻止中美的接近，基本上必採取兩種步驟：一方面直接示好中國，謀求改進中蘇關係；另一方面則間接給美國施壓力以改進蘇美關係來阻礙中美關係的改善。縱觀全局，美國的全高戰略是聯華制俄，蘇聯的戰略則如上述。中國的戰略，很自現地，應該採獨立外交而左右逢源爲其上策。從這個角度，也可看出台灣問題必會解決，而又必然是逐漸解決的方式。

中美雙邊關係

基於上面的分析，可見中美蘇三角關係，在可見的未來，是穩步地朝着基於各自理想的戰略思想逐步演進，形勢將逐漸明朗，其枝節性的一部份就會淘汰。而台灣問題就是中美蘇戰略關係未來演進

中的一個枝節性的部份。

因為中美蘇三角關係的演進，基本上是緩慢而穩定的，因此對台灣問題而言，中美的雙邊關係就突出地有它更實際的意義了。

中美雙邊關係的改進，當然是在雙方最高戰略思想與原則指導下進行。這個最高原則就是：雙邊關係的改進，對中美兩國都有利而且是基於相互需要的；美國需要拉攏中國以抗蘇，中國則需要聯合美國以抗俄。這就說明了為什麼自一九七二年以來，雙方政權雖有變更，而此政策不變；美國歷經共和、民主兩黨總統，總統的個人思想差別極大，而保守派勢屢次衝激聯華政策，而這政策却屹立不動的道理。

因此，中美雙邊關係的改進可以說是必然的。這其中還深藏着一個根本道理是：前面提到的蘇聯的戰略原則是多阻擋中美關係的進步，然而中美關係目前還處在初步發展階段，它的潛力巨大，前景廣闊；它已經達到的與它在戰略上的終極意義，應該可以達到的，還有一大段差距，因此蘇聯對它是無法阻止得了的。這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雙邊關係的必然突出發展。

雙邊關係的內涵可以很多。它可以是經濟的，文化的，科技的，甚至軍事的；它的最重要的，也是本質的是經濟關係。美國對開發中國自然資源以及與中國貿易有很大的興趣，前則充分表現在石油的開發上，後者則售賣科技，工廠設備以至武器，包羅萬象。中國對美國的資本，科技設備經營管理企業的方法等都十分需要；對共同開發資源也是有興趣的？雙邊關係能透過這個經濟合作的實質方能達到戰略關係的穩固。回顧這十多年中美關係，不正是為了克服台灣問題的「籌碼問題而跨越發展經濟合作關係的歷史嗎？

台灣因為頗為有效地控制在台灣國民黨當局手中還是美國的勢力範圍，因此它才是美國與中國發展關係的一個籌碼。但這個籌碼不是以交換美國與中國經濟合作的巨大前景以及根本的戰略的意義。我們可以預測這個籌碼會在中美關係改進的談判中，以適當合作的條件或戰略運用而被中國收回去。

還有另一層道理，也會促使台灣「籌碼」的消失。台灣問題的所以產生，就是美國視台灣為其勢力範圍，換句話說，勢力範圍以外的地區，與它勢力

範圍愈尖銳對立，這勢力範圍對它的意義也愈大，反之亦然。這「台灣勢力範圍」的兩個高峯就是韓戰時期與一九五七年的金馬砲擊台灣對面的中國大陸與美國的關係不斷改善與加強，這台灣「勢力範圍」的意義就逐漸消失了，也因此就更容易讓美國撒手了。順便一提：這層道理也就說明了美國堅決支持台灣當局的人士，多是年紀大的保守派，因為舊的觀念、感情與記憶對他們的影響比較大；過去「誰失去中國？」現在當然不要「再失去台灣」。

台灣政局與台灣問題的解決

台灣政局對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影響不大，但對問題解決的實際情況，解決的時間以及台灣人民的生活則有密切的關係。

我們大體可以把未來台灣政局分為三種可能。一種可能是保持現狀，一種可能是政治上走向較民主與開明的道路，一種是由於黨內，黨外，的鬭爭或是經濟等原因，走向動亂下面再分析這三種情況，對中美兩國戰略上的利害得失。

很明顯地，台灣問題是個緩慢的在戰略平衡與轉化中逐漸解決的問題；因此中美都不會也幾乎無法以急切的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台灣政局的保持現狀，會為中美雙方所暫時接受。然而保持現狀却不是中美兩方的目標，兩方都想向各自目標邁進一步。中國方面當然想向統一的路子上前進；美國方面當然是想保台灣在它的勢力範圍以內愈久愈好，愈鞏固愈好。因此，美國不會做出激烈的改變現狀的事；中國方面，早已明告世界，願以和平方法解決台灣問題，當然也不會採取突然的手段去統一台灣。

問題是：台灣的現狀能保持多久？國際戰略關係迫使台灣局面的改變是無可抵抗的；但却是逐漸的。促使台灣政局在可見的未來有較快的變化是個台灣內部的因素——蔣經國的健康衰退及去世。蔣經國是台灣最強有力的統治者，健康情況已經很不好，年事亦高，却還沒有佈置好強有力的接班人。台灣島內對政局有影響的力量有好幾股，國民黨軍方，國民黨元老及長居高位者，台灣本地人為主力的「黨外」勢力，以及有分離主張或傾向的人。

蔣經國去世前這幾股力量的交戰，去世後，這

幾股力量的鬭爭，都會受到中美兩國基於戰略利益考慮的作法的影響。台灣將來的政局比今天更嚴厲禁止與大陸來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我們暫不討論這個方面。因此，正如前述，我們分析台灣未來政局的兩種可能：走向更為開明或走向動亂以及中美兩國對它發展的影響如何。

有絕對權力與威望的領導人的去世，在本質上就意味着未來的政局會走向「集體領導」，當然也就會有較開明的內政與外交的政策。而且，很重要地，台灣的前途正如本文的分析，基本上受制於國際戰略關係，而這戰略關係也迫使它走向開明的方向。因此基於這兩大基本原因，台灣未來政局的走向開明的可能性是極大的。對中國而言，走向開明，意味着大陸與台灣交往（各種人民，學術，經濟等等）的增加，這正是它所號召的它當然歡迎。對美國而言，台灣開明而與大陸多交往，並不意味着就「失去」台灣；而且還有一點，是美國歷年外交政策的「秘密心法」：它認為一個政府的走向開明，表示它更為民主，更受到人民的擁護，更接近於美國的民主政治與社會制度；不論基於它開國者崇高的政治理想，或是基於現實的戰略利益的考慮，美國都會支持這種政府。至少可以說，它有支持這種政府的強烈傾向（雖然美國也常在戰略的考慮上犯錯誤。有時美國政策對其本身不利，我們稱之為犯錯誤。）因此，台灣未來政局的走向開明，是會得到中美雙方支持的。

讓我們再分析台灣政局變化的另外一種可能性——動亂。我們以把動亂認為是一種可能，因為蔣經國年事已高，健康不佳，又沒有一個强有力的接班人，並且內部複雜，各種勢力都想抬頭，正如前述。還有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台灣近年來經濟頗為發展，中產以及資產階級已經產生，他們的經濟力量使他們在實質上以及意識形態上都產生強烈的政治慾望；「黨外」力量與國民黨當局過去多年的鬭爭以及鬭爭的激烈都說明了這一點。試想想：一旦統治強人去世，國際影響是如此複雜，內部幾股力量的政治慾望是如此強烈，多年來的所謂「台灣問題」，必會在台灣糾纏不清的內爭之外，加上爆炸性的對外「路線之爭」。因此我說如果蔣經國在沒有安排好有絕對力量的接班人以前去世，動亂是可能的。

台灣如果政局動亂，對中美兩國的戰略利害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對中美兩國都是個難以應付措置的局面。對美國而言，它當然希望經由動亂產生一個更親美的台灣當局。什麼樣的局面會比今天蔣經國統治的台灣更親美？概只有明目張膽的台獨了。中國對台灣獨立的絕不會容忍，由中國的歷史感以及中美幾十年的因為台灣問題所造成的使雙方受損的歷史就可以使我們確信。因此，我們可以判斷，如果美國想經由台灣的動亂局面進一步「獲得」（「不失去」）台灣，它必然會嚴重損害中美的全球性戰略關係，美國恐怕絕不會如此做的；因為所得者小，所失者大。這種局面對中國而言，當然希望經由動亂產生積極贊成統一的當局。然而如何促成這種轉化也是中國的一個難題。不止如此，如果一旦由於內外因素的變化，動亂却造成台灣走向相反——也就是分離主義的方向，中國該如何辦？這是個歷史的大問題，很可能逼着中國與美國產生衝突，這也就是前面說的美國不願犧牲中美戰略關係而進一步「獲得」台灣的形勢。這種形勢是中美雙方，尤其是美國要避免的。美國過去在外交上也犯了不少錯誤（定義見前）對台灣問題會不會再犯錯誤呢？似乎不會，因為對台灣問題過去的經歷似乎已經使已對這個問題很成熟了。

結論

基於以上的分析與判斷，我們可以做出以下的結論。台灣問題會逐漸走向與中國大陸接近而最後統一的道路，這是由於中美雙邊以及中美蘇三角戰略關係所使然；我們還看不出任何其它更大的力量可以阻止台灣走向這個道路，雖然這個道路可能是緩慢而曲折的（曲折性已經不大了）。戰略關係中，中美雙邊的經濟關係的發展會是個極基本的力量。至於台灣內部的作用，就是蔣經國去世後台灣政局的問題，最可能，也是中美雙方所支持的，將是個較開明的台灣當局，雖然他們對此各懷不同的心思。最後在未來台灣問題的解決上，似乎不會有戰爭；至於由台灣人民投票來決定台灣維持現狀，與大陸統一，還是更走向分離，也像戰爭一樣，似乎在台灣問題的解決上是不會發生的。

一九八三年初秋，於馬利蘭州

(譯註一) Vinod Vyasulu

(印度) 原著

馬耕田 譯

一位發育不良的經濟學家

寓言故事……

本文故事純非虛構，人物情節如有與真人真事相符者，作者乃故意的而非偶然的

(譯註二)

一位發育不良的經濟學家乃是來自低開發國家，他的專業訓練是經濟學。他有兩個缺陷：一、他有知識份子該有的誠實態度，二、他很有正義感。一方面他的能力遠超過盡一生之力從事於對學院派經濟理論作一些微小的補充（而這些理論却與實際應用相去甚遠），另一方面，他投入了自己的感情，這是他來自的文化的一部份。對他來說，祖國經濟之貧窮與匱乏，遠不如他苦學而得之經濟學之貧困來得嚴重。

如果你要了解一位低開發國家的經濟學家會面臨什麼問題，那麼請你來聽聽我的朋友底里普·龐德的經歷吧！

底里普·龐德生於印度一個小鎮的小康之家。雙親是素食者，相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對他們的印度文化很感驕傲，並以能抵制像煙酒之類的歐洲文化之腐蝕為傲。他們的倫理價值觀是典型中產階級的，他們相信追求高薪而穩定的職業。自由放任的經濟制度，個人奮鬥的機會、私用轎車、僕人、西方時裝及“公立”學校。他們反對印度電影中有接吻鏡頭，但對好萊塢的影星却很感興趣。這是人們預期會帶來一個新印度的階級。他們希望他們的兒子底里普能躋身入精英統治階級。

底里普從小就接受“現代”教育。在小學裏聽到喬治·華盛頓與櫻桃樹，華特拉雷與其牛蓬、耶穌與其羊群等故事。就是沒有提到甘地，沒有提到印度詹西城的女王（Rani of Jhansi），沒有提到 Vivekananda（按：印度教的一位領袖，1863~1902）。他能用英鎊、先令、便士來算錢，但對盧比（Rupee），安那與皮司（Pice，以上三者均為印、巴貨幣單位）却沒有什麼概念。慢

慢地，他了解到他在學校所學與他作為一個印度人實在甚少相關。這是一套設計精巧的教化手段，要使人相信西方那一套價值觀、相信資本主義體系發達國家那一套才是“天然的”，而世界的其他部份是“原始的”，因而也是落後的。這是一種括號推理法：把印度文明之精義所在及使其能生存幾千年的因素就巧妙地用放在括號中，使其從這一代印度人的腦海裏消逝。

底里普是學經濟的，他聽過無數關於新古典派經濟理論的課，學習關於企業經營及其獲利行為。他曾為他的尊師寫過關於效用與價值的論文，曾熱衷於學習優選技巧、捷徑定理等。他曾抱怨計算機設備不夠，使得輸入、輸出分析法不能發揮應有的效力。他受的是通才教育，原是為今日印度之需要而設。他仍清晰地記得有次考試的一個題目是關於受虐狂之效用函數。另個題目則問上述問題與印度農人之理性的關係。甘地被認為不切實際，「他不是曾經反對過機械化嗎？顯然他對經濟理論是無知的」。他的不抵抗主義（Satyagraha 即為真理而奮鬥）早已被人忘得一乾兩淨。在不抵抗主義中，甘地從沒有捨棄印度的理想價值，那是交織於不佔有、無慾這些觀念的。然而，底里普所學的經濟理論却是集中於生產貨品用來滿足人們的慾望，或創造慾望，聯結慾望，誘導慾望等等無窮無盡。這樣的理論與甘地所述的印度“不佔有，無慾望”價值觀是多麼不同。活在一個困難重重的國家裡，底里普發現經濟理論只是像駝鳥一般的忽視現實的存在。

但是在自己的課外閱讀中，他發現琺安·羅賓遜（J. Robinson），保羅·巴倫（P. Baran）與喬治斯古·羅根（Georgescu-Roegen）（譯

註三)等的著作中似乎有些與現實相關的線索。他們給他很大的衝擊，使他想出國深造。對美國他雖不無懷疑，但他仍抱希望。他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已是倒足了胃口，曾浪費了寶貴的光陰去聽講比較效益國際分工論，二元經濟論等等，後來發現他所學的經濟理論與國家政策全不相干後，他就轉攻純經濟理論。這使他可稍為鬆口氣，因為至少不需假裝成是與政策相關聯。他寫了一篇極端抽象而高深的博士論文，是關於處在雷姆色、馮諾易曼模型(Ramsey-Von Neuman Model)社會的半黃金時代， n -因子， m -商品(包括公共服務) p -國家間之薩妙森(Samuelson)因子—價格平衡定理之內涵。這篇論文使他名利雙收，衣錦還鄉，回到印度，他在一所有名大學中獲得一終身教授的職位。但不久他却發現他的工作竟然是用數學來為“現狀”塗脂抹粉，這令他十分尷尬不安。畢竟，他還是太年輕了，不了解印度社會各階層的需要。

當他還在美國時，移居那裏的印度人社區之情形令他震慄。無法想像地，那些印度人墮入拜金主義的次文化中，活在虛幻的世界裡。如果有人告訴他們，印度薪水收入低時，他們反會認為用貨幣來測量價值是可笑的。他們像盡義務似地哼着本國電影歌曲以示“尊敬”自己的文化，而同時喝着啤酒，高談Sears百貨公司最近的一次大減價。他們對悲慘地生活於貧窮中的印度人所知甚少：「不是懶惰造成貧窮嗎？」出身於年收入5000盧比的印度最上階層，他們似乎真心地相信印度人的“平均”收入是每月500盧比。他們腦海中革新改良的方式，不外是取得行政或官僚體系中的高位，從而而有權有勢來進行“現代化”(西方式的)理想，而達到有效的改革。這些討論都給底里普帶來惡夢，他變得神經衰弱，變成一個“有很多朋友”的孤獨者，一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思想家”，一個雖有很好教學才能的人，但却無法與別人交流他的思想。這稀薄的“知識份子”空氣令他窒息，已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譯註四)

一九六七年印度比哈大飢荒把他從象牙塔中救出來。他和一些熱心的學生到災區去服務，所見的情景打開了他的眼睛。以前他從不知什麼是貧窮，從未為自己的下一餐發過愁。現在，他為人民群眾身無一物的悲慘生活，及他們禁慾式地接受自己命運的態度震驚。那些新德里沾沾自喜於自己的統計

資料的官員，對這些所知甚微。回到學校後，他在自己有空氣調節設備的辦公室裡寓居沉思了好幾個星期。一天早晨，他失踪了。

* * *

五年後，在一個偏遠的鄉村安哈拉的很偶然的機會上，我又遇見了底里普。與教授的模样已完全不同，我幾乎認不出他來；穿着土布衣，說着德魯古土語帶着濃厚的錫卡古蘭口音，他是完全脫胎換成爲了一個新人了。與“真人”相處，他現在比從前快樂多了。

他向我敘述在他想幫助村落人民之過程中所需克服的困難。那些人是漠不關心的，他們不信任他，他是從外面來的，不屬於當地，是從另一階級中來的，村人世代都做那個階級的僱僕人。他花了一年的時間才使自己失去“士紳”的地位，而就在這一年裏他獲得了再教育。鄉下人有自己的一套智慧與行事準則，他們很小心的將之保存下來。最初他很奇怪這裏竟有“知識”存在，後來就從他們那兒學了很多東西。

有段時間，他甚至想到以自殺了結自己一生。因感到自己在社會中沒有容身之處，他不屬於原來出身的資產階級，不屬於同學中那種移居美國的美籍印度人，也不屬於鄉間。在鄉間的努力失敗時，他遇到了一位隱士，聽了他的敘述之後，隱士提出一個像競賽一樣的建議：底里普須在村中住滿一年，在此一年中不要想教任何人任何東西，只是觀察，從觀察中學習。如果一年之後仍想自殺的話則隱士說可給他一種速效毒藥。這一年的經驗教給底里普的是他一生中最豐富的。人們從任何別人那裏學不到什麼東西，而只能從自己的親身經驗體會學習，真正的知識是學習與親身體驗之結合。從那以後底里普就再沒有情緒低落消沈過。

不再有人叫他“龐德博士”，而只是簡單的“底里普”，他對角逐“人民公僕”及令人窒息的學術界已不再感興趣。與在做教授時代相識並一度準備結婚的一位年輕女郎也不再連繫；他此時的生活方式已不再適合傳統的幸福婚姻。他如再要結婚，將會以僅認識現在的“他”的村女為對象，她們不會懂得他過去的“成就”，也就不會要求他回到千方百計才逃離的生活模式中去。

他為自己的缺乏野心而高興，雖然以他的聰明才智和學歷，他可以爬到教授所能達到的頂點；

。他現在只希望做為印度人民中的一個無名小卒。也許將來他還會再搞印度經濟，真正的農民印度經濟，繼承甘地、穆正集（R. Mukerjee）和斯瑞尼瓦斯（M. N. Srinivas）等之後。但他很小心謹慎地避免回到“學術界”。

印度村落結構的複雜性使他敬畏。村落保存着印度文化最美好的一面，五千年智慧的結晶。當然他是把它們理想化了一些，他希望它們代表着由貧窮與苦難中羽化而成的文化結晶。在過去二百年資本主義的暴烈摧殘下，它們失去了很多。它們先失去了經濟獨立，而從屬於一詭詐而無人性的“市場”。在他到過的即使是最最偏遠的村落也毫無疑問地被捲入了世界範圍的資本主義市場體系之中。其滲透是如此之深，使這些人不知不覺地被變成了巨大的經濟體系中的一個小齒輪。他們在付出了失去獨立的代價後，保存了他們的人文精神，他們的非觀念。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生存了下來，正證明了它們的基本價值。

以底里普看來，現在的首要任務是在提高這些佔印度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們之生活水準的過程中，保存此優良的傳統。不論在印度或是美國，人們都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但他對我說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只要那些造成人民貧窮的因素和制度（這是造成比哈大飢荒間接的但真正的原因）有所改變。對現在的底里普來說，矮化發展是由現存社會制度所維持並滋養的一個動態過程。這些制度一定要也必定會被改變，他希望暴力並不一定必須的。人民活在赤貧之中，對於什麼是可能達到的基本上並不知道，而住在新德里的官員則對人民的真正情況無知却滿足於看到村人的子女為他們父兄添購的“奢侈消費品”。到處都是無知，真正的無知與假裝的無知都有。

這最後一項事實最使底里普驚嚇，因為這簡直是瀆神的。印度文化與哲學從來都是把認識真理放在崇高的地位。波羅門教的上帝是現實化的知識。印度宗教所說的解脫（Moksha）即是指從無知中解救出來。他發現不論走到何處，雖然沒人知道他的學位，但他的知識使他得到別人的敬重，所以如說群眾是無知的或是無理性的實在可笑；文盲與無思想能力是兩碼子事。兩百年來的改變對村人都是不利的，這些經驗使得他們小心謹慎及多疑。他們的態度更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只要你能以平等的態

度待人，是可以和他們交談的。只要改變確實是一種進步，而且是行得通的，他們是會贊同的。這些人其實很精靈：他們知道如要改革就一定要大幅度的變革；他們的直覺警告他們，如果僅是做些許的點滴改革，則其結果總是有壞處的。

傳統的印度社會在既存的結構之下，少數人改進他們的社會地位是可能的，這是經過波羅門化過程而達到的。一個屬於較低層種姓的人，改變其生活習慣與意識型態，而向較高層種姓的人看齊，這是人們可以接受的文化變革，另一方面經過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統治，資本主義制度已將“西化”強行推銷到印度，為印度社會，文化在科技、制度、思想及價值觀上帶來了另一種變革。這兩種變革的交互關係，還有其他社會動力，使我們看清了今日印度的真況，並且也限定了印度未來能走的窄路。當今首要之務是讓群眾掌握到這些觀念並充分了解其涵意。反而，底里普害怕“精英份子”（他自己曾是其中之一）已被教育到無法回頭了。對他們來說，這些觀念最好的評語可能是：“聽起來很浪漫”，而對大多數來說可能認為這簡直是要顛覆政府。但這些觀念需要傳播開來，不論在鄉間或城市，都必須喚起社會意識。

就是在這個意義下，底里普看到了像他自己這樣人的價值。他覺得“薩法達亞”（Sarvodaya）這個團體的領袖溫諾·巴佛（Vinoba Bhave）所提倡的“捐地”運動（富人自動將土地轉送給窮人）是正確的，雖然巴佛是一個理想主義唯心論者，沒有致力於後繼措施，而且此運動在某些方面太“精英主義”了。但巴佛是了解印度社會的，因而對如何解決問題的直覺基本上是正確的。底里普建議在“捐地運動”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組織教育，來尋求以印度自己的方法來解決貧窮問題。印度的傳統觀念認為社會上受教育愈高愈幸運，而愈是在高位的人所負的社會責任愈大，這點現在是很有用的。兩千年前的卡提利阿在其“財政學”一書中已經主張國王及幸運的武士們該對社會的一般福利負責。甘地也提出同樣的呼籲。西方社會認為社會福利函數是個不可定數的看法就印度傳統來看是完全沒有意義的。村落人們有權要求每一個人遵守自己的社會義務。如果有某群人拒絕履行其社會義務，則可能發生暴亂。Mahahavata（印度史詩）的教導：鬭爭是生命的一部份。

對於印度的“革命運動”，他不喜歡的是，他們強加於人的快速步調，以及他們基本上所接受的一些西方價值觀，如迷信經濟成長及這個或那個教條。但革命者的真誠是不容置疑的，他們並不阻礙社會進步。印度社會最危險的份子倒是那些自由主義改良派，他們口中掛着一些微不足道但響亮的點滴改良口號，才是社會進步的真正障礙。他們能分裂群眾，破壞團結。他們訴諸群眾中的自私者，以個人奮鬥爬梯子自求解放的方式來利誘群眾，而不將這樣做對整個社會的負面影響指出。他們是既存體系的反撲力量的基礎。

他知道他現在的觀點給從前的同事聽來一定覺得很奇怪，因為他們的思想模式限在一僵硬的框框裡，如要打破此框框，則需要有人像他自己一樣有幸找到這種再教育的機會。但他們也有項長處就是受過科學訓練。只要真心關懷，他們也可以用那種邏輯推理來檢驗他的觀點，而找不出漏洞。他只是反對盲目的接受成見，而不是反對科學。像他這樣能夠了解不同階層的人是能以自己的覺悟行事，本身可不附屬於任何階層。奇怪的是印度雖為這樣的人提供了哲學基礎，却反而缺少真正這樣實踐的人。這樣一群人正是執行底里普的建議的理想人選。他們甚至可指出促進文化改良的正確方向。當然他們需要像他一樣到鄉村去生活，鄉村才是印度的血肉，印度的生命力所在。

底里普把自己看成一個流浪者，注定要不斷的旅行；一個促成變動的催化劑，意識型態間的橋樑，漲潮時的一個波浪。像經濟成長率這樣的東西，

對他這個受過訓練的經濟學家來說，是個不成問題的假問題，部份是由於對世界無知而引起的問題。是引誘不疑有它的資產階級上鉤的魚餌。由於他們自己的哲學，被罰參與這幕悲劇的演出。這是一幕悲劇，因為他們為自己帶上眼罩以至於什麼也看不見。他們不敢提出問題，因為由直覺而得出的答案總是那麼使人害怕。印度的資產階級——也許別地的也是一樣，是一個生錯時代的人物，他們的歷史使命早已完成，但他們本身却仍然存在著，他們是沒有“前途”的。他們是即將變成蛋餅的雞蛋，歷史的發展將把他們拋在後面。

底里普以一絲苦笑結束了他的談話，他的結論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必須付出代價，他們必須放棄已習慣的一切而僅有的選擇是何時以何種方式付出代價。就他看來，這仍有很大的伸縮性，並有一大部份要視他們之中改良主義份子成功的程度而定。這裏是一個低開發國家的發育不良的經濟學家所要面臨的兩難之局：他願現在就一次付出代價而為一個在今生今世也不一定見成果的目標而奮鬥呢？（即使果實在今生得以成熟，其結果也可能是一更苦的果子），還是在明知道在最近的將來改變的機會很小，並且也知道現存體制的強大反彈力之情形下與他這一行的其他同僚一樣過着一個正常、平凡而無聊的一生呢？他必須做出抉擇。正因為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幹什麼所以不能以棄權不選擇來做為選擇的手段。低開發國家中的發育不良的經濟學家所要面對的是魔鬼與無邊的藍色深海。我的朋友底里普正在那深海中奮力地游着。

譯註一：原文載每月評論 Vol 25 No 8, 1974年1月號，維諾·維亞蘇魯是在美國一所著名大學主修經濟的印度留學生。

譯註二：其實該說譯者乃是故意的而非偶然的，在他眾多朋友中他看到不少台灣版的底里普·龐德。

譯註三：瓊安·羅賓遜 (Joan Robinson) 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退休教授。新李嘉圖、後凱因斯學派大將，重要著作為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並與 John Eatwell 合作一本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

為大一經濟學教本，在與新興古典學派之 Samulson 爭論中扮重要之角色。保羅·巴倫 (Paul Baran) 重要著作為 *Political Economics of Growth* 及與保羅·史維茲 (Paul Sweezy) 合作之 *Monopoly Capital*。

喬治斯古·羅根 (Nicholas Georgescu-Roogen) Vanderbilt 大學經濟學教授，重要著作為 *Analytical Economics* 及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譯註四：留美華人比老印有高明乎？

清末台灣的一個考察

——并試論如何正確地認識

日人治台史(一)



戴國輝 原作
林真理 改譯

本文原文為日文，刊於「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三卷，勁草書房，一九七〇年。譯者林真理按語說：「它曾經給日本學界以及在日留學生界帶來過不小的衝擊。論文雖成文於一九六七年，它具有的創見，在當前的台灣仍有深遠的意義。」本文雖已有譯文，但譯得不理想，流傳亦不廣，因而重新改譯，並得戴先生贊同，加上若干新材料。

前兩期刊出「前言」，「台灣開發小史」及「洋務運動在台的背景」。「前言」深入討論了如何認識日人治台史，反應了戴先生史識與史觀。「台灣開發小史」及「洋務運動在台的背景」則以社會經濟史學的觀點與方法來整理洋務運動前的台灣開發史及經濟、社會背景，襯托出日後洋務運動所以能在台灣成功而在大陸失敗的基本原因。

第三期初期洋務運動的實況，並分析洋務運動在台灣的特殊性。本期介紹正式展開的洋務運動——劉銘傳的新政，重點分析新政中的財政措施以及促進民間生產事業發展的政策。這兩者均為台灣資本主義化奠定了基礎，影響深遠，不僅為日本日後在台推動現代化鋪路，也影響到日據時代台灣抗日運動的一些特色。最後結論不僅綜述這些特色與影響，並回復到一般殖民地歷史研究的史觀與立場的討論。

洋務運動的出現，乃是第三世界國家受到歐、美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一個自保反應。在當今帝國主義勢力依舊（雖然方式有所變化），第三世界國家仍然面臨着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造的艱鉅課題。以此觀之，戴先生這篇力作的價值豈只是回顧歷史而已！

——編者識

劉銘傳係安徽合肥人，他經歷過曾國藩的訓練，一八六二年被李鴻章擢升為淮軍的「管帶」。他在清廷「扼殺」太平天國的戰事中屢建軍功。由上列經歷，我們可窺知，劉確屬洋務派主流的骨幹人物。

銘傳與台灣事務發生關係則在中法戰爭期，他被遣派為「巡撫銜督辦台灣軍務」開始。一八八四年春天，當法國海軍軍艦為了配合該國對印支半島發動軍事行動之需要，開始窺伺台灣時。清廷軍機大臣透過北洋大臣李鴻章，拔擢下野正在養病的前直隸總督劉銘傳為「巡撫銜督辦台灣軍務」。

劉接受任命時，當然會向李鴻章商討請示。他在其赴台就任前夕（一八八四年七月十六日）曾至天津拜訪李，接受不少指示以及鴻章所推薦的幹部和各種新式武器（註69）。

直至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六月四日，辭卸台灣巡撫一職，劉銘傳在台灣任職，約滿七年。

最初兩年，劉專心致力於防衛法軍侵襲台灣以及處理有關台灣防務的善後，他推行所謂新政却在其後的五年任內。

一般而言，新政所指者為：「辦防」、「練兵」、「清賦」、「撫番」等四大要務。本稿因限於篇幅，筆者只就「清賦」及「振興基礎事業與生產事業」等項目，擇要探討和介紹。

如前所述，晚清期台灣並非所謂「化外之地」。事實是，被腐敗昏庸的清廷有關人員所忽視，反而受東來的諸列強勢力所垂涎的「寶島」。雖然，當年尚存在着所謂的出草或「蕃害」（其具體內容，却是因漢族移台人士不斷向高山諸族既佔土地侵透而惹起的武力抵抗行為），以及亞熱帶、熱帶

所謂「出草」或「蕃害」的具體內容，却是漢族移台人士不斷向高山諸族侵透而惹起的武力抵抗行為。

地區當年難於逃免的「瘴癘」。惟無論如何，那些以瘧疾（Malaria）為中心的「瘴癘」並非台灣獨特所具有的屬性，而是當年的世界史階段，亞熱帶和熱帶所住人類必有的共同遭遇。

雖然，台灣面臨外國侵略競爭的挑戰來得較晚，此時期最為垂涎台灣者都是日本和法國。這兩國，皆不是清朝期洋務運動所依靠的主要國家，尤其日本係，正欲趕搭“資本主義巴士車”的「後發資本主義國家」之一個，它還只是，剛出生不久的資本主義之犢而已。

不過，侵略的鋒芒所向直逼台澎近海後慢慢又引發新的民族危機。洋務派為確保東南諸省（斯時稱南洋）的安全及洋務運動的「成果」，乃被逼在台灣亦嘗試了「新政」。

新政後來雖然遭到了挫折，但它仍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它特別顯現在，始於一八九八年（頭三年日本當局奔命於對付台灣民主國的抗日軍事運動，經濟政策無從做起）的日據下經濟層面的「接木」運作上。當日本有關當局力圖把台灣經濟編入其日本經濟圈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本土社會經濟基礎上找出來的接木用的「台木」，很「幸運」的並不是派不上用場的「竹桿」，反而確確實實是真木頭的「台木」。

這個「台木」終於發揮了它的功能，給日據下台灣經濟，能展開出「殖民地形態的經濟成長」提供了前提條件。

劉銘傳當然沒有意料到，他在台灣所嘗試的新政，將給日本殖民當局，提供了「台木」，方便它在台灣「移花接木」開展了台灣式殖民地形態的經濟成長且獲得了「成果」。

研討劉在台的新政，我們首先得從台灣建省及行政組織的重整和擴充來開始。

① 台灣的建省及行政組織的重整及擴充

自從牡丹社事件的善後處理過程中，沈葆楨建議福建巡撫移駐台灣以來，台灣的建省即不斷地在清朝官廷醞釀。中法戰爭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升高了台灣近海的緊張情勢，這個當然影響了清朝對台灣的注視。另外已有駐台經驗的洋務派人士，誠如沈葆楨、黎兆棠、劉璣等人根據在台的直接見聞反映回大陸等等，似亦促進了統治階層形成在台

建省的「共識」。

中法戰爭之際，法軍侵犯台灣北部乃是台灣建省的直接契機。爲了應付危急有加之台灣情勢，除了促進台灣建省之建議而外，有關台灣防務善後處理之積極意見紛紛出現，接踵而來（註71）

其中，促使清廷決定台灣建省最有力的意見，乃是洋務派的大將左宗棠的「遵旨籌議海防事宜」奏摺，以及與之相呼應的軍機大臣醇親王奕譞同北洋大臣李鴻章等重臣聯銜覆奏中所表示的：「臣等查台灣爲南洋樞要，延袤千餘里，民物繁富，通商以後，今昔情形迥然不同，宜有大員駐紮控制」建議。

清廷接到上述奏摺類後，於九月初五日（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二日，頒佈德宗之諭旨，略謂：「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予莊誠皇太后〕懿旨：醇親王奕譞等遵籌海防善後事宜摺內奏稱，『台灣要區，宜有大員駐紮』等語。台灣爲南洋門戶，關係緊要，自應因時變通、以資控制，着將福建巡撫改爲台灣巡撫，常川駐紮，（中略）所有一切改設事宜，該督詳細籌議，奏明辦理。」（註71），台灣建省之議遂有最後的決定。

在有關建省的奏摺中，引起吾人留意者乃是左宗棠對台灣經濟的認識，既相當地具體且有深度。

左謂「台灣雖係島嶼，綿互亦一千餘里。舊制設官之地，祇海濱三分之一，每年物產關稅，較之廣西、貴州等省，有盈無絀。尙撫蕃之政，果能切實推行，自然之利，不爲因循廢棄，居然海外一大都會也。（中略）至該地產米甚富，內地本屬相需，若協濟餉項，各省尙通有無，亦萬無不爲籌解之理……。」（註72）

台灣建省雖已由清廷做下最後決定，但台灣島內的行政組織一直未具其規模，雖一度由沈葆楨略加整編但距整合尙有一段距離。考其原因：第一爲清廷長期輕視台灣，而因不曾眞下過工夫整編行政組織。第二則由大陸過海移民日衆，移民社會經濟的進展過速，昏庸的官僚們無法跟進。第三，有些地區因漢族移民群與先住台灣人群（高山有關諸族）的抗爭狀態時時在流動不定中，不易定界亦是其因也。

因而，劉銘傳的到任第一舉，則對行政組織作如下表所列的整編。

台灣的行政區劃與組織（1885~1894年）

台灣府（知府）	台北府（知府）
台彰雲苗埔 灣化林栗里 縣縣縣縣社 （廳） 知知知知 縣縣縣縣通 （判）	淡新宜基南 水竹蘭隆雅 縣縣縣廳廳 （廳） 知知知同通 縣縣縣縣判 （判）
台南府（知府）	台東直隸州（知州）
安鳳嘉恒澎 平山義春湖 縣縣縣縣廳 （廳） 知知知知通 縣縣縣縣判 （判）	花卑 蓮南 港廳廳

出處：周憲文著『清代台灣經濟史』（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台灣研究叢刊，第45種）5~6頁。但台東直隸州則根據伊能嘉矩編『台灣巡撫、劉銘傳』（日文本）17頁作成。不過花蓮港、卑南兩廳則在企圖中，面遭「割台」沒有來得及實施。

衆人皆知，日本殖民當局治台初期的行政工作亦是憑藉上述行政區劃而有所推行的。

② 清賦事業

劉銘傳的新政畢竟是就洋務運動的一環而實施的。因而，當然是定防務爲最重要。他一方面推行「辦防」、「練兵」同時亦進行行政組織的整頓。「辦防」、「練兵」必需確保並籌措財源，乃實施清賦事業，進而又振興生產事業及創設與之相關的社會基礎事業。其中與財政具有最直接關係者，乃是確保賦稅的最中心項目「田賦」也就是「土地稅」。

誠如銘傳在「量田清賦申明賞罰摺」中申明「期於三、五年後，以台地自有之財，供台地經常之用，庶可自成一省永保巖疆（中略）今田賦稅，率

士輸將，乃司農歲入之常經，列代保邦之大法，舍而不計，徒乞鄰疆，雖舌敝唇焦，緩急終不可恃」（註73），清賦之目的顯然是求財政在台的獨立，以能就地取財源以養台灣防務為最終目標。

實施清賦之前，劉所預估的台灣財政的收支却可藉下列記述來掌握其概況。「查台灣田產，甲於東南，一年兩熟。淡水一縣，每年額徵錢糧銀僅七百八十餘兩，官莊穀纔九千餘石。宜蘭一縣，錢穀無徵。其餘各縣，糧稅亦寡。通計全台灣鹽、茶、百貨稅釐，歲入銀一百零數萬兩。將來整頓各項稅釐，剔除中飽，歲可百二十萬。核以台灣三十五營之餉，歲需百二十萬，乃適相資。惟輪船經費，一切雜支，並須添設製造局，歲需銀約百五十萬，所虧實多，若能將各縣賦稅一律清查，以台灣之入供台灣之需，尚可有盈無絀」（註74）由上可知，歲入約為一百零數萬兩，整頓稅收和剔除中飽之後，歲入可望增為一二〇萬兩，正相當於台灣、澎湖的駐軍三十五營之費用。然而因船艦及製造局等之增設費用約另需一五〇萬兩，故僅靠上述收入顯然是不足的。劉銘傳認為若能將各縣賦稅一律「清查」，則不但能充分供應，而且還有盈餘。

事實上，當時的台灣被處於「化外之地」，所以清廷對台灣的支配常感「鞭長莫及」，必然地徵稅管道經常阻塞或不能發揮其功能。更有甚者，行政體系的僵化及貪污官吏的「中飽」與無能，益使稅收惡化。本來，像台灣般的新開拓地，開墾的情況常因時地而異，何況在長達二〇〇年的清朝的統治下，有關土地所有權的各種情況當然變化迅速，然而在此期間迄未實施全面清查過。其結果田賦負擔輕重不一，難免發生無土地農民（佃戶）之田賦負擔的不平等及大小租戶跋扈等情形。正如劉氏嘆云：「臣渡台以來，細訪民間賦稅，較之內地，未見減輕，不勝驚愕久之。察所由來，皆係紳民包攬。」（註75）但另一方面，據劉氏所云：「究之正供糧課，毫無續報升科。如台北、淡水，田園三百餘里，僅徵糧一萬三千餘石，私升隱匿，不可勝窮。」（註76）亦可印證清朝綱紀的紊亂反而提供了有力小租戶抬頭及民富形成的政治經濟條件。光緒十二年秋正式開始的清賦事業，至光緒十五年未大致完成。結果田賦總額多達六七萬四四六八兩，較過去的十八萬三三六六兩增加四九萬一五〇二兩，增加將近三倍。（註77）

我們所以說是大致完成，是據於其間頗多曲折，並且為推動清賦事業而設置的清賦局實際上直至劉氏離職後的光緒十八年五月才被解散。（註78）

民衆（尤其是南部的）對「清賦」為中心的劉銘傳新政的反應，曾留下頗有趣的資料，茲略述如下：

日本駐福州領事的「台灣視察記」中曾云：「目前（指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台南人心頗抱不平，……不滿清廷官吏之措施，動輒抱着一舉謀反之心，的確為不能掩飾之事實。近來民情之所以如此，全由政府之苛稅所致。劉銘傳駐台以來，一味致力於輸入西洋文明事物，不察台胞心情之向背，斷然施行土地改良（制），因此需額甚殷，其結果乃不得不由地租（田賦）雜稅分擔，……原來台灣的地租（田賦）一向依照戶部之規定徵收，從前歸福建省管轄時，稅額甚少，幾乎有名無實。但自從獨立為一省，即徵課意料外之重稅，且各地普設厘金局，因此其稅法亦甚為苛酷。」（註79）

該領事所透露的台南附近政情不安，蓋(1)由於漢人對台南附近開拓甚早，新政當局對大租戶在開墾上扮演的角色異於北部（概言之，北部的大租戶只是不勞而獲地收取因轉讓開墾權而得的「大租」，而南部的大租戶多為實際從事開墾者）之情況認識不足，而企圖一律清查所致。(2)清賦所帶來的財政收入之投資主要集中於北部（如修築鐵路等），南部對劉氏的新政並不熟悉。(3)台南附近為舊墾地，故傳統社會勢力頗強，而且是與劉銘傳不和而下野的前台灣道劉璈之地盤。（註80）(4)以往之稅課有名無實，清賦事業對過去透過勾結地方官吏而逃稅的地主們無情打擊，使他們無法或少能施展故技等等皆累積成反對新政的原因。除上述曲折之外，清賦事業又有以下之缺點：「至於其施設之目的固然在於整頓地制之紊亂，要言之，由於急於增收田賦，故與租稅無關之地則置之不理；根本不加丈量，丈量方法亦不無疏漏杜撰之嫌。」（註81）「當局不得其人，弊害叢生，尤其時丈量方法不完備，加以急功近利，調查流於粗陋，對業主之查定欠缺精密，誤給丈單，發生糾紛時，受害者亦無法伸其冤。丈量標準，因地區而不同，田園等級失其相等，魚鱗冊與實際亦往往不符。」（註82）甚至到後來與日據台灣總督府所進行的土地調查工作一比，更顯示清賦事業的不徹底與杜撰。儘管

如此，誠如矢內原忠雄博士適中的評價所云「劉銘傳的清賦事業大致具有資本主義開發之先驅的意義。」（註83）為清賦事業的一環的保甲編制和人口調查（註84）所具有的意義意外地常被忽視，當日本資本主義佔據台灣後，即充分利用了這包括

「劉銘傳與清賦事業大致具有資本主義開發之先驅的意義。」

人口調查和保甲編制的新政清賦事業。出乎當事人之意料外，這些事業和下述的基礎事業之振興均轉變成日本帝國主義治台的方便，給扮演「台木」的角色奠定了基礎。

③ 基礎事業與生產事業之振興

如前所述，當時的台灣經濟已頗具規模。劉銘傳所計劃透過資本主義方式的開發以促成富國強兵，藉以對抗列強覬覦台、澎的事業，概如矢內原博士所指出的，有「修築基隆、新竹間的鐵路、購買輪船並航行於沿岸、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柴棍（西貢）、菲律賓等地、郵政制度、樟腦專賣、理蕃事業」等（註85）。新政實際上不只這些，更廣泛地進行築港、修建道路、擴充電信設施、改革貨幣制度、改良教育設施（如創設西學堂等將歐洲文明引進台灣）、設立官醫局（即聘請西醫韓先<譯註：Armauer Gerhard Henrik>，一八四一～一九一九，挪威醫生，一八七九年發見癩菌，著有「癩菌之病理學」、「癩病研究」等書。>將西洋醫學引進台灣、架設電燈、獎勵植茶及養蠶、引進棉花及呂宋種煙草，並為了在大嵙嵌溪上游（則今日石門水庫水源地）開鑿灌溉溝渠（為後來的桃園大圳的原型）而招聘外籍工程師測量等措施。（註86）

限於篇幅，以上各項措施不能詳述。茲另加略述此一期間民間資本之大略動向。

原來台灣的「殷戶」大多是來自福建，其「家在彼而店在此」。（註87）這些商人大多鑽政治官場之間隙，利用同鄉關係往來於東南亞地區。劉銘傳即利用上述關係，希望振興貿易，派員到南洋各地考察商務（註88），進而對南洋的「閩商」

（福建出身的商人）積極展開商務合作的勸誘工作。（註89）

另一方面，設立商務局，向民間籌募股金，購買一艘十八萬兩的快速輪船（時速十五～六哩）駕時號和斯美號（註90）。「最初航行於上海、香港等地，其後遠至新嘉坡、柴棍、呂宋等地。」（註91）上述民股的來源雖然不詳，但南洋閩商的反應確來的相當積極。尤其是為修築鐵路而發行一〇〇萬兩的鐵路股票，民間積極地應募認股（後來因工程進展不順及當局處理不當，引起民間的反感，不再響應追加部份的投資，故自福建導入一〇四萬兩來填補，而收回官辦（註92））。對於製糖業亦採相當積極之措施，例如一八九〇年在淡水利用西式機器精製白糖（註93），在台南地區則引進鐵製甘蔗壓榨機等（註94）先進嘗試。對於經營不振的基隆煤礦，民間資本亦投資六萬兩而試行官商合辦（註95）。尤值得注意的是，一八八八年民營煤礦產量超過官營，年產達二萬三〇〇〇噸以上（官營為一七〇〇噸）（註96）。同時，民間資本亦嘗試開設採用西式機器的「煤磚」製造廠（註97）。

以上可見劉銘傳的新政所波及和連動當時民間資本動向之概況。以施政積極名聞歐洲的劉銘傳（註98），亦不免因其最有力的支持者醇親王奕譞之去世、又因不同派系關係而與布政使邵友濂（劉氏的繼任者）不和，以及部下不得其人等施政上的僵局，而藉口離職養病，終於一八九一年六月離台野。繼任的邵友濂和劉氏的政見相異，亦曾有過拉和抗爭，邵氏根本無有擴大劉氏事業自必論，毋寧是著意於中止或廢棄劉氏之事業以洩私怨為急（註99）。

結 論

台灣前、後兩期的洋務運動中，軍備投資費用甚巨（僅在後期，其總額即達二一〇萬七五〇〇餘兩（註100），其中即使扣除修築鐵路的一〇〇萬兩，仍約一一〇萬兩）。此一情況與中國大陸頗相似，充其量只不過是成為歐美舊式武器的良好市場罷了，在清末腐敗體制下，就連智將劉銘傳的作為亦無法奏功。

與日本明治政府的歷史性格相去甚遠的洋務派，在台灣政治上至少留有下列的長處，除了討伐少

數民族——所謂理蕃事業的軍事面之外，頗有異於中國大陸的情況。洋務本身較少被利用在台灣壓制內部反體制勢力。再者，具有助長社會資本的投資及間接地不摧毀民族資本幼芽之一面，將資本主義式發展的新風氣引進台灣，此乃其貢獻。正因為當台灣經濟內部傾向於資本主義生產及其生產力亦相應發展時引進上述新風氣，才能在清、日兩政府簽訂「割讓」條約後，對建立亞洲最早的共和國——「台灣民主國」——以抵抗日本的入侵，乃有台灣本土性的社會基礎在。當土豪紳、「家在彼而店在此」的殷戶及腐敗政權清朝官吏等臨陣逃走或避難，以及腐敗的正規軍潰退後，漢族移民集團自組義勇軍，所以能對日軍展開激烈的游擊性抵抗，全賴具有小農經營發展的小租戶及現耕佃戶的勢力，值得我們的留意。雖尚未成熟，但在台灣的水田地區已可見到「寄生地主制」的發展，此一現象與同時代的朝鮮不同——「在朝鮮，具有近代意義的土地所有權並不明顯，土地為國家或共同體所有，介其間，存在着豪族及官僚等的私有。」（註101）因有如此的社會基礎及「寄生地主制」的發展，才能在後日阻擋了日本人地主在台灣水田地帶生根落實。

台灣不曾有類似朝鮮的「東洋拓殖株式會社」般的地主公司的成立。台灣的既成社會動力亦沒有讓日本人地主藉總督府權力，採取露骨的沒收及吞併方式來發展其在台灣的水田地主制度，好似朝鮮農村地帶的日本人地主制度。其具體的阻力乃是來自於持續二十年的台民間武力抵抗，固不待言（當時抗日運動，以沒收土地所有權較為不明確的林野及為了擴大糖廠的蔗糖栽培地而強制收買土地所引起的農民及小地主之抵抗為主體）。土豪紳可說經土地調查而確保其所有權，並被編入日本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結構中。還有，那些大、中地主所擁有

漢族移民集團自組義勇軍之所以能對日軍單獨地展開激烈的抵抗，全賴具有小農經營發展的小租戶及現耕佃戶的勢力。

的資金亦被巧妙地導入製糖資本體系中。（最著名的例子乃是由後藤新平之說服林維源（後來創立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的林本源家的中心人物，台灣最

大、中地主的土地被編入日本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結構中，其所擁有的資金亦被巧妙地導入製糖資本體系中。故大、中地主階層對武裝抗日運動始終站在旁觀者的立場。當日本資本主義體系形成時，台灣中產階級的發展即遭受拘束。敏感的大、中地主階層子弟遂展開中產階級的民族運動。

大的資本家，亦為地主）回台（註102）和將林家資金携回台灣（為了避「割讓」之難而儲存上海香上銀行的林家存款據說達二二二〇〇萬圓之巨（註103）。然而當時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的資本却不過是一〇〇萬圓）以及陳中和家的創設新興製糖株式會社。（註104）正因為如此，故大、中地主階層對武裝抗日運動始終站在傍觀者的立場（註105）。一九一〇年代以降，在徹底的武力彈壓之下，方便於沒收的土地均已被沒收，隨着日本資本主義之發展與俱同來的絕對性要求，台灣的甘蔗栽培逐漸發展，與之有連鎖關係的稻作亦逐漸提昇發展。大、中地主階層更在台灣總督府權力的庇護下，對佃戶剝削高額地租而確保了「殖民經濟」體制下的「殘渣」餘祿。

當台灣的日本資本主義體制形成時（大約在一九一〇年以降），上述台灣中產階級的發展亦遭受拘束。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年）至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的「台灣府令」禁止台灣人單獨設立公司即為典型之例（註106）。不僅在經濟方面，在政治、社會（包括教育）方面差別待遇亦漸顯著。大、中地主階層的子弟（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者）對之敏感地反應，遂展開台灣中產階級的民族運動（成立台灣文化協會）。雖然如此，林獻堂一派所領導的台灣中產階級的抗日運動，不過是在溫和的議會設置運動的範圍內求其進展。中日戰爭爆發後，總督府的壓制變本加厲，林獻堂等所領導的溫和抗日議會設置文化運動遂後退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單純地方自治運動，最後甚至有一部份人還加入了皇民化運動。

即使在一九二〇年代國際性無產階級運動昂揚時期，上述的台灣中產階級的民族運動，亦未像朝

鮮人一般激進地轉向共產主義。這並非如山邊健太郎所謂由於林獻堂一派不像朝鮮民族主義者終於出了紕漏（註107），而是因台灣中產階級的物質社會基礎大於朝鮮，以致不易出現「亂子」，使階級、階層分離析出廣泛的無產階級才是史實。此即矢內原所指出：「台灣異於朝鮮，台灣人並未全部成爲生產者，由於不論土地集中狀況或企業方面，台灣人的大、中地主和資本家之勢力亦較強，故其民族運動不有完全無產階級運動化。」（註108）上述狀況若不對清末台灣經濟——劉銘傳的清賦事業下的土地所有權的確定及寄生地主制的展開，以及商品經濟在台灣農村具有相當程度之滲透——發展階段作下科學的評估及正確的認識，則是無法理解且解釋的。

即使在世界史的發展上，正由於當時台灣經濟已存在殖民主義者所不能完全扼殺的深厚的地主階層和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生機，因此其後日本資本主義在經濟面的接木運作遂得實現。雖有重新分配國民所得等上面有了明顯的民族及階級的差別待遇，惟「殖民地的經濟發展」的具體化亦已藉而出現於台灣。

若無上述之認識，則無法全面瞭解「日本之台灣統治史」，同時，若僅站在統治者史觀，則科學的台灣史之構想亦即無法建立。

以上，非常粗略地觀察了清末台灣經濟之概況。近年在日本有關台灣之研究——尤其是現狀分析研究——並未充分整理分析殖民統治留下的「遺產」問題，而有過於輕率地強調日本過去對台灣的殖民地體制却是支持台灣日後經濟發展的台柱，甚至認其爲支撐台灣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來看待。

所有受過殖民統治的地域或國家，在某些意義

上，均具備正負兩面的殖民地遺產，姑且不論負面遺產，即使被認爲是經濟發展的正面遺產，其存在或形成過程並非與殖民統治前之歷史無關。何況從殖民統治解放後，守着那些遺產，並將其活用轉爲本身發展經濟的手段者，畢竟是統治者才是現實。保持「遺產」者若是凡庸的一群人，又從何談起解放後的「本位性」經濟成長了。

吾人的確應在歷史脈搏的分析上，把握殖民統治前歷史的發展階段並加於科學的定位，在其現況分析上，把握住守着「遺產」並將其手段化的主體（則曾經被統治的人民群體）的性格，進而擴大視野至負面「遺產」的整理與定位。如此對殖民地遺產的全面評價方才有效。

就此意義而言，今後對清末台灣的研究，必須包括土地制度及地主制等個別問題在內的細密研究才夠涵蓋。

我們若意圖分析清末以來台灣本位性的發展（不僅是經濟方面，包含文化等全層面的發展），我們應該對下列各項留意並加分析才能全面奏效。好似如何因日本的統治，台灣社會的本位性發展終於被扭曲、變貌，而不得不屈折地發展。台灣民眾又如何地因應興起抵抗日本統治，包括「台灣民主國」之成立與其防衛戰爭，以及最初二十年的武裝抗日運動。而由於同胞之因應及抵抗，日本帝國又如何地制定、修正、變更或推行其政策。對於這些問題，唯有不把抗日遊擊義士單純地視爲「土匪」作亂，力克偏見及成見，運作科學方法全面地加以探討，始能有所成就，將白不待言。

在本稿筆者多少提出了未成熟一些問題，若能拋磚引玉且能被讀者諸賢接受、認爲稍具「突破」，則不勝欣喜。

註 譯：

- 69：參照林熊祥主編『文獻專刊』第四卷第一、二期劉銘傳特輯，胥端甫編「劉銘傳年譜」。
- 70：同上（註69）『文獻季刊』，李騰獄著「建省始末」一八頁。
- 71：『清德宗實錄選輯』（台灣文獻叢刊第一九三種）第二冊，二〇七頁。
- 72：雖查閱『左文襄公奏稿』六十四卷（光緒十

六年庚寅仲春月開離，日本、東洋文庫藏本），却不見「遵旨籌議海防事宜」條，故暫借前引『文獻專刊』，「建省始末」一文一八頁的記載。

73：『劉壯肅公奏議』（台灣文獻叢刊第二七種）第三冊，「量田清賦申明賞罰摺」，三〇三～三〇四頁。

74：同上，第一冊，「條陳台澎善後事宜摺」條，一四八～一四九頁。

75：同註七三。

- 76：同上。
- 77：參照同上三二三頁所載之「台灣清賦全功告成彙請獎敘員紳摺」。
- 78：參照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清賦一斑』，二八一頁。
- 79：前引『台灣誌』一七七～一七八頁。
- 80：參照王國璠「劉銘傳」（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印行，『台灣文獻』第一〇～一二期合刊），〈劉墩之獄〉條，二七一～二八一頁。
- 81：前引『清賦一斑』九頁。
- 82：伊能嘉矩編，『台灣巡撫·劉銘傳』（日文本）七七頁。
- 83：矢內原忠雄著『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日文本）（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第四版本）二〇頁。
- 84：參照，前引『清賦一斑』四四～五八頁。
- 85：前引『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二〇頁。
- 86：詳閱前引『台灣巡撫·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第一～三冊及『台灣誌』等。
- 87：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台灣文獻叢刊第八七種），「論郊行商賈」條，八六頁。徐為道光末年的「分巡台灣兵備道」。
- 88：參照前引『台灣文化誌』下卷五〇頁。
- 89：參照前引『劉壯肅公奏議』第三冊，「擬修鐵路創辦商務摺」條，二六八頁。
- 90：參照同上書，「變售舊輪船以資新購摺」條，二五五頁。
- 91：前引『台灣巡撫·劉銘傳』，三四～三五頁。
- 92：同上，三一～三二頁。
- 93：參照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一〇一五頁所收「關冊，一八九〇年分，（中文本）八三頁，淡水條」。
- 94：參照同上，「關冊，一八九一年分，頁八六，台南條」。
- 95：參照前引『劉壯肅公奏議』第三冊，「官辦基隆煤礦」條，三五頁。
- 96：參照前引『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下冊五九九頁所收「關冊，一八八八年分，二九二頁，淡水條」。
- 97：參照同上一〇一六頁所收「關冊，一八八九年分七八頁，淡水條」和「關冊，一八九〇

- 年分，八三頁，淡水條」。
- 98：參照前引『台灣巡撫·劉銘傳』一二八頁。
- 99：參照同上一一八頁。
- 100：參照同上二四頁。
- 101：山邊健太郎著「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日本歷史』現代2（岩波書店版日文本）二四三頁。
- 102：參照竹越與三郎著『讀書樓隨筆』九五～九九頁所收之「和林維源的商談」（日文本）。
- 103：參閱前引『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六三頁的註(7)。
- 104：參照同上二九二頁。
- 105：參照台灣新生報社編，『台灣年鑑』，民國三六（一九四七年）年版，第二八章抗日運動，四頁。
- 106：參照同上，一二八～一二九頁，一三四頁的註(8)和註(9)。
- 107：參照前引山邊論文，二四六頁。
- 108：參照前引『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二五〇～二五一頁。



再者，台灣文獻叢刊係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所編。又，年月日若無特別標明，則皆依據榮孟源編『中國近代史曆表』而換算為陽曆。

追記

一九六七年夏本文脫稿之後，筆者為補充本文之論旨而發表之論文有下列三篇，若能同時請參閱，則感激不盡：

- ①「日本人的台灣研究～以台灣舊慣調查為中心的討論」（日文，收錄於『季刊東亞』第4集，一九六八年八月號）。
- ②對談「台灣經濟與日本資本的進出」（日文，載於『經濟評論』，一九六九年八月號）。
- ③「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研究在日本～台灣條～」（日文，載刊於『亞洲經濟』第一〇〇號 念特刊，一九六九年六、七月合併號。此特刊號，後以『開發途上國之研究在日本——『亞洲經濟』一〇〇號紀念特刊——之書名，由亞洲經濟研究所重新以單行本出版（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因作過更正重新排版故，敬請參閱後者為宜）。



日本怎樣開始覬覦台灣



卜
今



甲午戰爭，日本佔領台灣，一步步地擴大對全中國侵略的步伐，造成了中國數千萬人的死傷流離，也造成了亞洲人民空前的大災難。然而，在我們痛恨日本對台灣人民的殖民壓迫，對中華民族的欺凌摧折的時候，有誰會料到，日本對台灣的覬覦竟是源自美國帝國主義者的慫恿？

美國自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解決了發展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後，生產力開始大幅度提高。於是正如所有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後，必然要對外擴充，以拓展市場及原料來源一樣，美國也要尋求對外的殖民地。然而，美國是一個起步較遲的帝國主義國家，在她開始想作國際範圍的擴充時，從非洲到亞洲的印度、中南半島大多已被歐洲諸強瓜分殆盡，唯一爭奪未定的大片地方是中國。然而，即使在自角逐瓜分中國的遊戲中，美國也是處於劣勢，英、法、德、俄諸國從一八四〇年開始已把勢力刺入中國大陸。為了有機會插手於爭奪中國，美國除了力主“門戶開放、利益均沾”以防中國全盤落入亞歐列強的勢力範圍內之外，同時積極扶植同為“後進”帝國主義的日本，作為爭奪中國勢力的伙伴。在這個背景下，遂發生了美國外交官慫恿日本佔領台灣的事件。

這段鮮為人知的慫恿過程，在卜今先生「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追尋中，終於有機會呈現在每一位關心台灣前途朋友的面前。為台灣人民的苦難歷史追查根源，卜今先生的貢獻是每一位真心為台灣奮鬥的人所不能忘記的。

這個慫恿內容，也反映出帝國主義對外擴充，其用心之深，佈局之遠，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如果我們再回顧近百年來東亞局勢的演變，和本文主角對日本獻策“巧合”的程度是何等地高！這當然不是美國近百年來的對外政策都參考了那份獻策，而是這份獻策及百年來的外交政策都體現了美國對外擴充的最佳佈局。然則，作為一個在這個大佈局下犧牲品的一份子的我們，當要如何覺醒與努力！

——編者識

「牡丹社」事件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一艘載有六十九名宮古島島民的琉球船在台灣北部海面遭暴風雨而遇難，其中三人溺斃，剩下的六十六人漂流到台灣南部琅璠（恒春）附近的八瑤灣登岸，闖入當地排灣族居住的牡丹社，被排灣族人處死其中的五十四人，其餘的十二人得到附近漢人的協助，僥倖逃脫，於次年一月一日逃抵鳳山，再被送往福州，由閩浙總督文煜奏准遣返琉球。

事情過了兩年之後，即到了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向台灣進兵，由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軍三千，自琅璠登陸，不宣而戰，肆行燒殺，排灣族人壯烈抵抗，日軍死傷慘重，只得退守龜山。清廷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於六月三十一日率福建水師赴台，與日本交涉。日本恐戰況持久對其不利，於是派全權大臣大久保利通赴北京談判，經多次會談，於十月三十一日與清廷簽

訂條約，清廷對日本出兵不予追究，並付撫恤遇害難民家屬白銀十萬兩，補償日本軍費白銀四十萬兩，日軍隨即由台撤退。

這個事件是日本奪取台灣的序曲，導致了二十年後的中日甲午戰爭，終於造成清廷割讓台灣予日本的惡果。每一個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能述說這一段歷史，然而鮮為人知的却是日人侵佔台灣這段不幸的歷史，是由當時美國駐廈門領事李善得（CHARLES W. LEGENDRE）一手設計，美國駐東京公使迪龍（CHARLES C. DELONG）大力協助，兩人合力逐步誘導說服了日本官員與軍人付諸實行。因此，由事件發生到日本出兵，其間非常奇特地間隔了兩年半之久。

幕後導演的臉譜

李善得的父親是法國人，但有個美籍母親。他生長在法國，曾在巴黎大學求學。後來娶一位紐約

女郎爲妻，移居美國，並歸化爲美籍。南北戰爭時曾因面部受傷而失去了鼻樑、左眼與半邊面頰。他因傷退伍後，由於作戰表現英勇，獲晉升榮譽准將。後來他有意從事外交工作，於一八六六年七月十三日獲得了美國駐廈門領事的任命。他走馬上任後，很快地就在中國的外交圈中受到衆人的尊重，所有的西方外交官都尊稱他爲「將軍」。他在多次台海沉船事件中或是代表美國，或是居中協助第三國向中國交涉處理善後問題。他有圓滑的外交手腕，連一部份中國地方官員都樂於與他打交道。他更懂得軟硬兼施，雙管齊下的政治藝術，多次運用耀武揚威的砲艦外交贏得了談判的籌碼。一八七六年美國海軍貝爾（BELL）少將藉商船流浪者號（ROVER）在台海沉沒事件率戰艦兩艘，陸戰隊一百八十一人登陸台灣的軍事行動，就是由李善得幕後主使的。

中日第一個條約的意義

日本於一八六八年實行明治維新。短短的三年之後，就由伊達宗城與李鴻章於一八七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天津簽下了第一個中日條約。在這個條約中日本雖未能獲得許多其他國家已擁有的最惠國待遇，但英、法、美、俄等帝國當時在華擁有的許多其他的利益，比如治外法權和通商港口的使用權等等，也都一應俱全。其中並有一項條款註明當一方受第三國威脅時，另一方有支援的義務。這項類似結盟的條款立即引起了西方諸國的注目。因爲中日兩個東方大國若是真的結成同盟，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在這一個地區的擴展就將困難重重，西方強權們是寧願見到中日間多起衝突，而不是中日和平共處攜手抗拒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

中日同盟對美國是“災難”

當時美國駐東京公使迪龍認爲中日同盟對美國而言是一大「災難」，並積極佈署希望影響日本取消這項同盟條款。他在致國務院的文件中主張：「日本與中國有所不同。我們應歡迎日本成爲一個盟友，當與中國有衝突時，文明諸國應視日本爲一夥伴」（註一）。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費雪（FISH）在回覆迪龍的文件上表示：「你當把握所有可能的機會，設法誘導日本儘可能地遠離中國，而與其他強權勢力們在商業與社會上結合」（註二）。美國急

中、日兩個東方大國若是真的結成同盟，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在這一個地區的擴展就將困難重重。西方強權們寧願見到中、日間多起衝突。

欲拉攏日本作爲瓜分中國的夥伴，不但是爲了避免產生中日同盟這股強大的東方勢力，而更重要的是以聯日增加美國本身在亞洲的實力，好與歐洲各國抗衡，在亞洲建立其霸主地位。

日本一方面想向中國進一步爭取最惠國待遇，另一方面也不願因同盟條款而開罪各西方強權，於是又派遣特使柳原前光再往中國談判修改條約。中國只在其他條款上做了象徵性的讓步，但在最惠國待遇和同盟條款這兩個日本最希望修訂的爭執點上未曾讓步。柳原在中國逗留期間，雖然在修改條約上成果不大，然而他爲日本收集了許多重要的情報，其中之一就是有關牡丹社事件的消息。

日本本來不在意「牡丹社」事件

事實上日本國內在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有很長一段時間對此事毫無所悉。第一個知道曾發生過這個事件並通知外務省的就是當時駐節中國談判條約的柳原。他在事件發生後近半年，才在一八七二年五月十一日由北京發行的京報上看到一則追悼閩浙總督文煜的消息，其中提到文煜曾經協助遣返琉球難民的事蹟。柳原將這則新聞從報紙上剪下送返日本外務省。但外務省在獲悉這項情報後並未太加注意，亦無任何具體行動，直到數月之後日本併吞琉球，經過美國外交官員的策劃與鼓吹，牡丹社事件才又被挖掘出來做爲對中國尋釁的藉口。

中國自一三七二年起即宣稱擁有琉球的主權，琉球國王數百年來也始終向中國皇帝朝貢。而日本的薩馬大名也先後兩次攻佔琉球過，但並未曾禁止琉球與中國維持藩屬關係。當一八五四年美國與琉球簽訂條約時又視琉球王國爲一獨立自主的國家。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國內主張併吞琉球的言論日多。一八七二年一月，日本政府指令鹿兒島的地方官員前往琉球，要求琉球國王調整日本與琉球之間的關係。當時牡丹社事件剛發生不久，日本國內並不知道這個事件。而琉球國王有感中國無力控制台灣地區的高山族，決定接受日本爲宗主國，並向鹿兒島官員們陳述船員被台灣高山族殺害的事件，同時指

派了特使團由鹿兒島官員們伴隨前往東京。

這個琉球訪日特使團抵達東京時，柳原寄往外務省的有關牡丹社事件的剪報早已歸檔，但並未受到太多注意。琉球特使團再次帶來了有關牡丹社事件的消息，仍未引起日本的興趣，直到美國外交官注入了一劑催化劑後，牡丹社事件才躍昇成中日外交關係中最重要話題。

一八七二年十月十六日，日本天皇接見了琉球特使團，同日並宣佈收歸琉球王國為日本帝國的一部份。當天，日本外相副島種臣會見了美國公使迪龍，通知他有關琉球入屬日本的決定。迪龍即趁機詢問日本對牡丹社事件的態度。副島表示日本正在考慮可能採取的各種行動方案，並詳細詢問了美國一八七六年出兵台灣的经验，同時更向迪龍索取有關台灣的美國海軍地圖與資料。

美國人希望中、日交惡

當時李善得恰好取道東京準備返國渡假。他收藏了許多有關台灣的地圖與資料，並且親自前往台灣多次，具有實地經驗。李善得與迪龍斟酌時期，商量之下都認為這是影響日本外交政策的一個天賜良機，若是能說服日本出兵攻佔台灣，因而與中國交惡，日本就得捨棄與中國同盟而參與西方帝國勢力瓜分中國的行動，若美國從旁協助，日本就有可能與美國結盟，在亞洲為美國利益發言。

李善得遊說日本攻台

李善得立即取消了返美的打算，與迪龍兩人就積極展開說服日本官員向台灣採取行動的工作。一八七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首先由迪龍再與副島單獨會談。這位當時的日本外相對台灣所知貧乏的程度令迪龍十分吃驚，但同時亦加強了他對美國可以影響日本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信心。會談開始時，副島對侵佔台灣並無多大興趣，僅僅透露日本當時正在考慮的三種針對牡丹社事件日本政府可能採取的作法：出兵制裁，與台灣高山族直接談判，透過外交途徑求得中國的安全保證。迪龍於是展示了一幅李善得供給的台灣地圖，並且介紹有關李善得其人其事，副島即刻表示有意會見。迪龍又謂，根據李善得自己的經驗與實地的觀察，台灣東部與南部雖在表面上仍屬中國，但事實上是一個無人管轄的地區。副島很快地揣測到迪龍的來意，立即表示願意置

該地區於日本的影響力之下，同時探詢迪龍有關美國的意向。迪龍連忙保證美國對台灣絕無領土野心，但是強調並不反對日本佔領這個地區，收歸為日本殖民地的作法。副島一聽他先前的揣測果真屬實，立即表示日本未來的一切行動將對美國開誠佈公，並且一定與美國的利益共進退。迪龍歷經一番唇舌，終於誘導副島外相作出了日本應當出兵進佔台灣的結論（註三）。

第二天，迪龍攜李善得再度會見副島，會中並有當時任日本外務省顧問的美國人史密斯（E. P. SMITH）出席。李善得首先又向副島表示美國政府鼓勵日本控制台灣的意願，接著對台灣住民與地理狀況作了一個詳細的介紹。副島顯然對這個會談十分滿意，相約隔一天再度聚首（註四）。十月二十七日的會談只有副島與李善得兩人參與。會中副島要求李善得為日本提供全盤的計劃，並討論了一些實際執行計劃上的可能困難（註五）。

日本佔領台灣，對美、日皆有利

經過這三次會談，美日雙方官員都同意，日本佔領台灣對美日兩國皆有利益。同時決定，在作法上以日本藉口牡丹社事件單獨出兵進佔台灣為終極目標，但先採取與中國政府交涉的姿態，提出中國政府不易接受的要求，以為日後進兵的口實預埋伏筆。因此，日本政府應該一方面積極整軍以備隨時赴台，另一方面應派出特使團前往北京交涉談判。

當時日本政界與軍人對台灣問題有各種不同的態度。副島接受了兩個美國外交官所提出的觀點和設計的執行方案後，就積極在日本政府內部扮演起折衝各派意見的角色，向各方推銷與李善得和迪龍三人商就的這一套主張。一個多月之後，日本太政院終於通過決定派遣特使團赴北京交涉。而副島本人於十二月十八日受天皇勅令任命為赴華欽命總理全權大臣，表面上是為同治皇帝成婚與成年視事的慶典活動祝賀，實則負有與中國談判琉球與台灣問題的任務。

由說客變成教練

這期間副島多次向迪龍表示，希望能夠禮聘李善得為日本政府服務，承諾將任命他為外務省的高級官員，並以特別顧問的榮銜授與李善得參加日本赴北京的特使團，同時計劃一旦台灣戰事發生，即

任命他做日本陸海兩軍的將軍率日本部隊攻台。事成之後，並將任命李善得為日本駐台灣第一任總督。副島受命為遣華特使之同日，太政院也批准了李善得的任命。李善得在次日向美國國務院正式提出辭呈，脫離了駐廈門領事的職務。十二月二十八日，日本首相正式佈達李善得的日本官位，次日並獲天皇召見。

前文提及，日本外相副島對台灣問題原本所知有限，日本政府的其他官員，包括當時被任命參與其事的外交官與軍人，對台灣瞭解得更少。為了推廣他的主張，李善得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設法教育日本政府內的官員，尤其是遣華特使團和秘密準備中的台灣遠征軍的成員們，訓練這些人員不但可以熟悉台灣以及他與副島等人擬就的計劃，並且要有充份準備以便在北京的談判桌上能掌握中國外交官員的動態，在台灣的軍事行動中熟悉當地影響軍情的各項因素。李善得連續撰寫了五份備忘錄，外加一份序言，在日本政府與軍方廣為散發。由這些文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善得如何為日本人琢磨出一顆顆引掠奪台灣為己任的心，並且訓練出一批精明能幹、知己知彼，熟悉中國與台灣的日本外交官和軍人。

在序言中李善得首先介紹了英、俄兩國的殖民政策，並指出殖民政策必須以海陸兩軍的實力為後盾。並引澳大利亞為一殖民地的典型，認為必須有外交官員、技術人員、移民和軍隊四者充份地合作，才能成功地充分利用一處新殖民地。最後建議收歸台灣為日本殖民地後，可以先作為放逐囚犯之用，如此既可開墾蠻荒，又解決罪犯問題，這種「一石兩鳥」的作法早在其他歐洲殖民地上採用（註六）。

灌輸侵略台灣的邏輯

在第一份正式的備忘錄中，李善得首先列舉了兩個日本為什麼要對台灣高山族住民採取制戕的理由：一是為琉球船民與過去可能有的其他遭台灣高山族殺害的日本人討回公道；二是「協助」中國政府招撫生番，開墾荒地。接著詳述了自明代中國官員於一四三〇年開始開發台灣以來的台灣史，包括荷蘭人據台期間高山族與日本貿易來往的情況，並謂台灣高山族人曾經向日本商人表示想接受更多日本文化的意願。李善得特別強調據台抗清的鄭成功有個日本籍的母親，藉以灌輸台灣住民身上流有日

本血的觀念。這份備忘錄中更有意地忽視當時台灣西部在行政隸屬福建這一個事實。他又詳細地介紹了與貝爾在流浪者號事件中獲得的處理有關台灣問題的親身經驗，並有意地製造中國政府並無意管轄台灣東部的番人與山地的印象。然後，李善得建議在作法上日本應先向中國示好，以亞洲人應合作抗拒西方帝國的姿態，為後繼而來的種種要求鋪好一條親善友好的路。就台灣問題而言，日本應向中國表示日本出兵台灣平番與開墾，是在幫助中國經營台灣，以免落入西方國家之手。一方面日本替中國保住了台灣，另一方面也幫中國管理高山族，以免再有沉船人員被殺而導致國際糾紛。同時，日本可以用過去幾世紀以來中日和平共處的歷史為保證，使中國相信台灣由日本代管遠比由其他西方國家佔領對中國有利得多。李善得更警告日本，防止台灣落入西人之手也是日本人自己應該努力爭取以保證本身利益的事。事實上他未說明的是，日本佔領台灣將更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當時美國急需鞏固自己的實力在國際舞台中求更上一層樓。培養日本作為自己的一個同盟夥伴，是加強美國實力的步驟之一。在這份備忘錄的結尾中李善得強調，他對日本所作的種種建議與方案都是完全符合國際法的合理行動（註七）。

從外交、軍事到收攬民心，都有詳細計劃

李善得向日本人提出的第二份備忘錄中，主要討論了日本應採取的外交與軍事策略。李善得預測中國總理衙門一定會拒絕日本有關出兵台灣協助中國平番與開墾的要求，這就正好符合他的計謀，因為中國若拒絕了日本「友好」的建議，正可以用來作為日本向中國尋釁動武的藉口。但是李善得認為日本在策略運用上不必急著動武，不妨再向中國進言三點：一是再度強調日本關切中國政府一直未能妥善經營台灣東部與南部地區，隨時可能被其他西方國家奪去；二是表示日本士兵較中國人有更多山地作戰的經驗，因此日本軍隊比中國軍隊更適用於討伐高山族的任務；最後一點是基於日本與中國、台灣在種族文化上的相似，日本人幫助中國經營台灣遠比其他任何國家或種族掠奪台灣更對中國有利。再度交涉之後，若中國仍一味地拒絕日本的要求，日本就更可堂堂出兵進佔台灣，減少國際間可能有的阻力。李善得表示屆時自願率領先頭部隊進攻台灣。為了應變迅速，他又建議日本政府立刻派遣

軍隊八千人進駐位於基隆東方僅二百哩的宮古島隨時準備行動。李善得估計在台灣的中国軍隊，事發之後只能據守少數幾處城市，若日本軍隊行動快速，在中國本土的援軍未到之前就包圍這些少數據點，中國在台灣軍的軍隊就可能不戰而降。為了取得台灣海峽上的軍事優勢，李善得更主張儘速遣兵四千攻佔澎湖群島。至於有關如何對待台灣島上平民的問題，他認為應當儘量採取懷柔政策以贏取長期的民心。最後，若是在日本佔領台灣之後中國政府向日本宣戰，李善得提議日本軍隊必須首先攻佔廈門。

第三份備忘錄主要是有關台灣東、南部的地理與高山族的詳細介紹。李善得不但對台灣高山族各番社的風土習俗詳加說明，並仔細地描述了台灣東部、南部海岸沿線的重要地形地物，更特別列舉了各個漢人或客家人屯居的地區。最後，他並建議了幾處有利於自海上登陸進攻的灘頭或港口，以為實際行動時參考選擇之用（註九）。

播下「東亞共榮圈」的種子

李善得在第四個備忘錄中再度強調日本佔領台灣的必要。他將此與英國在一八六八年出兵非洲伊索匹亞的事件相較，認為日本更有理由進佔台灣。當時西方諸國正因要求中國皇帝接見西方外交人員的問題與中國關係日漸緊張，李善得估計若中國因此問題而與西方等國開戰，台灣一定不保。如果日本人在這個關鍵時刻提出為中國經營台灣的要求，中國很可能較樂意將台灣讓給比較友好的日本，以免台灣落入敵對的西方國家之手。他更認為，台灣對日本而言就如一隻伸向亞洲大陸的手臂的前端手掌，沒有台灣的日本，就像一個失去手掌的殘廢人，不再能發揮太大的力量。李善得甚至為日本提出「東亞文明月彎」的觀念，認為包括日本、朝鮮半島、琉球群島與台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整個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台灣動兵也是應該且必須的。因此可見，李善得也是「東亞共榮圈」這個引發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等等多年動亂的早期播種者之一（註十）。

要日本官員牢記有用的歷史例證

第五份備忘錄中李善得指出，有必要系統地組

織和訓練擬議中的遣華特使團與征台陸海軍中的成員。他詳細地列舉了外交官員們與中國人作交涉時應對進退等應注意的事項，同時引用了大量有關中國與台灣的原始資料，要求參與人員熟讀。其中他特別指出，清廷官冊「緝紳全集」中並未列入任何台灣東部、南部地區官員的名字，這些地區在「台灣志」中也沒有記載。這可在未來外交談判中引為中國政府未曾且無意管轄這一個地區的證據。李善得更為日本準備了兩個美國擴張史上的例證，作為勸服中國接受日本要求的說辭之一。第一個例子是美國於一八一八年由賈克遜（ANDREW JACKSON），後於一八二九年當選總統，並於一八三二年獲選連任）率軍攻佔佛羅里達。起因是由於原本住在喬治亞州境內的印第安人被白人逐往佛羅里達，這些印第安人念念不忘故土，經常想反攻回喬治亞，於是兩地邊界常有戰事。當時佛羅里達是在西班牙的統治之下，美國亦認為西班牙未盡管轄之責，遂逕自出兵「平番」。美國的軍事行動當然引起了西班牙的不滿，美西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最後西班牙終因路途遙遠，任由美國奪去了佛羅里達。第二個例子是美國自法國手中購買了路易西安那。李善得認為，中國很可能十分樂意將台灣賣給日本以獲利。總之，他要求參與其事的日本官員們必須牢記這些歷史上的例證以用來說服中國出讓台灣。最後，他強調日本遣華特使團往北京談判的同時，陸海兩軍亦應完成準備，待命隨時出擊（註十一）。

李善得的這幾份備忘錄成為日本一步步進佔台灣的外交藍圖和軍事操典。在李善得的「諄諄善誘」之下，日本軍政官員們按著他的劇本，各自開始在這部日本侵台的歷史劇中粉墨登場了。

旗開得勝、果然教練有方

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日，由副島率領包括李善得在內的日本特使團抵達天津。六月二十九日，日本特使團爭取到做為第一個單獨晉見中國皇帝呈遞國書的外國使節團的榮譽。同時，經過與中國總理衙門幾次談判之後，迫使中國承認台灣東部、南部的高山族區域並不在中國有效管轄與控制的範圍內。日本在此次外交回合中得到空前的勝利，日本遣華特使團返國後，受到舉國上下降重的歡迎。尤其是許多商人認識到日本進佔台灣後所可能帶來的商業利益，紛紛慷慨捐款作為征台部隊的軍費。當時日本國內討伐朝鮮的論調也日益增強。在軍國主義

高漲的氣氛下，日本政界部份反戰人士開始團結，杯葛攻擊朝鮮與侵佔台灣的準備，主戰派和兩派爭執辯論不休，終於導致一八七三年十月份日本政府的內閣危機。事後新任外相寺島宗則雖然主張暫緩佔領朝鮮的計劃，但對於台灣問題仍持同樣的政策，積極佈署軍隊準備出擊。

這期間，李善得又為日本政府撰寫了六份文件，其中五份是前次五個備忘錄的修訂，最後一份他作了綜合性的結論，要日本為了新帝國的擴張「勇敢地

在亞洲高舉太陽旗前進」。同時將日本當時的處境類比美國本身在美洲抗拒歐洲帝國而自我擴張的歷史，暗示美日地位類似。並要日本自居為領導亞洲走出貧窮落後困境的帝國霸主（註十二）。

註釋：

註一：美國國務院日本外交文件第十八冊，一八七一年七月六日。

註二：美國國務院日本外交指令第一冊，一八七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註三：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冊第四頁至第八頁，一八七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會談紀錄；日本海軍部文件J N-R 34-F 45300-08。

註四：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冊第八頁至第十三頁，一八七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會談紀錄；日本海軍部文件J N-R 34-F 45309-20。

註五：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冊第十三頁至第十五頁，一八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會談紀錄；日本海軍部文件J N-R 34-F 45321-26。

註六：日本海軍部文件J N-R 34-F 4489

台灣先民的血液，是美國人作的祟

這些主張在日本內部的政爭中自然為主戰派大大地推波助瀾，出兵台灣的主張於是日居上風，侵台部隊的準備也近成熟。李善得更為日本招兵買馬，徵僱了美國海軍中校卡薩（D, CASSEL）和陸軍中尉華生（J, R, WASSON）為日軍效力。一八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日軍征台部隊司令陸軍西鄉中將下令有卡薩、華生二人隨行的先遣部隊二百人登艦出發。五月二日，主力部隊乘戰艦四艘赴台，揭開了日本侵台的序幕。

日本佔領台灣五十年的歷史，留下了千千萬萬日本與台灣之間有血有淚的牽連。誰又想到，追本溯源，竟然還是美國人作的祟！

1-99，李善得備忘錄。

註七：日本海軍部文件J N-R 34-F 44903-20，李善得備忘錄第一號；大畏文書第一冊第十七頁至二十六頁。

註八：日本海軍部文件J N-R 34-F 44921-32，李善得備忘錄第二號；大畏文書第一冊第二十六頁至第三十一頁。

註九：日本海軍部文件J N-R 34-F 44932-36，李善得備忘錄第三號；大畏文書第一冊第三十一頁至第三十三頁。

註十：日本海軍部文件J N-R 34-F 44937-45，李善得備忘錄第四號。

註十一：日本海軍部文件J N-R 34-F 44946-60，李善得備忘錄第五號；大畏文書第一冊第三十四頁至第四十頁。

註十二：日本海軍部文件J N-R 34-F 45245-58，李善得備忘錄新第五號。

駐家

變化發展 或發展不足

·郭江·

編者先生：

我看了34期林中平的“第三世界經濟……”一文之後，我有一點想拿出來跟林先生或其他讀者討論一下。這是有關Underdevelopment 這個名詞的涵義和適當的翻譯的問題。

先談談Underdevelopment 這個名詞的涵義。在我所看過的Dependency的文獻之中，都沒有一個作者（包括Frank在內）很清楚地把它定義寫下來。不過，從他們的用語中，大概可以歸納出一個共通點，即指由跟先進國家（而不是任何的國

家)發生經濟關係後所帶來的一些不良後果。至於是對那方面起了“不足”(Under)的作用,則沒有說清楚。是指不能平衡發展(Balanced Growth)嗎?不能自給自立(Self-sufficient)嗎?因發生了關係而導致的貧富不均嗎?或者是因輸出的國際價格不穩定而帶來的經濟衝激嗎?如果這些全部都包括在Underdevelopment 這名詞底下,那差不多等如說它代表了所有第三世界國家所可能面臨的經濟問題了。這顯然不是一個簡結的(Parsimonious)定義。我想在這個問題上,Paul Baran的兩個概念會有點幫助:“實際的剩餘價值

”與“潛在的剩餘價值”。潛在的剩餘價值是指一個國家的人力和物力都發揮了最大的效用後所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而實際的剩餘價值則指因種種原因獲得低於這個理想數量的實際剩餘價值。這些“種種原因”可能是因為貧富不均,有錢人不把社會財富作最適當的投資,然後再生產,而花在奢侈品上消費掉了;也可能是一些不必要資源浪費(如失業)。如果從這兩個概念來看的話,Underdevelopment 可能翻譯成“發展不足”比較恰當。

讀者 郭江

編者按:

UNDERDEVELOPMENT在台灣通常譯作「低度開發」。既云「低度」,自然是相對於「高度」而言,表示「低度開發」國家經過成長之後,將擠身於「高度開發」國家之林。

這種譯名,顯然是假設「現代化理論」是正確的。

在這裡,我們發現,一個名詞的翻譯法並不是那麼中立的。一種特定的譯名,可能表示接受爭論中某一特定學派的觀點。

當然,很多翻譯者或使用者未必警覺到學派的爭論。他們只是按字直譯。有時,原文本身已帶有濃厚的學派傾向。例如,

UNDERDEVELOPMENT照一般非學術性用法,便含有「低度」之意。這就更增加了翻譯者的困難。

正因為UNDERDEVELOPMENT這個詞彙帶有濃厚的學派或意識型態色彩,所以當新進學者在研究第三世界經濟發展問題時,才會設法賦予它新的涵義。然而,

由於學理本身還在爭議中,這種新涵義也就未到一致公認的程度。郭江先生來信闡明這點!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翻譯上。林中平先生將UNDERDEVELOPMENT譯作「矮化發展」,郭江先生認為「發展不足」較洽當。馬耕田先生則將之譯作「發育不良」(見本期馬耕田:“一個發育不良的經濟學家”一文)。您的看法呢?



民主台灣訂閱單

訂閱「民主台灣」____份共____期
(每份每六期10元)請寄下址:

1. 自____期至____期

姓名: _____

住址: _____

2. 自____期至____期

姓名: _____

住址: _____

3. 自____期至____期

姓名: _____

住址: _____

贈閱一期給

姓名: _____

住址: _____

以上共訂費美金_____元。

我願捐款美金_____元。

支票寄: OS DMT

P.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民主台灣 35期 1984年5月

62

民主大家來，台灣是大家的台灣。「民主台灣」竭誠歡迎讀者來信，討論已發表文章的內容，刊物的編輯方向、個人的讀後感，以及對時事的簡評，等等。

您不必洋洋灑灑寫一大篇，也不必有什麼寫稿經驗。只要心中有所感觸、有所思慮、有話要說，那就儘量提筆寫下，就像是寫封信一樣，寄來給我們。

如同所有來稿一樣，來信歡迎用筆名。但請附聯絡住址、電話。編者了解客觀存在的顧忌，會慎重處理，絕對保密。來信請寄：OSDMT P. O. BOX 53551, CHICAGO, ILL 60653。

經濟條件尚不足以 決定區域整合 · 秋農 ·

編者先生：

34期材中平先生的「第三世界經濟發展問題與區域整合的政治經濟學」一文，作者認為：「庸庸理論提出一個大問題……但對解決途徑很少提及」，因而提出「區域整合」的方案。對此，我有不同的意見。

拉丁美洲國家六十年代來的民族主義高呼情緒帶來了安地公約（ANDEAN PACT）一個區域經濟整合。限制外資的計劃，發展到七十年代下半期，卻更加強化她們與核心國（美國）的連結性。

可見，如果先從「經濟理性」（市場的運作規模、經濟的互補性等等）來考慮「區域整合」

是不夠的。

國與國之間必須存在有相似或相關的階級基礎、國家目標、甚至敵人。而且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取向如果不是建立在廣泛的社會基礎上（不管是資產階級式的，如EEC，或社會主義似的，如東歐盟國，或共同資源如OPEC，「至今已逐漸衰落」），國與國的經濟聯盟是無法實現成功的。

只要檢視一下東南亞國家的軍事獨裁政體，多國公司、銀行對經濟作物、加工製造業的控制、資產階級與外資勢力的密切合作，我們是很難相信東南亞共同市場有建立的基礎的。

難怪美、日所鼓吹的「太平

洋盆地」構想，贏得相當多數東南亞國家（包括台灣）經濟學者的喝采。

縱然依賴性理論學者無法對「國家獨立自主的發展」提出圓滿的解決理論，修改或補充以及一些國家的實驗都還在進行，才只三、四十年，實在難以對之蓋棺論定。（雖然在這段期間我們看到了現代化理論的破產）。因之，革命性地跳到「區域整合」理念似乎是個過度大膽的嘗試。

讀者 秋農

一九八四年四月九日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Taiwan
(OSDMT)
P.O.Box 53551
Chicago, IL 60653

Non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Chicago, IL
Permit No. 3293

Return postage guaranteed

550
34TH ST, #2
CHICAGO, IL 60615